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 十 二 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中 华 书 局

1980年10月

中华书局
PDG

BC07133

K258
13
19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 十 二 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九分册

(美) 包华德主编

沈自敏译

赵 杰校

(征求意见稿)



中 华 书 局

1980年10月

A803528

北京图书馆藏
PDG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译 稿

第十二辑

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
中华书局排印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北京体育报社印刷厂印刷

•
1980年10月印刷 定价：0.92元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第十二辑
PDG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编印凡例

一、编印《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目的在于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

二、《丛稿》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

三、《丛稿》专登有关中华民国史资料一类的稿件，供历史教学、研究工作参考，每辑字数不定。

四、所有中华民国史初稿及其所附资料，一般都先在《丛稿》登载，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改为定稿。但《丛稿》登载过的稿件，将来《中华民国史》一书及其所附资料不一定全都编进去。

五、欢迎投稿，但只限于中华民国史及有关资料。

六、欢迎对《丛稿》提出批评意见。

七、译稿如引用，请核对原文。

目 录

麦斯武德	(1)
梅光迪	(3)
梅兰芳	(6)
梅贻琦	(10)
梅贻宝	(12)
孟森	(13)
缪荃孙	(15)
缪斌	(17)
莫德惠	(19)
穆湘玥	(20)
牛惠生	(22)
钮永建	(24)
乌斯曼	(26)
欧阳竞无	(28)
欧阳予倩	(30)
白崇禧	(32)
白杨	(37)
班禅喇嘛	(37)

麦斯武德

麦斯武德（1886—1951.4），新疆维吾尔族的教育改革家，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曾在国民政府任职，1947—48年任新疆省主席，因拒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于1951年被捕处死。

麦斯武德出生在新疆西北部伊犁地区一个虔信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富商兼地主家庭，他先在伊宁伊斯兰技术学校就读，后去土耳其进军校，1907年毕业后，进君士坦丁堡大学自然科学部，1910年系该校医科学生。1911年结业，1914年获医学学位。

1915年，麦斯武德回新疆行医。由于在土耳其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他回新疆后，致力于为新疆维吾尔族创造就学机会，但为当时省长杨增新所疑。杨增新力求巩固汉人在伊犁的统治，以防止俄人入侵骚动。因此，麦斯武德1916年在伊犁设立的第一所现代学校，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即为新疆当局所查封。他开办了新的学校，也全都为乌鲁木齐当局所查封。1924年，他被控参与革命活动，被投入乌鲁木齐监狱十个月。获释后，他立即回伊犁从事教育活动。为了避免和省府发生新的冲突，他在名义上让一些被人认为保守的人物主持校务。在此期间，他让一些青年在他的私人诊所学习。1926年间，他已使好几个青年受到基本的医务训练。

1928年杨增新被刺，新疆又开始另一次的动乱。为了避免他的子侄受害，1928年，麦斯武德把他们送到土耳其去读书。当时对汉族统治的不满，引起了新疆一些少数民族谋求政治上某种程度的自治权运动和起义。早在1934年，麦斯武德由伊犁到阿克苏，在地方领袖马赫莫德统率的维吾尔族军队中任政治工作时，已卷入当时发生的一次运动。同年稍晚，甘肃回族的年轻领袖马仲英率部窜入新疆，打败了马赫莫德的部队。麦斯武德逃往印度，并于11月到天津，又乘火车到南京，受到在南京的新疆人士及国民政府代表的欢迎。他以新疆代表身份，于1935年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在南京居住，把子侄（其中包括在土耳其读书的）送进中央大学和中央军校。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开始，麦斯武德随同国民政府迁往汉口又到重庆。1938—40年在国民参政会任职。1942年他和马麟（青海省前省长）成为三十六人的国府委员会中的两名伊斯兰委员。战争结束前，国民政府免去盛世才在新疆之职，麦斯武德任新疆督察专员。他的任务，是向少数民族宣讲国民党的政策，并取得他们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他的工作，在1944年11月所谓伊犁叛乱之后更为困难了。叛军夺取了邻近苏联的三个地区，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为了对付这个对中国在新疆的统治的威胁，蒋介石派张治中去乌鲁木齐与叛乱者谈判。1946年3月张治中任新疆省主席。

张治中就任后，麦斯武德和他的同事穆罕默德·伊敏成了维吾尔族民族运动的代表人。他们要求在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下，享有民族自决权。他们和张治中合作，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反对伊犁叛乱，他们拥有的政治影响由这个事实得到证明，即伊犁的叛乱者谴责他们时比谴责张治中等汉人官吏更怀敌意。张治中打算提名伊敏为改组后的新疆省政府副主席，由于遭到伊犁集团的反对，乃以鲍尔汉充任。

1946年夏，以张治中为首的新疆新政府在乌鲁木齐成立，其中包括伊犁地区的代表。麦斯武德仍从事汉族统治下的民族自决活动。1947年5月，他担任了第一个非汉族的新疆省主席。他的任命，原来是为了安抚新疆的非汉族集团，实际上更引起了伊犁集团及其他政治上活跃的维吾尔族人的敌视。他们认为麦斯武德不过是南京国民党当局的一个工具而已。东疆、南疆不断发生骚乱，虽然宋希濂率领中国军队支持乌鲁木齐政府，但新疆联合政府仍于1947年夏瓦解。伊犁地区领导人要求将麦斯武德免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拒绝，僵局一直拖到1948年。12月底，国民政府因受到共产党势力迅速扩展的极其严重的威胁，遂免去麦斯武德，以鲍尔汉继任。1949年秋，彭德怀率领的共产党军队由西北进入新疆，麦斯武德拒不接受新的统治。1951年4月，他被控进行阴谋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反革命活动而被捕处死。

梅光迪 字：迪生 董庄

梅光迪（1890.1.22—1945.12.27），学者，保守的文学杂志《学衡》（批判性评论）的编辑。虽然他是把西方文学介绍入中国的一个先驱者，但与二十年代的文学运动势不两立。1924—36年在哈佛大学教中文。

梅光迪是安徽宣城人。他父亲是一名校长，笃信中国古典籍，因此使梅光迪自幼酷爱中国古书。十二岁时他初应科举。他在安徽受完中等教育后，到北京进了清华学堂。他独立勤奋地学习了一年英语，1911年考取官费奖学金，并被录取进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读书。两年后，又转入西北大学。1915年毕业后，进哈佛大学研究院。

梅光迪在哈佛大学的四年，对他的思想发展影响很深。最重要的，是他和文学教授、新人文主义创始人伊尔文·白璧德的交往。美国在二十年代中，在保罗·爱尔默·摩尔、白璧德的影响下，一度兴起一个人文主义的哲学和思想批评运动。梅光迪在新人文主义思潮中，见到它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近之处，认为有可能用它来解决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动荡。

梅光迪一到哈佛大学，就和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胡适，进行长篇的激烈的通信讨论。在胡适已出版的日记里，记载了他们当时赞成和反对中国文学改革的争论。这些片断的单方面的材料，反映了中国青年学生的深刻思虑。他们新接触了西方知识，为祖国的现状感到忧虑，热烈地企图找到解决的办法。经过这些争辩，胡适写道，他逐渐形成了文学改革的思想，并且开始写作白话诗作为试验。梅光迪与胡适意见相左，倒并不是他没有感到旧的中国文学传统的没落，而是认为胡适的理论与实践是基于对文学的虚妄设想之上。梅光迪认为，胡适把语言同文学的复杂关系简单化，而又低估了旧传统对诗歌创作的重要性。1917年胡适回到北京，举起了文学改革的旗帜，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梅光迪仍留在哈佛，跟从白璧德研究文学。

白璧德虽对中国的材料并无直接接触，他也不懂中文，但他对孔子的道德观和人本主义有深刻理解。他以近代西方的自然主义理论来解释早期道家，认

为与西方文化本质上是一致的，并且愿意致力于实现一个“人道主义的世界”。这些都对梅光迪产生了影响。白璧德是一名古典派，不能容忍以研究语言学的态度来研究西方文学，因此成了一名人们对之有争议的学者。梅光迪认为白璧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深刻，他主张综合东西方文化的恒久的中心内容是一种创见，他对流行的文学时尚勇敢地进行孤军奋战。

1920年，梅光迪回国，任南开大学英语系主任。1921年去南京，任东南大学英语系主任（1927年改为中央大学）。该校男女同学的第一班八名女生中的一人李今英，是广州来的学生，1927年与梅光迪结婚，以后去美国拉特克利夫大学做研究工作，回国后教英语及文学等课。

1922年，梅光迪和东南大学同事吴宓等人创办《学衡杂志》，反对文学革命。在创刊号上，梅光迪撰文历数新文学运动的灾害。当时，白话已成为小学教材的基本文体，并已在书信和写作中广泛应用。“文学革命”的迅速发展，必会造成一种大言不惭的气氛。有些新作家既对自己的文学传统无知，对西方文学也知之甚少。梅光迪批评这些新作家妄自尊大，既不客观又不谦逊，充满空想，气量狭窄，对不同意见的人任意进行诬骂。梅光迪从不反对西方知识，但反对那些搞文学改革的人的那种不加区别的偶像崇拜。他们竟想把中国传统中的一切东西通通打倒或用别的东西代替，他们对西方的哲学新文学的中心的永恒内容并无足够知识，反而夸大了那些表面的、暂时的、衰落的东西。梅光迪并不反对白话，他很欣赏中国的口语文学作品，认为它是写作的一种合法体例。但他不同意完全用白话来代替古文，他认为古文需要排除掉拟古和内容空洞的毛病，而使其成为能表达现代思想的灵活工具。

为了使国内读者对西方文学有个广泛的全面了解，《学衡》发表了不少他们认为重要的西方作者的论文和译文。梅光迪的文章主要是介绍这样一些文艺批评家，他们的文艺批评，不以分析文学作品的形式美为限，而是用文艺批评来表达其道德观和哲学观，因此他们不但成了文艺批评家，而且成了时代的先知——例如卡莱尔、阿诺德，当然还有白璧德。在梅光迪看来，对文人的这种见解在美国是由新人文主义者表现出来；就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说，孔子的儒学就集中地表现了这种见解。他认为祖国文化的英雄人物是那些既在文学上又在

行动上表现道德高尚的人，例如十一世纪的欧阳修，十九世纪的曾国藩。他们既是政治家，又是道德家和作家。

梅光迪等《学衡》派的人，之所以拒绝中国的文学改革运动，是因为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要求进行社会政治改革。民国时代的纷繁变化和迫切要求，促使人们去认真了解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中最佳的东西，而并不在于对它们加以综合，这一点是中国的知识界无力做到的。梅光迪对于忽视文学原理以及为政治目的而贬低文学价值将要引起的后果，比一些文学改革的首领们看得更清楚些。他反对近代的文学改革运动，是因为他坚决反对把文学作为对当前的实际需要的反应。

梅光迪通过《学衡》等杂志，向国内读者介绍西方文学思想时，他又在太平洋彼岸充当了文化使者的角色。1924—36年间，除1930—31年曾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外，他在哈佛大学教中文。在此之前，1921—24年赵元任充任过哈佛大学中文讲师。梅光迪长期担任此职，对美国早期的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学的研究是很有影响的。在讲课中间，他力求使学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精华。

1936年，梅光迪回国，任国立浙江大学英语系主任，文理学院副院长。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直至战争结束。1939年梅光迪任新成立的文学院院长。作为大学的重要负责人，他竭尽全力在艰难困苦中维持较高的教学水平。他要为日常行政工作操心，这些工作，由于物质匮乏和人们精神不安而困难很多。他又要关心学生的福利和物质生活。学生们对他感到敬畏和局促不安，他却不遗余力地鼓励和帮助那些有才华的学生，他为人慷慨而出名；他倾囊相助外出学生的旅费，他为需要住院施行手术的学生募集医药费，冒险营救以虚构的政治罪行秘密被捕的学生。

梅光迪在遵义时，继续教英国文学课，以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批评和散文为主要内容。他发表文章介绍有关作家，分析二十世纪欧洲重大事件的历史和思想背景。1938—45年，梅光迪任重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

1945年2月，梅光迪病重。他在1945年的日记中，谈到不少他已感到无力完成的写作计划。他死于1945年12月27日。他的手稿中的一些笔记和草稿，是他准备用中文和英文同时写作的一本关于韩愈的书的大纲；他还准备为中国读者写

一本西方思想史，其中包括对从伏尔泰到尼采等二三十名重要人物的传记和批判性研究。这些计划是同他的一生事迹的特点相一致的，他的使命就是以历史的眼光和传统的意识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学，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捍卫一种认为文学应与道德和哲学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一种既是孔门儒学的也是新人文主义的观点。

梅 兰 芳 字：畹华

梅兰芳（1894.10.22——1961.8.8），京剧名演员，二十世纪前半期国内戏剧界的卓越人物，他是中华帝国伟大的古老表演艺术传统的最后一个继承人。

梅兰芳原籍江苏扬州府，他的祖父梅巧玲是清末的著名演员，有一个戏班子。他演旦角，生有两子一女，长子梅雨田是戏院的琴师，幼子梅竹芬是演员，即是梅兰芳的父亲。梅兰芳三岁时父亲去世，由伯父抚养。

梅兰芳七岁时就学戏，学了一年后，又转到他亲戚家中与一些少年一起学戏。老师吴菱仙是他祖父的朋友和职业上的同道。吴菱仙很赞赏梅兰芳，因此另加训导。1904年，梅兰芳十岁时在北京初次登台。三年后，作为高年级学生进了著名的喜连成（后改富连成）戏校，并随该校的戏班子经常在北京的主要戏院中演出。当时，他又成了旦角王瑶卿的私淑弟子，梅兰芳此后的演技很多得之于王瑶卿。

梅兰芳在喜连成戏校学毕业后，加入职业戏班经常演出。1913年间，他以他的演技、演出风范和扮相而为北京观众所赏识。他那时虽然还是第二流角色，却经常受邀在公众舞台和私人堂会中演出。1913年秋，他应上海著名的丹桂第一舞台之聘，前去演出。他与在北京常同台演出的生角王凤卿一起去上海，这两个北方演员在上海大为成功。为期四十五天的演出，使梅兰芳获得了京戏名演员的名声。

梅兰芳回北京后，演出了一些从上海学来的新剧目，其中有些刀马旦的戏。在这以前，北京的旦角很少像梅兰芳在他的新戏中那样，把剑术、舞蹈、唱

腔综合在一起演出的。一向保守的北京观众，热情地欢迎梅兰芳的艺术创新。梅兰芳又尝试演出他认为新颖又有生气的上海盛行的时装戏。1914年他第一次演出《孽海波澜》，其内容是描写一名妇女被迫为娼的故事。他继续这方面的试验直到1916年，此后他放弃了半欧化的风格，而专注于古典的表演技巧。

1914年12月，梅兰芳第二次到上海，他因对传统角色的卓越的理解而名声大振。这时，他遇到了学者、戏剧专家齐如山。齐曾去过欧洲，经常思考在这个过渡时期中，中国旧戏的出路问题。齐对梅兰芳的艺术发展和舞台生活影响很大，成为他的顾问，舞台监督，剧本编纂者和经常的同伴。要谈到梅兰芳的艺术，那是与齐如山的名字分不开的。他们合作的最初重要成就，是1915年中秋节演出的以古代神话为内容的新剧目《嫦娥奔月》。齐如山设计这一新剧目，不用传统的戏装，而改用真实的古装，还采用了古代舞蹈。这次演出即刻获得成功。不久，他又在北京留美同学会演出这个新戏。当时外国人对梅兰芳的艺术，首次公开表露了兴趣。《嫦娥奔月》成了他多年的保留剧目。接着，齐如山又取材于伟大的中国小说《红楼梦》，创作了另一个新舞剧《黛玉葬花》。他1916年秋，第三次到上海也演了这个剧目，观众对此如醉如狂。

1919年春，梅兰芳应邀去日本帝国剧院演出。这是中国演员第一次被邀在外国舞台上演出。他在东京、神户为期四周，日本人士对他热烈接待，对他的演出很欣赏。1922年4月，香港侨民请他去为将要访问这个殖民地的威尔斯亲王演出。对这个二十七岁的演员来说是极大荣誉，但他的演出因香港爆发了使该埠瘫痪的总罢工而取消。同年秋天前曾失望的中国居民再次向他发出邀请。1922年10月，梅兰芳去香港太平戏院演出。1922年12月，梅兰芳及其他演员，被邀在故宫为庆祝满清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婚礼，而在一些重要剧目中演出。1924年，他应东京帝国剧院之请又去日本演出，再次获得很大成功。

当时，各界人士，如瑞典太子、泰戈尔，都曾在北京观看过梅兰芳的演出，并向他们本国热情地报道了他的光辉的艺术。1926年，任满回国的美国公使马慕瑞举行宴会时，希望梅兰芳能率领剧团去美国访问演出。这时已有许多人建议他去西方显示他的才华，梅兰芳表示如果有足够资金，他也很想成行。1929年，齐如山的老朋友、京剧艺术的著名保护人李石曾，劝说几个著名银行家

资助梅兰芳及其剧团去美国演出。1929年12月29日，梅兰芳从上海启程。

梅兰芳到美国后，在华盛顿中国使馆作了第一次私人演出。有人建议他，由舞台监督卡帕克经理在美的演出，他很明智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卡帕克主张在百老汇首演之前，必须要有一个月的紧张训练以适应舞台条件，并准备了英文的剧目单，安排了擅长英语的中国讲解员，以便对完全不了解中国舞台传统的美国观众作解释。为向美国公众演出，这个剧目单的剧目，梅兰芳得到一位京剧爱好者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的帮助，他负责处理剧团在美期间社会联系事务。1930年2月16日，首次旅美演出在纽约四十九条街剧院开场，演出非常成功，获得剧评家的一致好评。梅兰芳在纽约演出五周，其中最后三周在帝国剧院演出，然后去芝加哥演出两周，又到旧金山，再去洛杉矶，在交响乐团音乐厅演出十二天。由于他旅行演出的成功，获得了南加里福尼亚大学、巴摩那学院的荣誉学位。他在回国途中，又在檀香山演出十二天。1930年9月回到北京。

1931年9月，日军袭击沈阳，梅兰芳考虑到对剧团和对自己年青家眷所负的责任，决定迁居上海。虽然这个迁移，使他要和关系悠久的老搭档如齐如山、王凤卿等人分手。上海对梅兰芳很熟悉，他的业务也有很大活动地盘。此后几年，是他非常活跃的年代，极盛的时期，他的声誉稳步上升。

1935年，梅兰芳及其剧团和电影明星胡蝶一起被邀去俄国。他们一起到了俄国，又去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梅兰芳早就想到欧洲去演出，尤其是伦敦，但因局势不稳定，没有那个舞台监督愿意冒险出资支持，梅兰芳失望地离开伦敦回国。

1936年秋，梅兰芳在中日战争前到北京作最后一次演出。1937年7月华北战争爆发，他全家离开上海到香港。1938年5月，他在香港李氏剧院演出十八天，这是他在世界大战前的最后演出。他悄然住在香港，一直到1941年12月日军占领这个殖民地。日军占领后，日本人曾邀梅兰芳重登舞台并许以资助，他早就决定决不在敌人面前演出，拒绝了多次要求。他甚至蓄须明志，表示不为日本人演旦角。日本人最后答应保证其安全，并派专机把他送到上海。在其后的战时岁月里，他过着隐居生活，把时间用于教导门生并刻苦练功，以便重回舞台。

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原梅兰芳剧团的人员已星散。他慢慢地又把同伙聚集起来，并能演出大场面的剧目。他的号召力比之过去毫不逊色，登台演出总是招来满座。但是战后经济混乱的状况，使他实际上不可能把一个大型剧团维持下去。象同行中的其他人一样，他遇到经济困难。1945—1948年间，他登台的次数日见减少。1947年，他摄演了他的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翻译成外文是《梦中姻缘》）。这是他多年前即已成名的个人剧目。在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之前，他最后一次登台演出是在1947年4月。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梅兰芳的经历也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看到梅兰芳因其艺术成就和在日军占领时期的爱国行为，而在国内人民中享有独特的热爱，尽力利用他的名声和成就来支持自己的统治权威。他在新的文化界得到荣誉地位，任全国文联常委。1951年任戏剧舞蹈研究所所长，鼓励他重登舞台，表演尽可能多的传统剧目，并安排他在工人、战士中作巡回演出。还为他摄制了影片《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概述了他的一生历史。选拍了他的名剧片断，如《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宇宙锋》、《白蛇传》等。1956年梅兰芳和一个八十人的剧团去日本，在主要城市演出上述剧目；他又经正式邀请去苏联访问。

1961年8月8日，他在北京去世。他的成就和贡献受到中国共产党当局的高度赞扬。一年后他逝世周年时，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一个反映他的舞台生涯的大型展览会，开了座谈会，发行了纪念邮票，出版了他解放后写作的文集。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在《人民日报》发表专文，说很多西方人只知道两个中国人：孔夫子和梅兰芳。

梅兰芳是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戏剧界的杰出人物，也是联结中华帝国古老的表演艺术传统的最后一个纽带。一些保守的人物批评他糟蹋了传统的形式，这就他早期的一些演出中的过分雕琢来说确是事实。但这种判断的错误，是在一个过渡的实验的时期中所不可避免的。梅兰芳的一生，恰好处在古典戏曲艺术的关键时期。他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在保存中国戏曲艺术的主要遗产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的同胞中间，却有许多人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混乱或感到沮丧。梅兰芳的一生行迹，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就是近代中国出现的那些动荡年代的

情况。他在其专业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创造的女角，综合演唱、舞蹈、技巧动作三者于一个角色身上，梅兰芳对这种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这对他的后继者影响很大。他恢复了古代舞蹈技术，并给古典戏剧注入新的活力和魅力。他对舞台化妆、服饰所作的革新，丰富了京剧的表现能力。

梅兰芳人格高尚，意志坚强，加上他的艺术才华，使他获得了过去任何一个演员没有过的声誉地位。他的第一个妻子和她所生的儿子已死去，第二个妻子福芝芳，在婚前就是一个有才华的女伶人。她生有子葆玖，女葆玥，均从事戏剧事业。

梅 贻 琦 字：月涵

梅贻琦（1889.12.29—1962.5.19），工程师、教育家。1931至1949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后任台湾国民政府教育部长。

梅贻琦的出生地是天津，他父亲是秀才出身，任盐务官。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土匪部队将军、后为明朝第一代皇帝效劳的梅殷。梅贻琦幼年时，全家因避义和团之乱，于1900年夏逃往保定。1904年梅贻琦作为第一批学生之一，进了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即南开中学的前身。1908年自该校毕业后，进保定高等学堂。在校时为应1909年庚子赔款助学金考试作准备，同年作为四十七名学生之一被录取赴美国留学。

1910—14年，梅贻琦在马萨诸塞州华塞斯特综合工业学院学电机工程，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梅贻琦一度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15年起入清华学校教书，该校专为培养庚子赔款助学金留美学生而设立。梅贻琦身为教师，受到普遍喜爱和尊敬。1926年任教务长，两年后，率领中华教育团去美国考查公费留学生。

1931年，梅贻琦任清华校长。他任此职二十年之久。他初任职时，清华还是一个预备学校性质的学校。在梅贻琦主持下，清华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大学之一。他在文、理、法学院之外，增设了拥有土木工程、电机、机械系的工学院。他又实施一项方针：庚款留美学生助学金公开向全国各大学毕业生招考学

生赴美深造。按当时国内需要，确定专业考试科目，每年选送二十五名学生出国留学。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停闭。南京国民政府指示，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暂时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梅贻琦及另两位校长为临时大学校务委员。日军进逼，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校务委员会主持。但实际责任却落在梅贻琦身上，因蒋梦麟、张伯苓忙于别的职务。在梅贻琦领导下，三校和谐合作，保持了高质量的教学水平。1940年华塞斯特综合工业学院，因梅贻琦的成就授给他荣誉学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继续开学一年，所属三校筹备复校工作。1945年11月，梅贻琦飞往北平考查原址，校舍因曾为日军占用，损坏极大。梅贻琦与其同事辛苦经营，使学校得于1946年10月10日复学。1946—47年间，复校工作虽然进展很快，但因国共内战加剧，工作愈来愈困难。194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军队向北平进攻，控制了清华园。12月21日，梅贻琦飞往南京，在一个负责资助逃离共产党占领地区的教授的委员会里任职。1949年初，梅贻琦到上海又去广州。6月，他去巴黎参加科技情报会议。9月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年底，去美国纽约，同促进中国教育文化基金委员讨论保证给清华拨款事宜。他在美国六年，主管这笔基金的运用。其中一部分用于培养中国留美学生的师资和资助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研究生，一部分用来购置台湾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图书和设备。

1953年，台湾国民政府在美国设立文化顾问委员会，梅贻琦任主席。1954年3月，梅贻琦到台湾参加选举，一个月后又回纽约。1955年11月，他到台湾，准备利用美国的援助建立清华大学的原子能研究所。1956年研究所在新竹动工，首批建筑于1957年6月使用。1956年在国立台湾大学招收了第一班学生十八名，1957年秋在新竹开课。在原子能研究所经营下，建成了能量为一百万吨级的第一个露天型原子反应堆，并在1961年12月2日开始运转。1958年7月，梅贻琦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61年初因病辞职。梅贻琦曾任全国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梅贻琦1962年5月19日死于台北。

梅贻宝

梅贻宝（1900.11.5—），哲学家，教育行政工作者，多年与燕京大学在一起，1949年后在美国教书，1955年任农阿华州立大学中国东方研究计划主任。

梅贻宝出生在天津，家中有兄弟姐妹十人，他是第五个儿子，排行第九。他父亲是一名秀才，在天津当盐务小吏，家中并不富裕，但他决心让他的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梅贻宝小时受过中国典籍的教育，然后进南开中学接受良好的中等教育。十几岁时他信了基督教，南开中学毕业后，去北京进了清华学校。1922年毕业后，担任了一年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享受旅行津贴的秘书，以后去美国。1924年获得奥伯林大学硕士学位，192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在著名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和哈佛大学的怀德海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1927—29年在德国科隆，他是科隆大学仅有的一名中国学生。他着重研究古代哲学家墨子，其成果表现在1929年在伦敦出版的《墨子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和1934年又在伦敦出版的《墨子——受人忽视的孔子的对手》二书中。

1928年，梅贻宝回国，执教于北京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在燕京的十年中，有八年他教哲学，同时先后担任注册主任，招生主任，学监，文学院院长。1934—36年应孔祥熙之聘，在山西太谷任铭贤学校（奥伯林——山西纪念学校）校长。孔祥熙是燕京和铭贤两校的主要董事。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梅贻宝历任多种行政职务。这些都是同扩充国民政府利益攸关和国防上需要的一些事业。1938—39年，梅贻宝任新设的兰州甘肃科学教育社主任，对西北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并推广本地的教育事业。1940—42年任工合会秘书长，检查了三个地区总部的工作，这些总部下辖十八个未沦陷省区的工会组织。

1942年2月8日，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孔祥熙在重庆召开了燕京董事会会议。由于校友的要求，燕京大学决定在自由中国重新开办，梅贻宝担任筹备复校办公室主任。经孔祥熙及其他大官如四川省主席张群的协助以及政府和教

济基金的资助，梅贻宝与成都华西大学合作。该校当时已容纳了三个基督教学校，燕京被准许租用华美女校、齐华小学的校舍和成都孔庙的房子。教职员召齐后，流亡的燕京大学于1942年秋开学。1942—46年，梅贻宝任燕京成都分校代理校长兼代理教务长。

战争结束后，梅贻宝回北京燕京原校从事教学和研究，仍任哲学教授。1948年12月中旬，共产党军队进入北平郊区，梅贻宝全家逃往上海，在圣约翰大学教书一学期，以后受芝加哥大学之聘，前去教书一年。他在美国期间，曾先后在印第安那、奥伯林、普林斯顿、辛辛那提、华柏斯、波顿、普尔杜等大学任客籍教授。1955年，任衣阿华大学中国东方研究计划主任。

1945年，1951年，梅贻宝先后获得奥伯林、华柏斯大学荣誉法学博士、文学博士学位。他除了写作有关墨子的两篇著作外，又写作和出版了二十几篇哲学论文。《中国古传统的源流》一书中的六章，主要由他执笔。该书于1960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梅贻宝于1929年与倪蓉葵（译音）结婚。她是杭州一名牧师的女儿，1924年毕业于史密斯学院后任图书馆管理。1933年生子祖林（译音），他在耶鲁大学读书，后在哈佛大学教现代中文。梅贻宝的哥哥梅贻琦，多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孟 森 笔名：心史

孟森（1868—1938.1.14），支持立宪运动，进步党首领，有关明清交替时期历史的专家，北京大学历史教授。

孟森生在江苏阳湖县的名门之家，那里出了不少学者名人，他捐得秀才后不愿继续学习应科举试所需的科目而热心于学习时务。1894年郑孝胥出使日本回国后，其言语行动给孟森影响很深，乃决定去日本留学。1901至1904年他进东京法政大学学法律。

1905年春，孟森应广西边防大臣郑孝胥之请，去龙州做他的幕僚，从郑孝胥学诗，郑当时以诗作闻名并擅长历史著述。他在龙州收集官方和私人收藏的文献资料，加以研究，写成《广西边事旁记》，由严复作序，于1905年8月出

版。

1905年，郑孝胥辞职和孟森去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1908年7月孟森任《东方杂志》主编，这本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郑孝胥是商务董事。孟森对杂志版面作了全面革新，并增辟了讨论立宪政府的专栏。

1909年5月，孟森当选为江苏咨议局议员，辞去《东方杂志》之职。同年10月，张謇为咨议局长，派孟森去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考察，希望能联合各省上奏清廷成立立宪政府。有三个奏摺送达清廷，但未被理睬。1911年6月，孟森陪同张謇去彰德与袁世凯商量，以后他又去东北，与各省咨议局首领们联系。11月，他为由程德全指挥的江浙革命军进攻南京起草宣言。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大小党派纷纷出现于政治舞台，孟森任共和党执行书记，该党以黎元洪为首领。孟森致力于将各小党派合并成为大党。1912年9月，孟森和张謇，因建议创立华美银行和改革盐政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困难，被邀去北京与袁世凯磋商。孟森在北京暂留，后又回江苏竞选国会议员。他被选上并于1913年4月去北京就职。翌月，合并政党的活动取得成果，反对国民党的共和和其他两个政党合并组成进步党。孟森赞成建立责任内阁以限制总统权力，于1913年7月被选入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四个月之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而使国会陷于瘫痪。经此事变，孟森极为沮丧，从此逐渐退出政治生活。

1913年11月，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宋三太子史说永乐皇帝即位》一文后，被人们认为是关于明清之际的史学权威。1915年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董小宛考》，意在考证《红楼梦》中的一些人物乃出于清初皇室中人物。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三卷本《心史丛刊》。

1929年，孟森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副教授，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清朝前纪》。他精选宣传文字和传说材料，重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引起人们的极大注意。1931年，孟森任北京大学历史教授，使他能有机会利用故都的丰富资料进行明清之际的历史研究。他的巨著《明元清系通纪》的第一部分于1934年9月由北京大学出版。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时，已出版了十六卷，内容包括1371—1524年。其主要史料系根据

《明实录》和《李朝实录》，详尽地记述了满清的兴起及其对明朝的影响。在这本书中他纠正了不少国内和日本学者在史实及其解释上的错误。1936年出版的他的《八旗制度考实》，是研究清初政治组织的一本重要著作。

1937年春，北大师师生集会庆祝孟森七十寿辰，他写了《香妃考实》一文作为答谢。8月他写《海宁陈家》一文，以示日军虽占领北平也不能迫使他放弃学术研究。他还进修英语，写诗给朋友表达自己相信中国必胜的信心。他1937年患病，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前来看望他，他给郑孝胥写了几首诗斥责他与日本人合作。此后病情日重，于1938年1月14日去世。

1959年孟森的两本著作出版问世：一本是商鸿逵编纂的《明清史论著》，在上海出版，一本是由吴相湘编纂在台北出版的《清代史》。

缪荃孙 字：炎之

缪荃孙（1844—1919.12.22），著名目录学家，创办过好几个出色的图书馆。

缪荃孙出生在江苏江阴，是缪燧（死于1716年）的六世孙，缪燧曾任浙江定海知县，自1695年任职至死，他的德政使当地居民立生祠以示崇敬。祖父缪庭槐，1805年进士，任甘肃平凉知州。父缪焕章，1837年举人，曾在张国梁军中任职。1855年缪荃孙的生母朱氏因患疟疾死去，其父不久即再娶。

缪荃孙中秀才后几个月，1860年9月，太平军攻克江阴，不久他与继母逃往江苏淮安，在丽正书院读书，后他们一同随其父去四川华阳。1867年他在四川中举人试，因非川籍未能授名，当时，他已结识了广东目录学家李文田，劝他从事学术研究。

1874年，四川学部大臣张之洞请他助编《书目答问》，缪荃孙得以发挥其对目录学的知识，该书于1875年发行。缪以后在张之洞所办并主持的精心书院掌教，不久两人成为好友。

1876年缪荃孙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当时，张之洞回北京，主编《顺天府志》，编辑方针由张之洞确定，而实际编辑工作是由缪荃孙负责，缪并编撰其中地理、寺院、经济、官吏、文学、碑铭各编，府志于1884年完稿，1886年

出版。

缪荃孙除一度任京师学监外，他在翰林院先后在潘祖荫、徐桐主持下编写清代名人传记词典，谭叔裕曾一度与他共同编修。自这项工作脱手后，缪荃孙和徐桐为如何评价纪大奎（1746—1825）对经学的贡献而发生冲突，纪大奎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易经》的论文，该文主要谈论如何把《易经》用于占卜而很少涉及该书本身的评价，缪荃孙认为纪大奎应被看作是个星相家，而不是一个学者。

缪荃孙继母于1888年死后，他辞官回家守丧。他在王先谦主持的南菁书院教经书和文学。守丧期满后他返回北京，但不久因其父死于1890年而不得不再次离京，第二次居丧期间，他是山东泲源书院的主要讲师。以后他回到北京，作为翰林院编修，他从上司那里得到特别的荣遇，他们把他名列三等编修之首。但是审核任命的部门在徐桐坚持下，把他的位置降低到一百人以下。缪荃孙以辞职来回答。他受当时湘鄂总督张之洞之请去武昌编纂湖北府志。张之洞在南京任代理总督的短暂期间，缪荃孙应邀担任钟山书院的主要讲师，他任此职从1896年到1901年。

1901年张之洞在武昌召集国内著名学者开会讨论使中国近代化的途径和方法，会议结果之一是设立江楚（江苏、湖北）编译书局，以缪荃孙为主任。缪荃孙主持这个机构直至该局于1910年解散。该局出版了他的传记性著作《续碑传集》他是1881年开始编写这本的。

缪荃孙成为中国目录学的主要权威，并且指导开设和发展了国内两个最好的图书馆，即江南图书馆（即后来的南京国学图书馆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即后来的国立北平图书馆）。1906年，他创办江南图书馆不久，总督端方得悉，丁丙（1832—1889）的后裔打算出卖他收藏的珍本书籍《八千卷楼》藏书，他吩咐缪荃孙把它买下充实新设的图书馆，以免这套藏书重蹈陆心源的珍本书籍的厄运，那套书不久前才卖给日本岳崎的“静嘉堂文库”。京师图书馆是由当时的学部大臣张之洞在1909年向清廷建议而创办起来的。缪荃孙印行了他在北京发现的几种珍本书籍，其中包括由元朝的蒙古人从南宋朝（1127—1279）杭州内廷图书馆搬运来京后弃置不顾的一些书籍。他买

下了姚觐元的私人藏书来充实京师图书馆，他编了一本善本目录《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一本地方志目录《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这些书以后都在《国学会刊》中印行出版。

1911年民国建立后，缪荃孙住在上海，以大部分时间用于目录学研究。1914年他被邀参加编修清史（参见赵尔巽）。在停留北京的两年间，他重写了三十年前准备的许多传记并写了土司《土人》和明遗臣的大纲。他当时还帮助完成了江苏省地方志铭碑大纲，审阅了江阴县地方志。他于1919年12月22日死去，遗下续弦的妻子夏氏和二子二女。

缪荃孙著述丰富，又编纂过许多重要文集。“艺风堂”一词是他的几种文集的名称。作为一个诗人，他以体现宋代风格闻名，这种风格注重思想感情的真挚甚于辞藻的华美。他做为历史学家的贡献包括编纂了一部南北朝（420—589）名臣年表和一本近代（907—1125）文学大纲。缪荃孙编过一批丛书，包括1905年的“对雨楼”丛书和1914年的石园丛书。他为人们怀念最多的是他在目录校勘方面的成就，包括《艺风堂图书记》。由于他在这个领域的热诚努力和显著成就，校勘古书和印行古代善本书的事业遂得以流行于二十世纪的中国。

缪斌 字：丕成

缪斌（1899—1946），国民党官员，四十年代中曾在日伪南京政府中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据说曾充任国民党间谍，但在1946年被国民党处死。

缪斌的出生地是江苏无锡。他是一名道士缪谦常（译音）的儿子，幼年时在本地小学学习中国古书，成绩优秀。1918年去上海进南洋大学（后为交通大学）学习电机工程。1923年毕业后在铁道部门工作，1924年去广州加入国民党，在黄埔军校任电讯教官，后任政治教官。

1926年北伐开始，缪斌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北伐第一阶段中，任第一军王柏龄师党代表；不久与何应钦友好，何此时已继蒋介石任

第一军军长。1927年春，蒋介石实行清共，缪斌因有嫌疑被捕，经吴稚晖、何应钦营救免于处决。1927年4月，他由何应钦任命为南京政府总司令部军需局长，年底，又在调解国民党宁、汉、沪各派的特别委员会就职，1928年秋任职于新成立的行政院。

1928年，钮永建任江苏省主席，缪斌任民政厅长，管理全省县长和警察官员，后因贪污腐化于1930年初被弹劾，回无锡，与当地实业界人士来往。当时，他的老婆（她的情况少为人知）坠楼身死，缪斌乃娶经营新生纱厂、面粉厂的实业家荣宗敬的侄女为妻，荣任缪斌为他所拥有的各厂总工程师。但是缪斌仍盼能重回政界，主张中日合办一些企业，为少数国民党首领与退休北洋政客所赞同，但引起了不少国民党官员的敌视，认为他缺乏爱国心。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北平出现了敌伪政府。缪斌回故都，接受资助创办新民会，成为这个亲日的宣传机构的副会长。但敌伪政府某些首领认为他是他们的统治的一个威胁。1940年缪斌自觉留在北平有危险，乃去南京投奔汪精卫的伪政府，被任为伪政府考试院院长，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一年多后，任日伪组织东亚同盟文化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一个日本人赞助的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组织。

四十年代初期，南京伪政府上自周佛海下至低级职员，深感日本最终将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失败，纷纷通过特务头目戴笠与重庆国民政府当局取得联系，当了国民党的地下特工人员。缪斌送给上海的国民党特工人员情报和经费，把两个儿子送到自由中国，得到何应钦的帮助而进入国民党军队中。

1945年代初，谣传日本将与中国单独媾和，缪斌迅即充当国民政府使节去日本开始初步的和平谈判。他到东京，代表国民党于1945年8月与日本内阁总理小矶内阁商谈，不过缪斌此行是否得到国民政府的授意，尚未能确证。他和小矶会谈两次。但是日本最高军事委员会反对小矶的外交努力，并且怀疑缪斌是个骗子。小矶内阁于1945年4月倒台，缪斌亦回国，向重庆国民政府报告其出使失败的经过。

战争结束，伪政府的许多官员遭逮捕，但未触及缪斌。1946年初，缪斌进了上海战俘营，受到保护性拘押，而未被作为犯人对待。三天后，移送到南

京，住在总司令办公室。出于未经说明的原因，缪斌被移送到苏州，那里拘押了南京伪政府的高级官员，他迅即受审，判处死刑，并于1946年初夏被处决。

莫德惠 字：柳忱

莫德惠（1881—1968.4.17），满族官员，1930—31年任中苏中东铁路谈判中方首席代表。1954—1966年，任台湾考试院长。

莫德惠生在新疆，他父亲是从吉林双城调来的清军的一名将军。莫德惠幼年受中国古代典籍的传统教育，二十岁中试为秀才。他自天津北洋高等警官学校毕业后，任哈尔滨警察局长到1912年。民国成立后，当选为临时众议院议员。自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到1921年莫德惠任吉林伊兰道尹之间，他的情况不详。1922年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咨议。

他与张作霖有关系，又由于他的行政才能，莫德惠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农商部次长。1926年回东北，任奉天省长兼财政厅厅长。他从事改进奉天教育事业，并担任过一段时间东北大学校长。1927年他被任命为北京政府农商总长，直至1928年北伐军占领故都，张作霖决定离开北京时。莫同张同车返回东北，该列火车于6月4日遇炸，张被炸身死，莫受重伤，伤愈后，他转而在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处任职。

1929年中，政治军事局势混乱，中国企图收复中东铁路，驱逐苏联人员。12月初，莫德惠被任命为中东铁路理事长。12月22日签订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议定书规定恢复原状，为了解决中东铁路管理上的各项重要问题，原定在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开会，莫德惠任中东路督办，中国方面首席代表。但在1月初，中国方面认为哈巴罗夫斯克的全权代表蔡运升超越职权，准备废除伯力条约议定书的部分内容，而以1924年莫斯科与北京、莫斯科与沈阳所签订的条约作为会议议程的基础。莫德惠未按原定计划前去莫斯科，到南京与国民政府磋商。他于1930年5月才到莫斯科，直到10月才与苏方首席谈判代表加拉罕举行首次正式会谈。12月进行第二次磋商后，莫德惠回南京报告谈判情况。

1931年8月，他再到莫斯科，从4月到11月，进行了二十二次毫无结果的谈判。其后因日军侵占东北，会议已陷入无能为力的地步，从法律形式上说，它仍继续进行。莫德惠在莫斯科，据说，他在1932年12月中苏恢复外交关系的谈判中起了作用。当时，满洲国已成立，因而继续开会解决业已由日本控制的地区的中苏纠纷，再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意义了。会议遂于1933年休会，莫德惠随即返回中国。

1933年到1938年之间莫德惠的情况很少为人知道，这个期间他曾以无党派人士身份担任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任主席团主席。太平洋战争结束后，1946年1月他又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重开国民代表大会时他当了国大代表，任宪法实施委员会副主席，1948年9月任主席，1947—48年任国府委员，1948年为政府指定的民国副总统候选人，但为李宗仁击败，以后任总统府咨议，1949年在何应钦组阁时任不管部长。不久，由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争夺大陆控制权的内战中败北，莫德惠去台湾协助建立台北国民政府。

莫德惠在1954年台湾国民大会中极为显要，1954年中到1966年中，任考试院长，兼任宪法实施委员会主席。1968年4月17日因大脑血栓死在台北。

穆湘玥 字：藕初

穆湘玥，（1876、6、18—1942），实业家，以经营棉纺工业而知名。

穆湘玥，出生在上海，在全家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中，他最幼。母亲朱氏，是理财有方创设穆公正棉号的棉纱商人穆琢庵的第三个妻子。1881年六岁时，穆湘玥开始接受中国典籍的传统教育，1888年，他结束了正式的学校教育，去做一家棉庄的学徒。熟悉业务以后，他感到中国棉纱商人旧式经营方法和活动缺乏效率。1892年，穆琢庵死去，穆湘玥和他哥哥穆恕奉侍母亲。穆湘玥力图学习现代知识充实自己，尤其是在1895年中日战争中中国遭到失败，更增强了他的这个决心。1897年，他开始学习英语。1900年，他已掌握流畅的英语而通过考试进入中国海关服务。同年与金姓女子结婚。

海关的工作，使穆湘玥广为接触各界人物和各种思想，不久他开始学习西

方的政治和科学思想，他还努力使自己成了一个优良的公众演说家。1904年，穆湘玥加入沪学会，在多种行业中很为活跃。他企望出国学习经济。1905年任上海海关雇员俱乐部主任，他热情地推动俱乐部支持一个中国人抵制美货的行动，以抗议所传美国国内对华工的虐待。此举迫使他辞去海关职务，于1906年在上海龙门师范学堂教英语。在此期间，他为出国学习逐步制订计划。1907年他认为已准备就绪，辞去学校职务。最后他却不得不推迟行期，因当时他接受江苏省铁路界的使命去北方考察路警业务。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使命，以致铁路局决定委任他为铁路警察警察局长，他接受委任并任此职一年。华北之行，更促进了他希望深造的打算，中国广大的西北地区的落后状态，使他更加相信中国迫切需要发展工业，而农业又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因此他决定出国学习农业而不学经济。

穆湘玥没有正式学历，这是进国外大学的一种阻碍，为了补救这一缺陷，他进了万国函授学校，专攻英语和数学。1909年，三十三岁，穆湘玥离开中国去美国，他的亲友资助他的旅费，他在海关时的一个同事帮他进了威斯康星大学当了一名特别生。这一学年，他成绩很好，遂于1910年取得正式学籍。他又从江苏省得到官费补助，得以免除经济上的困窘而全力攻读。1911年，他转入伊利诺斯大学，1913年毕业，获得农业学士学位，接着又进得克萨斯大学学习纺织专业，1914年获得硕士学位。

1914年夏穆湘玥回国后准备创办棉纱厂，当时国内的棉纺业大都操在英国资本手中，因英国的注意力转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穆湘玥趁机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了厚生纱厂。一年后又创办了规模更大的德大股份公司纱厂。由于纱厂生产扩展，棉花的供应除附近的崇明、通州之外，需要其他地区补充。穆湘玥懂得工厂企业应该设在原料生产和集散地区，于是决定在河南郑州设立德大分厂，但有一些股东加以阻难，他们对近代工业的经营方法毫无所知，不允许远离他们活动的基地上海去别处设厂。穆湘玥就决定在河南独资开厂。1920年，豫丰纱厂投产，由于邻近原料供应地，和容易取得廉价劳动力，纱厂迅速得到发展。同时，穆湘玥开始试验用不同品种的棉花，他在厚生纱厂附近租了十亩地，种植从美国乔治亚州引进的棉种，并且对这种海岛棉和其他棉种的生长情

况进行仔细观察。

1920年，穆湘玥由于在上海协助创办了纱布交易所（一名中国棉织品交易所），而对中国的棉纺工业作出很大贡献，他任交易所理事长至1926年。穆湘玥在1920年由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聘为名誉实业顾问。他于1920年间在河南及其周围地区从事的救灾活动，使他更加看到那个地区的发展潜力。1921年，他的活动又伸展到另一行业，创办了劝工银行以促进实业。下一年，他以上海中国商会代表身份，出席檀香山召开的太平洋商业会议。

由于重新遭到英日资本的竞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繁荣一时的华商纱厂在1923年前后赢利开始下降。德大纱厂处于严重的经济困境，穆湘玥想增加投资，保守的股东们反对他，穆湘玥遂辞去公司职务。中国纺织业继续衰落，穆湘玥失去了河南的豫丰纱厂，但他力图保持厚生纱厂，并运用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的职务给以支助。在这些艰苦的年月，他从佛教找到了慰藉，他于1923年经太虚法师启悟皈依佛教。他清晰地回想起他为了寻求现代教育所经历的艰难，就出资帮助一些学生出国留学，这些青年人中有罗家伦、殷锡朋和经济学家方显庭等人。

1928年10月到1931年7月，穆湘玥在国民政府任职，在孔祥熙手下当政务次长，以后又回到上海。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与一些中国要人住在上海租界，组织公民联盟，为抗战募集款项。此后他去重庆，在行政院农业改进会任职，1940年国民政府设立花纱布统制局穆湘玥任局长，至1942年去世为止。

牛 惠 生

牛惠生（1892.6.14—1937.5.4），上海整形医院创办人，毕生致力于改进中国的医院条件，提高医疗水平。

牛惠生是美国留学生工程师牛商（译音），上海贝满女校教师倪桂卿（音）的儿子，出生在上海，父母都是虔诚的公理会教徒。牛惠生早年从塾师接受中国旧式教育后，进了英华公校和圣约翰中学。1907年进圣约翰大学。

1910年，牛惠生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去美国进哈佛大学医学院。1913年3月在提交一篇《论急性前部脊髓灰质炎》的论文后，被接纳进了鲍尔斯顿医学会。1914年获得哈佛硕士学位后，在麻萨诸塞、新贝特福的圣玛加医院当住院医师和外科医生，并在该院流动诊所小儿科工作。1915年8月回上海，在哈佛医校教解剖学。1915年他考察了中国公立医院和教会医院中骨科治疗情况，并决心专门从事骨科整形工作，以便改善国内残疾病人的处境。1916年，牛惠生得洛克非勒基金会基金去美国，在马萨诸塞总医院和儿童医院任骨科助理，又在波斯顿卡内医院门诊部工作，并在哈佛医学院教细菌学。1917年获得医生执照，在马萨诸塞总医院任骨科住院医师直至1918年5月。以后他去巴尔的摩，短期内在霍普金斯大学医院任骨科助理。1917—1918年间，加入美国医学会、马萨诸塞医学会、美国骨科整形医学会。

1918年，牛惠生回国，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整形外科主任直至1920年6月。1919—20年任北京医学会秘书，又在北京圣约翰大学校友会、华北哈佛俱乐部、华北美国各大学俱乐部任职。1920年去上海私人开业一直到1929年，同时担任上海玛格白特医院出诊外科医生并去苏州、杭州的医院当顾问医生。1922—26年任上海红十字医院总办，1928—29年任中国红十字会外科主任。他于1927年被选为美国外科医学院研究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得到这个荣誉。1929年他在上海创办了整形医院，这是当时远东唯一的整形医院，他亲自详尽地设计医院的建设事项，这个医院后来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模范医疗机构。

三十年代中，牛惠生任整形医院总办和外科主任，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经营这个医院。1931年，他的这个医院被用作讲授整形外科的红十字会医院，他为此感到高兴。他又拿出时间兼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和沪江女子医学院解剖学和法医学教授，并到中央大学医学院讲学。他还为工厂工人办了不少诊疗所，并不时在上海工部局医务处任职，又担任长江和黄埔江水利委员会的医官，沪宁铁路、沪杭甬铁路医学顾问，中华传染病医院总办和全国儿童福利协会医务主任。

牛惠生是一个很能干的行政人员，热心从事于改进中国医院的条件和提高医疗水平。他是1915年创立的全国医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并自1915年起即为中

国传道医学会（后为中国医师协会）的会员。1932年两会合并为中国医学会后，牛惠生被选为主席。他领导了为在上海建造学会用房的筹款工作。牛惠生身体从不强壮，为准备1934年在南京召开医学会会议积劳成疾，以后再未康复。他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于1935年负起更加繁重的责任，同意担任该会秘书长，直到培养出一个后继的年轻人来接替他。1935年他在广济医院开设残废儿童病区，1936年担任该院董事长，1937年任上海中山医院院长。1937年5月4日他因肾炎死在上海。

牛惠生受到他的中国同事和西方同事的共同尊敬，因为他是在中国发展现代医学的主要力量，他还努力倡导对工厂工人和儿童中的病人采取一种中国医学界过去没有的更加人道和科学的态度，他又是上海市民的一个知名领袖人物。他是圣约翰大学校友活动的领袖人物，一个共济会员和国际扶轮社成员。

牛惠生遗有妻许奕珍（译音）及子牛康明（译音）（1928—）。许奕珍是圣约翰大学历史教授许慧诚（译音）的女儿，她是金陵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学生，与牛惠生在1924年2月24日在上海公理会教堂结婚，这个教堂，是他家多年资助过的。牛康明自他父亲死后，在美国读书，是一名医科社会学病理学家。

钮永建 字：惕生

钮永建（1870—1965.12.24），革命党人，孙逸仙的军事助手，1927—1929年任江苏省主席，1933—40年及1949年任考试院副院长，1949年任考试院代理院长，去台湾后，仍任此职，一直到1952年退休。

钮永建的家庭情况及其早年生活不详，只知道他出生在上海近郊的乡村。1889年中秀才后，由江苏学政选送到江阴进南菁书院。1895年，愤于中国向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他放弃前途有望的地方民政事业，进了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于1900年获得官费去日本学习军事。他在东京留学生中极为活跃，其友伴有邹容。邹容激励人心的《革命军》一书于1903年出版前由钮永建作过润饰。邹容在本书中鼓吹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此时，钮永建与旅居横

滨的孙逸仙会见。

1903年3月，留日学生愤于俄国侵占东北，开会讨论如何抗拒俄国的侵略。大群学生决定组成军训团并志愿从军。他们派钮永建、汤尔和去天津与袁世凯磋商。袁竟拒不接见。1903年钮永建回国，在上海创办致公军校，该校除进行军事教育外，又用来掩护钮永建的革命活动。

1906年，广西太平墟地区军事参议官、钮永建在南菁书院的老同学庄蕴宽，请钮永建去广西边防处任参事并去龙州训练军队，钮接受邀请并偕同十余人前往。他每天拿出几小时来操练这支受训部队，并继续秘密进行推翻清朝的活动。以后他又受命在广西建立预备军校。

1910年，清廷得悉钮永建的活动，下旨逮捕。钮永建逃往香港，又登船去德国。1911年夏他回到上海，11月民军攻克上海时，钮永建在陈其美手下任职。驻沪宁的清军徐绍楨第七营举行反清起义，被忠于清廷的军队所镇压，但起义军队坚守镇江周围地区，并派人向钮永建求援，钮永建向上海商家虞洽卿借得巨款，给了他们很大帮助。不久，镇江知府与民军合作，徐绍楨任江浙联军司令。钮永建去松江争取支援以进攻南京，不久松江独立，钮当选为松江县长。

1912年1月，临时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钮永建任民军参谋次长。不久，孙逸仙决心把临时大总统之职让给袁世凯，钮永建等人作为特使去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的支持者们发起兵变制造袁不宜南下的借口时，钮永建所住旅馆遭到袁世凯部下的劫掠。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钮永建辞职。

1912年国民党成立时，选钮永建为荣誉顾问，1913年二次革命时，陈其美派钮永建率领一支由松江学生组成的小部队攻占江南制造局。进攻失败，钮永建和他的同志们逃往日本，此时，钮永建皈依基督教。钮永建在日本时据说加入了欧事研究会，这是国民党内一些不支持孙逸仙改组国民党计划的人所组成的团体。1914年冬，钮永建离日本去美国和英国，继续进行反袁活动。1916年6月袁死后，钮永建回上海。

1917年8月，孙逸仙发动护法运动，在广州南方革命政府就大元帥职。是年11月，钮永建奉孙之命抵广州，受任指挥十五个营并将这些营整编为一个

师，此后在孙的大本营中任副参谋长兼兵工厂长。1918年11月，有人谋刺钮永建，他因而受伤住院数周，伤愈后，辞职去上海。1922年夏，奉孙逸仙之命，钮永建去北方劝说冯玉祥支持国民党。1924年冬，再去北方，当时孙逸仙亦在北京，任钮永建、吴稚晖为政治委员。1925年4月孙逸仙孙世后，钮仍留北京，1926年才回广州。

北伐开始后，钮以国民党特派代表负责江苏党务去上海，他藏匿于法租界指导地下工作，对上海能和平地转入国民党手中起了很大作用。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对峙，钮担任秘书长之职。不久辞去此职而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27年底任江苏省主席之职一直到1930年3月。他在江苏组训民团和保安队，在穷乡僻壤也建立起了秩序。他实施土地测量和登记计划，改革警政，设立警务学校，创办师范学校，努力改进成人教育。

1930年，钮永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六个月后，改任考试院铨叙部长，1933年升任考试院副院长，1938年又兼任铨叙部长，1941年12月，辞去各职，原因不详。一个月后，任国民政府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主席至1948年。1949年3月再任考试院副院长之职，4月，改任代院长，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后仍任此职。1952年4月，退出政治生活。翌年去美国治病，1957年回台湾。1958年又去美国接受手术治疗，此后和他的女儿路易斯·李(译音)夫人定居于纽约成功湖。1965年12月24日死于肺炎，年九十六岁，遗有妻黄梅仙(译音)，一子桑戴克C·T·钮，女二人沈先华(译音)夫人及塞缪尔·莫伊夫人，孙儿十人，曾孙八人。

乌 斯 曼

乌斯曼(1899—1951.4)，哈萨克族的军事首领，因反对中国共产党于1951年被处决。

乌斯曼是吉雷部落人，出生在新疆东北阿尔泰地区的牧人帐篷中。新疆的哈萨克人是游牧民族，乌斯曼在牧人的帐篷中接受伊斯兰基本教育。十二岁时随从他的叔父博科·巴托尔抗击汉族时开始接触军事。此次起事失败后，乌斯曼

回到他父亲的处所，此后他的大部分教育内容都是学习骑射，饮马奶酒，而成长为一个好争斗的人，他以体魄高大强壮有力知名。

盛世才统治新疆时，乌斯曼在哈萨克部族中出了名。1937—1940年间，盛世才敌视哈萨克族人，逮捕其首脑人物多人，有些并被处死。1940年，乌斯曼动员族人起而反对盛世才的压迫，但其所部反叛势力还不足以推翻中国当局。1942年冬，乌斯曼的小小部队，被逐出承化，退到新蒙边境布尔根河上游，在外蒙古边境内的塔音库尔设立指挥所。他力求建立哈蒙合作。他从蒙古取得了一些军火和装备。不久，他拟定了在阿尔泰地区实施哈萨克自治和驱逐该地汉族军政官员的政治方案。此时，盛世才力图以武力镇压哈萨克人的反抗，包括用空军轰炸，消灭哈萨克人及其帐篷牲口。盛世才公开宣称，乌斯曼取得了苏联的帮助和指导，哈萨克人如不被镇压则新疆无繁荣与和平可言。

新疆哈萨克的活动，于1944年11月得到了支援，那时新疆西北伊犁地区发生反对汉族的骚乱。乌斯曼显然和伊犁军事首领阿里·汗·图雷订立协定，并趁汉族忙于对付伊犁骚乱之机，攻占了承化、塔城这两个阿尔泰地区的首要城市。1945年初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成立，乌斯曼任阿尔泰地区特别执行官，驻守承化。11月，他与外蒙古断绝关系，尽管那时他已与伊犁的叛乱分子开始有了纠纷。

1946年1月，张治中搞成了一个协定，在新疆成立有非汉族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但是协议签订后，那伊曼哈萨克部落仍支持伊犁集团，而乌斯曼为代表的基雷哈萨克族叛乱不久平息下来。1946年4月，乌斯曼以哈萨克同伙的名义，否认伊犁当局，斥责它是俄国操纵的，袭击其军营并向新蒙边境的山地进军。同年年底，乌斯曼接见了国民政府驻新疆军事司令宋希濂的代表，与先前的敌人汉族当局签订了协议。是年夏秋之间，他与部下同远处白塔山地区的伊犁部队发生冲突。1948年，乌斯曼表示强烈反对伊犁当局、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他对在新疆的汉人的继续支持使他获得这样的报酬：受任指挥三个保安骑兵中队。1948年，乌斯曼在天山建立指挥部，统率四千家帐篷，一万五千名哈萨克族人。1948年秋，美英两国记者如巴尼特、李普曼、莫里森，曾在天山指挥部访问过乌斯曼。

1949年，代宋希濂任新疆省国民党军事司令的陶峙岳转而效忠中国共产党，乌斯曼又重上战场。他率部向哈密进军，联络尧乐博士组织反共抵抗活动。1950年9月，乌斯曼被迫撤退到青海地区的一个新的基地。此时，尧乐博士认定哈萨克人企图保存自己反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已无可能，乃携同部属先到印度以便前往台湾。乌斯曼决定仍留在那里。1951年2月，中国共产党部队从哈密、乌鲁木齐进袭格兹库尔营地的哈萨克残部，俘获乌斯曼及其一个女儿和一些随从。乌斯曼被押送到乌鲁木齐，1951年4月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处死。

欧阳竞无·原名：欧阳渐

欧阳竞无（1871.11.20—1943.2.23），著名佛教居士，唯识宗代表人物。

欧阳竞无的父亲是清朝内务府一名官员，出生于江西宜黄，六岁时父亲去世，由母亲及母系亲戚们抚养。1890年捐得秀才，但他并不继续攻读求取功名，放弃了科举考试所要求的文体。不久，进南昌训导书院，专攻注重考据的汉学，兼修天文学和数学。1894—189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专治陆九渊（1139—1192）、王阳明（1472—1529）的学说，他们是两个反对儒家朱熹理学的新儒家学派。欧阳希望从陆、王的著作中取得救国之道。

1904年，欧阳竞无赴北京参加会考未中。他在回江西途中，在南京停留访金陵刻经局杨文会（字仁山），深受其影响而开始学佛。不久，在宜黄创办诚志学堂教书一年。1906年任广昌县教谕，因母病重而迅即离职。母死后，他悲痛欲绝，立誓成为一名佛教居士（在家和尚），按教规居士应断肉食、绝色欲、拒仕进。他隐居九峰山为母守丧，以求顿觉。一年后，去南京从杨仁山学习。

1907年，欧阳竞无因杨仁山之劝去日本学习密宗佛法。他在东京结识了研究佛学的学者章炳麟和刘师培。1908年回国，在广州优级师范教书。数月后，因病回宜黄。1910年又去南京从杨仁山学唯识、瑜伽宗。1911年杨仁山死，欧阳竞无接任刻经局编辑事宜。当国会中提出以孔教为国教时，欧阳竞无于1912年在北京、南京创办佛学会，并在成立宣言中严厉批评佛教僧侣无力卫护佛法。

1914年他作为刻经局编辑，刊行了玄奘自印度带回和由梵文译出的唯识宗经卷。

欧阳竟无不久成了一个著名的编辑和学者，吸引一大批研究佛学的佛门弟子。他向学生讲授唯识宗佛学，按年代顺序和发展情况，向学生们介绍早期小乘和大乘派的著作。1918年，欧阳竟无、章炳麟、陈三立等人在南京设立中国内学院，此后十余年中对佛学进行了许多可贵的研究。1922年7月，任南京佛学院院长，他初次讲学时，出席者有梁启超、张嘉森等佛学门徒。1925年，他和学院中四十多生徒开始编辑刊印唐代以来译自梵文的佛经一百多卷。1927年因政局动荡，学院又为国民党军队所占，工作被迫停止。1928年欧阳去江西庐山，与陈三立、梁启超研讨佛学。待南京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后，他又回到南京的佛学院。

三十年代中欧阳竟无继续有关佛学的编印、研究、讲授工作。1931年创办《内院年刊》和《内院杂志》，讨论和宣传唯识论。日本侵略中国华北的威胁出现后，他焦虑不安，1932年1月，他探访从前的学生、当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陈铭枢，要求对日本坚决实行武装抵抗。1937年夏，中日战争爆发，欧阳竟无把南京的佛学院迁到四川江津，继续主持该院工作，一直到1943年2月23日去世。

欧阳竟无早年就已结婚，1905年皈依佛教后，仍与妻儿同居。他的女儿欧阳兰死于1914年，次子欧阳东于1923年游泳时淹死，妻熊氏死于1940年，他的长子欧阳格是永丰舰舰长，该舰是孙逸仙当陈炯明1922年6月兵变时避难之处。

欧阳竟无是当时著名的佛教居士，因领导复兴佛教唯识宗而知名。这是由印度阿桑伽所创立而在第五世纪到第七世纪对中国佛学者发生主要影响的教派。欧阳竟无对唯识宗文献的贡献，见于他由中国内学院出版的佛经所写的前言及其《唯识抉择谈》一书，他反对净土、天台、华严宗所持的顿悟之说。他的名言“佛教既非宗教亦非哲学”，表达了他的观点：佛教是包举了人生各门原理的独特体系。二十年代中，他和太虚法师进行了一系列争论，太虚认为佛教需要与西方思想进行广泛的糅合，而欧阳竟无则反对此种糅合之说，主张谨守唯识宗的教义，他也不同意熊十力重建新理学以包括唯识宗的做法。欧阳竟无的著作《竟无内外学》在他身后出版。

欧阳予倩 原名：立袁 字：南杰

欧阳予倩（1887—1962.9.21），教师、演员、剧作家、导演，他的经历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电影的发展。

欧阳予倩出生在湖南浏阳，祖父欧阳崇古系清末江西臬司，外祖父系中华民国初年湖南督军。欧阳予倩十岁时，家仆在节日陪他去外祖父家观看京剧，欧阳予倩深为喜爱，嗜爱京剧的家仆乃教他在《梅龙镇》一剧中扮演花旦，此后欧阳予倩常模拟演员以自娱。

1899年，欧阳予倩去北京上学一年。在他去日本进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之前，曾在长沙经正中学读书。除1905年回国探亲外，他在日本逗留到1911年。欧阳予倩在以后回忆中谈到在北京上学时曾见到过京剧大师谭鑫培演戏，但印象并不深。直到在东京时，他才对戏剧大感兴趣。1907年2月，他观看了“春柳剧社”为徐州赈灾演出的改编本《茶花女》。“春柳剧社”是深受日本近代戏剧影响的一批留日学生组成的，这次演出，使欧阳予倩第一次看到了京剧以外的戏剧艺术。1907年，他被邀加入“春柳剧社”，在该社第二次演出《黑奴吁天录》时担任了部分演出。不久他成为该社的重要成员，并开始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舞台技术。当时妇女还未登台，欧阳予倩决定专演女角。

1911年，欧阳予倩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文科后回国，1912年到上海，成为陆镜如鼓励话剧而组成的“戏剧同会”成员，在当时著名的娱乐中心张园演出。1913年欧阳予倩住在长沙家中，1914年回上海参加“春柳剧场”的剧团，该剧团是陆镜如在前春柳剧社一些人的支持下建立的。剧团在上海南京路一戏院演出有一年之久，陆镜如死后，剧团解散。

欧阳予倩在上海戏剧舞台上逐渐以扮演花旦而著名。他是他家族中第一个演员，这个成就就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当时京剧界演员大都出身于戏剧世家。欧阳予倩像梅兰芳那样，进行了把传统戏剧同新式服装和技巧结合起来的试验。1918年张謇在南通创立近代社团，请欧阳予倩前去主持训练演员的伶工学社，欧阳接受邀请，着手改革该校课程和教学方法，取消体罚，增设课目，以便演员

在舞台训练外又受到良好的一般教育。该校拥有自办的戏院和音乐研究部门。欧阳予倩在南通停留三年后又回到上海舞台。

1923年9月，欧阳予倩加入了谷剑尘等人创办的上海戏剧学社，筹备演出话剧。该社演出了欧阳予倩的两个剧本：《泼妇》和《回家以后》。1925年，欧阳予倩暂离上海，去长沙组织现代剧团。两年后，他又去南京与田汉等人经营新创办的国民戏场。1929年主持广乐戏曲研究所。

1930年后，他不再扮演旧剧演员，去欧洲访问，1933年两次去苏联，又去德国和著名电影制片人会见。1933年冬，他参与了福建事变，后在日本避居半年。1934年回国，与新华影业公司合作，1936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任首席剧本编纂。1938年去香港，为一部以著名的中国女英雄的事迹为基础的古装影片《木兰从军》写剧本。又利用闲暇，编选古剧，组织剧团。

1939年秋，欧阳予倩去桂林，任广西艺术馆长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主任。他在桂林一直住到中日战争结束，其间写了一些宣传剧本。1946年回上海，在新中剧社工作，并写了电影剧本《关不住的春光》，1947年率领新中剧团去台湾，1948年在香港居住。

1949年4月，欧阳予倩到北平，即成为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6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7月任全国文艺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中央戏曲研究所所长，1950年该所与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及华北大学戏剧系合并改组后，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1949—1952年他又是中华全国文艺界联合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3—1961年任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委员，1949—1953年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及文化部电影指导及戏剧改革委员会委员。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陪同梅兰芳去日本，并继续以大量时间从事戏剧工作。1962年9月21日在长期患病后于北京去世。

欧阳予倩一生从事戏剧，是旧剧和话剧的演员和剧作家，又是演员的导师、革新家、电影演员、导演和制片人。他的一生，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和电影的发展。他以自己的才华和知识，力求保持传统戏剧的地位又致力于新戏剧运动的发展。

白崇禧 字：健生

白崇禧（1893—1966.12.2），桂系将领，其中包括李宗仁、黄绍竑等人，1946—48年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1949年底去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白崇禧兄弟三人，排行第二，出生于广西临桂县三威村一个回族农民家庭。他们这一家族历代务农，据说白崇禧出生之前多年由四川迁到广西。他初受中国古书的传统教育后，去会仙镇上中学，1906年十四岁时，进了广西初级陆军学校。同学中有李宗仁、黄绍竑。不久，应家庭要求退学，进了一个文科学校——广西政法学校。1911年底，武昌起义和广西宣布独立后，他离校参加学生军敢死队，黄绍竑是队里的一个班长。该队北上武昌，但未能赶上参加战斗，旋即转往南京后解散。遣散的学生兵进了南京后备班，后又转往武昌第二陆军预备学校。

1914年冬，白崇禧和他的同学们毕业后，去北京见习六个月。1915年6月，进保定军官学校三年级，同学中有黄绍竑、夏威。1916年底毕业后，他伴同毕业同学三十六人，向北京政府申请去新疆前线服役。北京政府虽接受了申请，给了他一个任命，但此行又在1917年取消。

白崇禧回广西，在桂军第一师任见习军官。1917年夏，广西督办公署建立模范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马晓军任营长，其部下军官有白崇禧、黄绍竑、夏威等人。不久模范营奉命去湖南参加护法之役，担任广西督军、湘粤桂护法军司令谭浩明的后卫，模范营增设机关炮连，白、黄、夏同为副连长，共同统率该连。

1918年秋，谭浩明被吴佩孚击败，模范营改组，白崇禧、黄绍竑分任连长。1919年初，桂军撤回广西，模范营担任桂西警卫，在清剿土匪的战斗中表现了战斗力。是年冬，马晓军因剿匪有功，所部扩编为模范团，并率部前去广东肇庆接替当地警备部队。1920年末，奉陆荣廷之命，东进去广州任警卫。10月，桂军被陈炯明的粤军所击败，被迫沿西江北岸撤回广西。模范团与李宗仁

部会合，任后卫。

1921年2月，白、黄回广西后，随同马晓军去百色。6月，粤桂重开战，陈炯明的粤军不久进占广西。模范团力图保持中立并征集兵员。马晓军把它改组成为由五个营组成的部队，白崇禧任第二营营长。当部队为刘日福的广西自治军包围后，白崇禧率随从数人脱逃。增募兵员后，马晓军任白为第二团团长。1921年底粤军击败刘的部队，马晓军等人遂回百色。其间白崇禧在一次夜间巡视中坠崖，跌断一腿，还伤及别处，乃将团长之职交给黄绍竑而去广州医治。

1922年夏，白崇禧到广州。1923年2月孙逸仙回广州后，请白崇禧回广州劝黄绍竑就任广西讨逆军司令，希望他率军击败沈鸿英，当时黄正在梧州沈鸿英的部队里。沈鸿英出征部队在广东失败后，是年秋黄绍竑占梧州，进而组成广西讨逆军，以白崇禧为参谋长，并与李宗仁在郁林的广西“定桂军”密切合作以击败省内其他部队。当陆荣廷、沈鸿英争夺广西时，白、黄、李决定与沈鸿英联合。1924年6月，他们的部队占领南宁。翌月，两军合并组成广西“定桂讨贼军”，李宗仁为司令，黄绍竑为副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指挥兼参谋长。9月，陆荣廷战败。12月1日，广西“定桂讨贼军”撤消。此时，白、李、黄都已加入国民党。李任广西绥靖督办兼桂军第一军军长，黄绍竑任绥靖会办兼桂军第二军军长，白崇禧任绥靖督办公署参谋长及桂军第二军参谋长。1925年初，桂军与李济深的粤军第一师合作，把沈鸿英赶到湖南。不久，云南督军唐继尧打算派兵经广西去广州，企图继承已于3月12日去世的孙逸仙。此后发生的桂北战争中，白崇禧参加了在沙浦的总攻，取得胜利。唐继尧的败军退出广西，白崇禧又协助扫平在广东的熊克武军。其时，他的策略才能使他获得了小诸葛之称，表明他不愧为三国时大军事家诸葛亮的后继人。

1925年底，广西已处在这三个桂系人物的控制之中，两广密切合作的谈判已经开始。1926年3月，经长期谈判，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白崇禧任参谋长兼第二旅旅长，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同月底，派白崇禧、陈铭枢去长沙劝唐生智联合国民革命军。由于他们成功地争取到了唐生智的支持，国民革命军在北伐途中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开端。北伐开始，白任国

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1926年11月，国民党军占领南昌，他受命指挥追击部队总指挥。其后他和由广东东江出动的何应钦协同行动，推翻福建督军周荫人。

1927年初，白崇禧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2月18日他的部队攻占杭州，3月22日攻占上海，他兼任淞沪警备司令。4月，他受权在上海清除共产党，4月12日袭击工人纠察队，解除其武装，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下令枪杀著名共产党人及其他左派人士。从此，在上海轰轰烈烈的共产党活动被扑灭。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政府相抗衡，任命白为第二路军代司令。6月，白参与攻占徐州，进军山东，接着因军政局势不稳，撤回苏北。

1927年8月，蒋介石为国民党的团结起见辞职去日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于是改组为军事委员会，以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为常务委员。8月，三人战胜了渡过长江到达龙潭企图重新占领南京、上海的孙传芳军。9月15日，南京、武汉及西山会议派代表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政府职权。武汉的唐生智反对这种重新统一的措施。10月南京当局任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李宗仁为总司令，出兵讨伐唐生智。11月初，白部攻占武汉，唐生智被迫暂时辞职。1928年初，他又进一步攻入湖南，追击唐生智残部。唐部不久投降，并于1928年2月与其他部队合并组成第四集团军，由李宗仁、白崇禧分任正副总司令。此时，白同时任新编十三军军长，该军是由十四军和第七军第二旅新组成。1928年6月，白参加了向北京的进军，经此役后，北伐结束。北京为国民党军占领后，白统率由四个集团军组成的混合部队，奉命扑灭长城以内的北方军阀残余势力。白于完成此任务后，率军回北京，任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委员。经白本人请求，他被派统率华北的第四集团军去开发西北。

1929年初，桂系与蒋介石冲突，蒋派唐生智去华北收回白崇禧所统率的湘军。唐一举成功，白逃回广西。3月26日，撤消李、白本兼各职，并斥责其背叛政府。3月27日，将他们开除出国民党。白崇禧、黄绍竑进攻广东未成，随即又遭刘建绪袭击，桂林亦为刘所占领。继黄绍竑之后，任广西省主席的俞作柏率军于6月27日占领南宁。白、黄经印度支那，去香港与李宗仁会合。11月，三人回广西，在南宁建护党救国军。李为司令，黄为副司令兼广西省主席，白为前敌总指挥。

1930年1月，桂军和张发奎第四军攻打广州，旋即被击败退回广西。5月，这四名将领决定进兵湖南攻占武汉，以支援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联盟，但在洪桥战败，桂军残部退回广西重新组合。黄绍竑因反对继续内战，乃与桂系分裂。

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在南京被捕，5月汪精卫、陈友仁、陈济棠等政治领导人在广东成立反对派政府，开辟了广东和广西和解的道路。军事联盟于是形成，粤桂联军于9月初进入湘南向国民政府挑战。9月18日，日本攻占沈阳，国民政府呼吁全国统一。在取得释放李济深、胡汉民以及蒋介石临时去职等结果以后，广州政府自行解散。11月，白崇禧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2年4月，李宗仁任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二人遂以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与建立武装的三项政策，开始重建广西的工作。其中心环节是建立民团，白任广西省民团总司令，负责全省民团建设事务。

直至白崇禧实施新的方案以前，“民团”是一个旧词汇，其人数略多于“民兵”。新制度则要把民团建设成为一种政治机构。三十年代初，广西有九十四个县（后增为九十九个），总人口约一千二百八十万，每县十个区，每区十乡，每乡十村，村是基层行政单位。当时广西约有二万四千个村。

据广西1933年6月的兵役法，规定18—45岁精壮男子须强制服役。未应征服役者，需入民团服役。其基层单位为班，包括九到十三个民兵。三、四个班组成排，几个排合成连，村长兼任他所辖的民团连长；几个连合成为营，营长由乡长兼任；几个营合成为纵队，区长兼任纵队长，每县有民团指挥部，县长任全地区各个纵队的指挥官。地区指挥部组成大约十二个师指挥部，均由不担任文职的现役军人负责。师指挥部全部由白崇禧统一指挥。

民团每人每年必须在业余时间内进行一百八十小时的基础军事训练。白崇禧设想使广西每一名成年壮丁都成为经过训练的士兵，遇有紧急情况，就可以在一夜之间经过有效的广播网，动员起一支人数众多的部队。民团组织又与省的教育制度相结合。民团大多数下级指挥员，都是不领报酬的志愿兵。他们在小学充当教师谋生，因此一个受过训练在民团任职的人要身兼三职——行权人员、民团指挥员和教师，而且在大规模的公共建设中，民团指挥员又是庞大的义务劳役

制度的指导者和工头。

在白崇禧的主持下，民团制度把广西变为一个能防范犯罪活动的军事政治组织。同时，广西又自行发展工业，从事建设公共工程。这些成就，使白崇禧和李宗仁成为全国有名的能干的行政官员和有效的群众组织者。

1936年6月，白崇禧调广西部队进湘南，并向粤桂军队下达总动员令。陈济棠、李宗仁这个行动的部分目的在向国民政府预示：有可能采取行动结束胡汉民死后广东的半独立地位，但其公开的宣传，是因为鉴于蒋介石不抗日而决意北上保卫中国。白、李任抗日救国第一军团副总司令，总司令为陈济棠。此举因广东空军投向国民政府而于7月失败。7月25日，国民政府任命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白了解其目的在将他调离广西而拒未接受。

1936年7月底，白崇禧、李宗仁在广西组织军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后经黄绍竑、程潜的调解，桂系首领消除了他们和蒋介石的分歧，接受国民政府的统辖，并以桂军改编为第五路军，以李、白为正副总指挥。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白崇禧去牯岭和蒋介石会商。白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和航空委员会委员，在这些岗位上，他在制定沪宁地区的作战战略上起了重大作用。以后又随同国民政府去战时首都重庆，参与制订战略，例如1938年的台儿庄之战。有时，也派他去协助前线司令官筹划作战事宜，又协助组织全国伊斯兰救国同盟（后为中国伊斯兰协会），动员回族支持战争，任该同盟主席。

1938年11月，白任桂林行营主任，统一指挥长江以南三个战区。1939年日军在广州湾登陆，侵略广西，白崇禧亲自指挥部队在昆仑关附近与日军作战。由于未能按照命令击退日军，被召回重庆。自此以后一直到战争结束，他任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长、军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席。

1946年6月1日，陆军部改为国防部，白任国防部长，陈诚为总参谋长。1948年，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当时国共争夺大陆的斗争达于高潮。白建议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设置一个单一的战区司令官，而蒋介石则主张分设华东及武汉的华中两个司令官，白由国防部长调往武汉。当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的地位恶化之际，召白增援，但为时已过晚。情况进一步恶化，白于12月末

迭次致电蒋介石建议与共产党谈判。这些电报，连同河南、湖南省当局的其他电报，是促使蒋介石决定于1949年1月21日辞职，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一个因素。李、白计划在长江设防，但蒋介石仍以总裁名义下令不予批准。此时，蒋已开始把军队向沿海岛屿撤退。白崇禧的某些部队被调往别处以后，在湖北、湖南、江西被共产党军所击败。10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重庆，白退回广西，准备在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建立最后立足点，但蒋介石又下令将他的大批部队调往贵州。1949年底，白从南宁飞往台湾。

1950年，白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并以国民党执行委员身份于1950—1952年参加负责台湾党务改组工作的一个委员会。1966年12月2日因心脏病死在台北，年七十四岁，遗有1925年结婚的妻子马佩常（译音）及子七人，女三人。

白 杨

白杨（1920—），著名电影女演员，以演出《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而闻名。

白杨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生活不详。据一些材料说：她于1920年出生在北京，十二岁时考入联华影业公司北京分校训练班后开始了舞台生涯。又有一些材料说她于1916年生在湖南湘潭。总之，她自毕业于北平戏剧专科学校后，加入唐槐秋领导的“中国旅行剧团”，开始了她的职业演员的生活，她也参加演出了熊佛西的一些描写乡村的剧作。她的生动演技和个性当即为人所注视，看来如果她后来不从事电影艺术，也必将成为一名领衔的正统女伶。

白杨演出的第一部电影，是1936年摄制、1937年放映的《十字街头》。这是与赵丹一起主演，沈西苓导演的明星影片公司出品。影片以失业问题为主题，对社会进行了很多暗示的批判。由于影片有着很强烈的反日倾向，上海工部局曾下令将其中的一个镜头剪掉以免刺激日本人。《十字街头》把白杨置于电影女演员的前列，由此，她也为前所未有的富于批判精神的观众所喜爱。她和胡蝶成为当时两名著名明星，不少批评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在她们两人中更欣

赏白杨的演出。

白杨又演出了另一些更流行的电影，如1937年的《社会之花》，1939年的《中华儿女》，1941年的《青年中国》。其在战后最为人所不能忘怀的是一部长片，即1946年拍摄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和1947年拍摄的《八年离乱》，1947年合并称为《一江春水向东流》，英文译名为“扬子江的泪水”。影片以反对腐败的政府当局为背景，描写了中国人民在抗战时期的变迁。影片长达四小时，在上海曾连续放映八十四天，创造了最高的票房记录。这部影片是昆仑影业公司的出品。

白杨在中日战争期间住在重庆，和剧作家、西洋戏剧专家张骏祥结婚。后来他们离婚了。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白杨仍在国内继续演电影。其中令人注意的两部片子，是1954年摄制的《为了和平》，1956年摄制的《祝福》。五十年代中，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荣誉的人物，她被观众投票选为全国最佳女演员。她又参与公众活动，在上海听众面前朗诵诗歌，又为执行不同的文化使命而出国，还担任电影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此时，她又与当过演员的电影导演蒋君超结婚，生有一子一女。

班禅喇嘛（九世）

藏名：罗桑图丹曲吉尼玛格乃朗结巴桑布

俗名：额尔德尼曲吉嘉措

班禅喇嘛（1883—1937.12.1），系转世佛祖。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04—09、1910—12年流放时，班禅九世成为西藏事实上的统治者，1923年11月，被达赖所迫流亡在外。

转世佛祖班禅八世登必旺修（稀世之圣）于1882年末去世，寻找他的继承人灵童的工作在高级僧侣贵族的支持下立即开始。候选的孩子中间有塔布地方的婴儿额尔德尼曲吉嘉措，有人散布了有关他的灵异和出众才能的传说。这个孩子满三岁时由大喇嘛组成的委员会进行了鉴定。1892年他的名字在拉萨按传统仪式由金瓶掣签认定，2月1日他在札什伦布寺坐床，是为班禅九世。

班禅青年时代在札什伦布寺潜心研究佛经经管该寺大宗地产，札什伦布寺在地域和政治的重要性上仅次于达赖喇嘛的首府拉萨。达赖十三世协助指导班禅的经学和心灵教育。1902年班禅朝拜拉萨，在达赖主持的授圣职的仪式上作了庄严的宗教宣誓，这件事在全藏欢庆几个星期，标志着班禅的灵性已臻成熟，并有足够能力管理札什伦布寺的世俗事务。

1903年，英国上校荣赫鹏逼令西藏实施中英协定条款，率军进占康巴宗，该地属于札什伦布寺管辖。班禅派使者要求英国远征军立即撤出他的辖区，荣赫鹏不理。次年又向江孜、骨鲁进军，大败前来拦阻的杂乱的藏兵，达赖弃国逃走，班禅成为西藏最高统治者。

达赖离藏期间，是班禅喇嘛艰难的年份，他受到外人(汉人及英人)和拉萨僧侣以及自己的追随者的贪婪阴谋的夹击。当时驻藏大臣有奏奏请清廷饬令班禅在达赖出走期间以摄政身份兼管前藏政教事务，班禅因这种做法既违反西藏僧侣统治的习俗，又碍于与达赖的师弟之谊，拒不接受。

不久，1904年9月，西藏噶厦被荣赫鹏强迫签订协定，西藏事实上成为英国保护国。这个协定虽然解决了西藏和印度的英国政府之间的争执，但达赖仍未返回。在达赖继续出缺期间，班禅却因成功地解决了国际争端而增加了权力和威信。1905年冬，由英政府邀班禅去印度会见威尔斯亲王后，班禅的地位更高了，班禅和英国人都把此行看成是自愿进行的。北京政府却认为这是屈从于外国帝国主义觊觎西藏的图谋。北京政府遂要求英国公使通知印度英政府，中国政府将拒绝承认班禅出访期间可能签订的任何协定。但是英方对班禅并无任何强求。他于1906年初回西藏。负责处理印度政府与锡金、不丹、西藏关系的英国官员柏尔于1906年访问班禅，发现班禅热望离开拉萨而独立并作为独立国家的统治者与英国政府打交道。

但不幸的是班禅并无足够的机会和权力来操纵西藏，即使在达赖出走期间。札什伦布寺的世俗权力只限于它自己的范围，达赖的势力甚至达到离班禅的权力宝座不到几里的日喀则地区。虽然班禅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他却仅仅是一个菩萨的化身的达赖掌握较少的宗教权力。达赖世系在喇嘛教中的排行在班禅之前，而且他又是西藏的神王真腊子。总之，班禅的地位是无法与达赖匹

敌的，但是这两个神人之间却颇有齟齬，尤其是政治方面。各大寺庙喇嘛之间历来又多妒忌和阴谋诡计，双方随从官员又通过阴谋活动大大扩大两人之间的裂缝。1909年12月，达赖回西藏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未恶化也未改善，因为1910年2月达赖被迫再次离开拉萨。新的驻藏大臣联豫要班禅在达赖出走期间到拉萨管理西藏，班禅应命到拉萨，但他却从住在印度的达赖那里取得指示，并遵照达赖的命令离开拉萨回到札什伦布寺。

1911年中国革命发生时，达赖仍在印度，下令力阻中国军队进占拉萨，但班禅从人及一些在拉萨的大吉岭寺院的喇嘛对这些命令并不在意，只是由于英方在北京的干预，中国军队才撤回。1912年底，班禅为对经历十天路程来自拉萨的达赖表示谦恭，陪同达赖合作返回他的首府。但班禅同驻藏大臣及对1910—11年中国当局企图进占西藏表现的无能招致达赖的严厉批评。达赖的随从人员援引传统规定指控班禅破坏这些规定，和联豫建立政治关系，并企图统治西藏，其他一些偶然事件更增加了他们的不和。其中之一是班禅在1902年访问拉萨时曾错误地允许他的随从在经过布达拉宫时继续打鼓。达赖为这次犯规罚了班禅一百五十两银子。

1914年班禅向拉萨发信要求达赖在拉萨接待他并为他祝福，1915年9月达赖答以因政务繁忙，而班禅自己又正在监督塑造弥陀佛像的工程，建议延期访问。由于各种原因，直至1919年12月班禅终于能够到拉萨接受达赖的祝福。当时，达赖已决定与汉族政府解除传统关系，自建近代化军队，集中管理内部事务，由此又对班禅管辖地区增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特别是向班禅增收赋税。1923年11月，达赖责令班禅缴纳五百万两银子及大批粮食、牲口支应乌拉，并去拉萨磋商，班禅乃逃离西藏。

班禅出逃期间的活动很少为人所知。在危险地摆脱了达赖派出的一支骑兵部队的追赶以后，1924年初的几个月中，班禅显然是在外蒙古。1924年6月，班禅到了兰州，向北京政府派出代表两人。大概是为了谈判他的前途，他于1925年正月到达山西太原，北京政府执政段祺瑞派来代表，班禅逃离山西去北京。到达首都后，北京政府以国宾之礼欢迎他，提供他一个住处和可观的津贴，封给他“宣诚济世”名号。他在北京停留一年多，因北伐军即将威胁北京政府而

离京。于是他去东北和内蒙东部地区作宗教朝圣活动。1928—30年，班禅应各旗头领之请，举行了四次“时轮金刚法会”。

班禅在举行佛事时声称得悉天意“蒋介石主席可以统一中国，致民生乐利”。南京国民政府显然认为可以利用班禅重建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于是在1929年1月，任班禅为蒙藏委员会委员；一月后，其随从罗桑坚赞被任为委员会的西藏事务主管，兼班禅驻南京办事处主任。

1931年2月，蒋介石邀班禅去南京，名义上是为了询问边情。班禅乘专车离辽宁到南京，受到高级官员的热烈欢迎。班禅誓言拥护国民政府，声称“三民主义与佛教精神一致”。1931年6月，国民政府给以可观的津贴和“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一个月后，应呼伦贝尔都统之请，班禅回到内蒙东部地区“宣化”，并宣达国民政府的“德意”。9月，日本侵略东北，班禅离开呼伦贝尔住在德王王府中。1932年4月，他到绥远百灵庙，准备于7月举行第五次时轮金刚法会。在这些场合，信徒们要奉命向西藏的这个宗教领袖献出贵重供奉，结果常使那些地区贫穷匮乏。但是他的宗教活动业已确定，而且在1933年10月他又在北京太和殿举行第六次时轮金刚法会，参加的佛教徒估计有十万人之多。

1932年9月1日，达赖驻京代表贡觉仲尼以西藏三大寺院和西藏协商会议名义向蒋介石提交强烈抗议，要求取消班禅名号及其荣誉。这更增强了国民政府支持班禅的决心。1932年12月他访问南京时被任命为“西陲宣化使”，其使命是宣抚内蒙西部地区，使其继续忠于南京。当时德王由日本支持急迫要求自治。1933年1月，班禅去百灵庙和德王商议，当时德王在滦江任边防使并接受训练蒙军。1933年上半年内，班禅对蒙古西部地区王公统治者起了约束作用，但在1933年8月14日他们却打电报给南京告以他们打算建立内蒙自治政府。

1933年12月17日，达赖喇嘛死去，这是班禅获得统治西藏权力的最后良机。作为在南京的高级喇嘛，他主持了国民政府为达赖举行的追荐，他还派代表携带重金去其他地方举办追荐活动。此外他还要求国民政府给他原先的对手以死后追封。

1934年1月，班禅当选国府委员，2月20日宣誓就职，4月在杭州举行第

七次“时轮金刚法会”，6月访问上海，后回到南京，接着飞往北京。不久，他去包头地区，在伊克昭盟居住约两月。应阿拉善旗首领达王之请他前去宁夏，在亲王府设西陲宣化使署。三个月后，又飞往青海西宁，驻节塔尔寺，举行第八次“时轮金刚法会”，再一次利用这个机会宣达国民政府的“德意”。在西宁居留一年后，去了著名的拉卜楞寺，举行第九次“时轮金刚法会”。

在这期间，班禅渐渐而又坚决地向西藏边界前进。三十年代他返回西藏问题变得更为重要了。在考虑如何恢复中国同西藏的宗主权从属关系时，国民政府曾探询了班禅面临的问题及其返回西藏的可能性，达赖喇嘛答复称欢迎班禅及其追随者回藏是困难的，“除非他们能够对1923年的出走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1931年，国民政府曾两次派代表去拉萨，提出两个建议：达赖十三世欢迎班禅回藏，两人在藏政教权力“应维持原状”。南京使者谢国梁于到达拉萨前一日死去，但国民政府的建议看来是送到了拉萨的。不管怎样，班禅喇嘛不久得到来自拉萨的代表的通知，达赖乐于请他返回西藏并恢复其全部特权。于是班禅派出代表两人去拉萨，但他们到达拉萨后被告知，达赖必须同西藏人大会议量班禅回藏之事。在讨论此事召开的会议上，两个敌视班禅喇嘛的人操纵了会议，大会反对他回藏。班禅又派安钦呼图克图去拉萨继续商议，因达赖去世而中止。1934年1月，国民政府派黄慕松为驻西藏高级特派员。他与前藏摄政热振呼图克图商谈，摄政决定允许班禅回藏，但以不带庞大的中国护从人员，不在拉萨行使任何政治权力为条件。

1934年10月，黄慕松回南京建议武装护送班禅，1935年2月，班禅由五百人的一支部队护送。一个月后，黄慕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班禅回藏的计划开始实现。1936年5月，班禅向拉卜楞寺前进，国民政府派赵守钰为护送专使，班禅的随从农荣携带大量财宝，启程前去西康打箭炉，奉命到达一个预定的会合地点。实现班禅命运的时机似乎等到了。9月，他到达拉卜楞。途经不少寺院，终于到达青海南部的玉树。

班禅的行动，引起英国和西藏当局的特别注视。1935和1936年英国抗议班禅返藏计划，1937年班禅一行接近西藏边境时，又提出抗议。与此同时，拉萨

当局也决定以武力阻拦班禅回藏，因为他们认为班禅的返回是对西藏自治的威胁。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使这个问题变得暗淡了。但8月中班禅一行到达青藏边境的龙喜寺。8月24日，南京致电玉树，称国事危急，要求班禅暂缓回藏，赵守钰将此电送至龙喜寺，8月28日班禅收到此电。经商讨考虑后，班禅一行10月初在大雪中撤回玉树。由于此行的结果，班禅得了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于1937年12月1日死去。

1937年12月24日，国民政府追封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灵柩保存在玉树，直至1941年2月来自拉萨的官员护送班禅喇嘛灵柩返回札什伦布寺。

潘光旦 字：仲昂

潘光旦（1898—），社会学家、评论家，宣扬以优生术改进国民品质，以研究家族谱系而闻名。

潘光旦出生在江苏宝山，父亲潘鸿鼎（译音）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据他自称，他家庭是“半学半商，但无高官亦非豪富”。他受古书传统教育后进清华学堂，虽因参加体育运动受伤截去一腿，但并不影响他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出色成就。1922年毕业后，以庚子赔款基金去美国留学。进多德蒙学院，列全班第七名，成为美国学生联谊会会员，1924年获动物学学士学位。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两年，192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附近的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

潘光旦在美国学习期间，就注意到有可能将生物学原理应用于解决人类社会问题。此后二十年中，他以很多时间提炼和讲授优生学观点，并研究其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1927年他独自出版了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四种：《人文史观》、《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研究》、《优生与抗战》、《人文生物学论丛》

（该书以后以《优生概论》再版）。1928年，潘光旦暂时放弃了优生学的研究，写了《冯小青之分析》，以弗洛伊德的方法研究了清代著名诗人和音乐家，企图以此反驳罗素认为中国缺乏进行心理分析的材料说法。第二年，出

版《中国之家庭问题》，此书根据对《学灯》杂志读者的婚姻和家庭情况的调查，说明二十年代末在上海半新半旧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比完全旧式或完全新式的为多。1929年，他还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中国家谱学史略》，认为大量中文家谱材料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是很重要的。

潘光旦在此期间的著作中提出的两个主要论点，贯穿于他以后二十年的工作之中：第一，他认为人类需要通过生物遗传加以改进，对中国人尤其需要；第二，中国历史尤其是家谱族谱可用来作为优生学的证据。他的这两方面兴趣的结合，产生了一系列饶有兴味的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工作，它们在家谱材料的运用上起了开创作用。潘光旦还广泛地写了有关人口、节制生育、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性教育、民族健康等问题的文章。北伐胜利结束后的时期内，经常有人以斯宾格勒的腔调拿中国同日本和西方相比，谈论中国的“强”或“弱”。潘光旦把民族健康与优生学等同起来，认为中国只有按优生学原理发展人口，才有民族的健康，“民族活力”——当时的流行语——虽然有某种形而上学的涵义，但亦有与民族遗传能力的质量相关的具体的科学含义。他认为中国民族的力量将在对日斗争中经受考验。潘光旦于是翻译了英国心理学家霍里斯的《性的教育》、《性的道德》，两书均于1934年出版。

当时，潘光旦还是新月社的活动分子，其同人中有胡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等人。他为《新月杂志》撰文，创办新月书店，出版了不少当时名作家的书籍，直至因财政困难而关闭。他还一度主编上海《时事新报》的文学副刊《学灯》。

1930年，潘光旦任清华社会学教授，1936年任教务长一直到1946年。整个战争期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担任这些职务。在此期间，出版了两本令人注意的书：1930年的《读书问题》文集，1941年的《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他通过研究几个著名伶人家族的材料，分析了戏剧才能的遗传，认为不少著名伶人出身于少数家族，这是由于这些家族保持了必要的遗传因素。当然，潘光旦为了避免优生学派中最坏的极端性毛病，强调社会环境和生物遗传因素的同等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潘光旦对中国面临的政治社会前途远比对优

生学所展示的远景更为关心。他在昆明时，经常在学生团体作政论性讲演，并发表好些文章批评国民政府的政治和教育政策。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被刺杀后，潘光旦等一些知识分子躲在昆明美国领事馆中。不久，他出版了他对中国前途的设想的书《自由之路》，急切希望实现民主，他名之曰“贤人政治”。他把中国人的逆来顺受的特性同英国和美国人的有助于民主成长的特性作了比较，认为只有适应中国人的生活条件和特点实施民主原则，民主才能在中国发展起来。

1946年底，潘光旦回北平，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长。第二年，出版了他的两本最重要著作，一本是与费孝通合写的《科举与社会流动》，发表在《社会科学》杂志上。该文反对历来看法，认为清代科举制度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对非官宦出身的人来说是变得狭窄了，而非宽阔了。它指出，科举中试的人中，来自居住省城的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远比来自农村地区农民家庭出身的人为多。1947年出版《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指出某一家族一旦显赫，其声势可持续数代。他又与费孝通合编了费的两本文集：1946年出版的《人性与机器》，1947年出版的《生育制度》。

《科举与社会流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两书，使人读来——可能作者也企图这样——是对国民党的显贵和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隐晦的批评，因此，1949年共产党取得大陆的控制权时，潘光旦选择留在北平就不足为怪了。1949年1月，北平刚失陷，潘就被任为新建立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大学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成为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1949年12月，他以民盟代表身份出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

朝鲜战争期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潘光旦说美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人变成精神和物质上都按美国生活方式过活的寄生虫——从而消灭中国文化”。他斥责美国的对华友谊不过是掩饰其进行“文化侵略”的面具。此时，他放弃了关于民主和优生的观点，承认自己过去在研究工作中过分强调了“封建显贵”。他在与全慰天合写于1952年出版的《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中完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列举了自己一系列思想上的缺陷和错误，说明当时正在江苏太湖地区进行的土地改革的正确性。他说他的家庭十六代居住在城市

做读书人或商人，因而他的祖先毫不知道农民的生活情况。他本人十三岁离家，一直住在北京、上海、昆明和国外城市，因此他在访问江苏的时候有机会更多了解农民的生活感到高兴。

1954年，潘光旦任中苏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会理事。1957年他被派去湘西考察少数民族土家族，他的任务是以对土家族的研究为基础，提出处理整个少数民族问题的建议。他提出的为每个少数民族设立自治州（区）的建议，导致他在1958年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其他人员如雷海宗等一起被定为右派。人们指控潘光旦完全从社会学理论出发来判定民族问题，“根本不引用马克思主义，也看不见现实的需要和人民的愿望”。尽管有这样的批评，潘光旦仍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1959年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同年9月，摘去右派分子帽子。

潘 公 展

潘公展（1895—），新闻记者、出版家，创办《晨报》、《新夜报》。1939—41年任国民政府宣传部副部长，1942—45年任行政院图书审查委员会主任，1950年去纽约主编《中国论坛》。

潘公展原籍浙江吴兴，他出生在蚕丝中心南浔附近菱湖镇的一个中等人家。1901年他进入一个有英语、数学和体育等近代课程的学校，该校也教中国古文。不久进杭州第一中学，同班同学有徐志摩。1910年民国革命前一年，到上海进圣约翰大学，学文学，加入了同盟会的外国文学组织“南社”。作为“南社”的一名成员，他得以结识这样一些有才能的文人和革命家如柳亚子、叶楚傖、苏曼殊。

1919年五四运动时，潘公展在上海市北中学教书，参加群众集会和罢课，成为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行的一份日报的编辑。不久，大东书局请他写一部五四运动史《学生救国全史》，该书于1920年出版。

这些活动使潘公展取得了作家的声誉。新创办的《商报》主编陈布雷请他去当该报电讯编辑，他自1920年担任此职到1925年，同时还继续教书。由于

《商报》主要的经济支柱是广州公所、宁波同乡会等商人组织，因此它的编辑方针是保守的，但陈布雷、潘公展还是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支持国民党事业的文章和社论。1925年，潘受聘于上海两家最老的报纸之一《申报》，任电讯编辑。他在那里工作到1926年夏，因报馆老板和大部分工作人员过分保守而辞职。与此同时，《商报》则热烈报道北伐的胜利。1926年秋潘公展陪同陈布雷去南昌蒋介石临时司令部，受到蒋介石的热烈欢迎，蒋与陈果夫介绍他们加入了国民党。

1927年春，潘公展任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部委员，此后十年间，由于他与新闻界的联系和个人才能以及熟悉上海情况，成为上海市党政重要领导人。1927—1937年，他在上海市任社会局、教育局、农工商局局长。他在这些岗位上，对上海的社会福利、教育、商业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上海代表资格出席1929年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32年中日军队在上海发生冲突后，潘公展暂时脱离政界，经营《晨报》、《新夜报》、《儿童晨报》、《图画晨报》。1935年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潘公展为商务印书馆编辑抗战丛书。不久，日军占领上海，1938年春，潘公展去武汉，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0月蒋介石任命他为湖南省政府秘书长，他任此职为时约一月。11月，张治中因判断错误火烧长沙，潘公展遂去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1939—42年任宣传部副部长，从事宣传工作。1942年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负责经管国民党的独立出版社和正中书局。1942—45年任行政院图书审查委员会主任，审查煽惑性的图书杂志。由于他作决定时不得不遵守国民政府的文化教育政策，他不可避免地触犯了如郭沫若、田汉等左翼作家，他的审查活动很快招致共产党的仇视，后来把他定为“战犯”。

战争结束后，潘公展回上海，当《申报》发行人。日本占领上海时，该报曾落入汉奸之手；1945年末由陈布雷的弟弟陈训畲任主编。1946—1949年潘还任《新夜报》董事长、《商报》副董事长。1946年上海市参议会成立，潘公展任议长。由于中国和西方盟国之间缔结的平等条约的规定，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收回后，参议会能够对一个很大地区行使主权，因此议长一职是非常重要的。

的。潘有效而机智地履行了他的职责。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争夺大陆的斗争中获胜的局势已十分明显。11月中旬，潘公展的密友和同事陈布雷因感于危机将临而在南京自杀，几个月后，1949年5月，共产党军队抵达上海郊区，迫使潘公展离弃自己的家庭和事业。1950年他去美国，住在纽约，担任在纽约中国街出版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华论坛》主编。潘公展虽矢志国民党，但对台湾的国民政府有时也写文章进行批评。

潘公展与名画家唐容余（译音）结婚，她也是浙江吴兴人。

贝祖诒 字：漱菴

贝祖诒（1893—），银行家，以在中国银行首创外汇业务，并于1935年协助筹划货币管理制度而知名。

贝祖诒出生在江苏吴县的一个商人家庭，在本地陆家私塾中受旧式教育，十岁时去上海进澄衷中学，1907年回苏州进东吴大学，1911年毕业后，进唐山铁路学院学习两年；1913年南下任汉冶萍煤铁公司上海办事处会计。

1914年，贝祖诒开始了他的银行事业，任中国银行北京总行会计。1915年调往广州分行任代理会计主任，后任总会计师兼营业主任，1917年任分行副经理。孙逸仙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对分行不断要求给予大量的财政支持。分行经理因无力应付，去北京向总行辞职，遂由贝祖诒任代经理。不久他因对当地军阀要求给予财政基金置之不理而为他们所嫉恨，他们下令逮捕他以示报复，贝祖诒被迫逃往香港。

当时，广东省发行的纸币严重贬值，港币乃趁机大量进入广州。广州银行界的主要业务是处理外汇和穗港间划汇来往，因此贝祖诒早就熟悉了外汇业务。1918年中国银行广州分行迁往香港，指定贝祖诒经管，广州分行成为香港分行的支行，经营华南银行业务，但新的分行因总行投资规模狭小，以及人们还不愿立即把信用寄托在一个新银行身上，因此发展受挫。贝祖诒决定利用世界主要货币在不同地区的汇率差额，专营套汇业务，提高了他本人和中国银行的声誉。

1927年，贝祖诒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928年，中国银行改组为专营外汇的银行，贝祖诒被举为代表私人股东的董事长兼总行（已迁到上海）营业主任。1929年他以华方纳税人协会代表身份出席工部局。1930年任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任职前曾去英美考察银行业务。1931年回国后，他通令全国与外国通商口岸及商埠分支行都经办外汇业务，给中国进出口商号以信用贷款，并且给国民政府的代理商及内地愿意经营外国货物的商人提供保证金；对于经营华侨汇款的分行，则要求其努力为华侨增加方便。不久，贝还设法做到了使上海全欧外汇经纪人协会接纳中国经纪人入会。

外汇业务积累的资金，使中国银行能在国外设立分行、代办处，在纽约、伦敦、东京、大阪、哈瓦那、悉尼、新加坡、槟榔屿、吉隆坡、孟买、加尔各答、卡拉奇、吉大港、雅加达、西贡、曼谷、金边、仰光等地，都建立了办事处。在打破外国人对中国外汇汇兑的垄断中，贝祖诒起了重要作用。三十年代中，中国银行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在抗日战争期间，因为在自由中国没有外国银行，中国银行经营了全部公私外汇业务。

1934—35年，贝祖诒参与筹划了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当时国民政府放弃了银本位制，改行货币管理制度，新的货币称作“法币”。在其后年代，每当需要采取措施维持法币制度时，贝祖诒总是被召请提供帮助和建议。1937年7月爆发的中日战争，引起了财政困难和调整法币与外币比价的强烈要求，贝祖诒代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合作，共同经营外币交易，以维持公众信用。1938年中央银行停止外币以固定比值兑换法币后，贝的营业处与香港汇丰银行合作，以公开牌价提供外汇，避免了法币的急剧贬值。

1939年通货膨胀如此严重，已不能用通常办法维持法币币值，经汇丰银行要求，英国政府同意与国民政府合作，设立中英外汇平衡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汇丰银行、印度专利银行和澳大利亚合作，由中国方面出资一千万英镑维持法币。贝祖诒任五人委员会中国代表。1941年基金用尽，中英美平衡局随之建立，由美国政府出资五千万美元，英国政府出资五百万英镑，国民政府出资二千万美元。贝祖诒是参加五人董事会的三名中国代表之一，另二人为中央银行的席德懋和五人董事会的董事长陈光甫。

1941年，贝祖诒任中国银行代总经理。任职期间，他为促进工农业生产尽了很大力，给生产部门提供财政帮助，并且参加兴办了不同的企业。1944年他作为一名中国代表陪同孔祥熙去美国，出席在新罕普什尔州布莱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货币财政会议。1945年又去美国，与美国官方商议由美国给予战后复兴贷款五亿美元，以维持法币币值。国共两党敌对行动的爆发，迫使谈判停止。

1946年8月到1947年4月，贝祖诒任中央银行行长，他力图使中国经济稳定，但因国民党有增无己的军费预算和猛烈的通货膨胀，他的努力严重受挫。1948年，贝祖诒出任去华盛顿的中国技术代表团团长，于1949年赴美商讨有关美国援华问题。1952年11月，他出任纽约斯泰公司顾问，直至1959年。此后在陈光甫的香港上海商业银行任行长，从此他就常在香港纽约两地奔走。

贝祖诒诸子中的一个儿子贝聿铭（1917—）于1935年去美国学建筑，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建筑师。

溥 儒 号：心畲

溥儒（1896—1963.11.18），画家、书法家、诗人。

溥儒出生在北京附近的宛平，是醇亲王载沣的兄弟载洵的第二个儿子。他和兄弟溥伟、溥惠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弟。他在北京受旧式教育后，于1914年去德国进了柏林大学，1917年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同时带回了被他的母亲认为不适当的对自己成就的骄傲感。不久他发现天文学在中国没有出路，奉母命退隐北京西山戒台寺，离群索居了几年，终日吟诗作画，自号西山逸士。

1926年，他在北京展出绘画，树立了作为一个画家的名声。他是笃信传统的人，认为诗词、书、画应该并重。他勤奋地学习作诗，擅长书法，师承颜真卿、柳公权而自成一家。此外，他又爱好琴棋和精美食物，由于挥霍无度，不会营生，不谙事务，他的遗产逐渐用尽。为谋生计，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美术学院教画，还接受私人学生。

中日战争期间，溥儒留居北平。1947年，他不再厌弃政治，当选为出席国民大会的满族代表。年底去杭州，卜居朋友家中，准备遍游国内名山，但因发

生国共争夺大陆战争未能成行。1949年5月，据说毛泽东曾请他来北平，溥儒登船去了仍在国民党手中的舟山群岛。

1950年，溥儒去台湾，在台湾师范大学以教书并出售书画谋生，后来又成了中国纺织公司经理。他在台湾，仍穿着传统的儒家门徒的长袍，要学生行儒家的尊师之礼（包括跪拜）。他抽烟抽得很凶。1963年3月，溥儒经医生检查患有咽喉癌，但他不信西医，不愿做手术。他经中医多方治疗无效，于1963年11月18日死去。遗有妻李慕容（译音）和两个儿子：小华、毓琪（译音）。

1963年，台湾教育部资助出版了溥儒的《寒玉堂论集》。他在死前自行出版了两卷《画林云叶》。死后，台湾历史博物馆为他设立了陈列馆，陈列他的绘画和作画工具。

溥 仪 字：浩然 年号：宣统

西名：亨利·溥仪 满姓：爱新觉罗

溥仪（1906—1967.10.17），清朝末代皇帝。

溥仪出生在北京，是醇亲王载沣的儿子，光绪的侄儿。1908年光绪临死前，满清皇室主张以道光的曾孙年龄较大的溥伦或溥伟继位，声称他们有优先继承之权。而专横的慈禧却于11月13日在大臣会议上宣布由溥仪继位，因为醇亲王的妻子是她的一名宠臣荣禄的女儿，她遂决定由他们的长子继承皇位。

溥仪于1908年11月14日继位时还不足三岁，12月2日正式登位。循旧例，1909年改年号为宣统，醇亲王摄政。根据1861年咸丰死后慈禧确定的一套复杂的皇位继承办法，溥仪入嗣同治兼祧光绪继其皇位，光绪的寡妇隆裕为太后，成为溥仪的法定的母亲。

在隆裕太后和醇亲王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中，隆裕取胜。在中国革命党人、列强的要求和隆裕弄权的联合压力下，醇亲王于1911年12月11日退位。隆裕并于1912年2月12日下旨溥仪逊位，享有优待条件。溥仪虽然丧失了在中国的政治权力，但是按照优待清室条件的规定，在逊位后仍保持原有地位和大清皇帝名号，他甚至被准许“作为一种临时措施”继续住在紫禁城内，待适当时

候迁往北京城外的颐和园，民国政府同意每年付给皇帝四百万两，以维持他的机构。

1913年隆裕死，袁世凯要溥仪及其从人迁往颐和园，但皇族因这样迁移会削减其人员和收入而拒不接受，溥仪及其随从继续住在紫禁城内。

民国初年，民国政府中的某些满族贵族和官员继续支持旧的君主制度，其中之一是张勋，他原是要要求清帝逊位的一个人。1917年春，总统黎元洪召请当时以重兵驻在徐州的张勋调停黎和段祺瑞两个派系之间的争端。张勋率军五千人进入北京，强行解散国会，图谋恢复帝制。溥仪的师傅陈宝琛，曾任内阁学士和礼部侍郎，这次参与了复辟活动。但溥仪及其从人对复辟阴谋显然并未预闻。7月1日，十一岁的宣统被人安排上了皇位，据说当时他显得有点勉强。张勋、康有为启用御宝发了十九道“上谕”，宣布恢复清王朝和君主制度。张勋想控制帝权，自封为“忠勇亲王”、直隶总督、北洋大臣。7月12日，段祺瑞率军进入北京，复辟运动当即失败，但对溥仪在这次复辟活动中的作用未加追究。南方孙逸仙的追随者则主张废除优待清室条件，并将溥仪本人贬为普通公民。

1918年，徐世昌任总统，决定让溥仪接受新式教育。在此之前，溥仪一直受教于内廷三名师傅。1919年8月，徐任命英国公务人员庄士敦为教师。稍后，溥仪及其弟开始一起学习英语，由于历来禁止以名字称呼皇帝，溥仪决定在就读时使用“亨利”之名，他是从英王名单中选用这个名字的。但西方记者将两个名字都使用，因此西方人就把他称作“亨利溥仪”。

溥仪继续住在他的私人小天地紫禁城里。1921年，溥仪生母死，据说系被端康太妃辱骂后自杀的。1922年，决定让溥仪成婚。他从许多门当户对的女性照片中，选中了文绣，由此引起端康和敬懿太后之间的冲突，于是又改选端康的候选人婉容，她是世袭六等爵荣源的女儿。结果以婉容为后，文绣为妃。11月30日举行纳妃仪式，目的是为了使王妃来得及在皇后结婚之日迎接皇后。12月1日溥仪同皇后结婚，举行了盛大的皇家婚礼。

1923年6月，建福宫及其所有的珍宝(正在打算编制目录)为一场神秘的火灾所毁，溥仪决定结束紫禁城内他的机构的腐败现象。是年，溥仪革除了官中太

监千余人中的大部分人，并由郑孝胥革新宫中内务。但前任内廷总管绍英起而公然反对，并在三个月后取代了郑孝胥。1924年初，溥仪要庄士敦接管颐和园，作好迁移准备，当时溥仪第一次出宫前往游览。结果，溥仪并未迁往颐和园。冯玉祥反对他的上司吴佩孚，于1924年10月23日占领北京，11月5日派兵进紫禁城，要求溥仪签署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并将溥仪迁往紫禁城外的醇亲王府，派兵将他看管起来。据新任外交部长王正廷声明，此举系应国民公意而采取。北京当局向外国使节保证溥仪的生命财产将继续得到保护。修正案规定，废除大清皇帝称号，清室迁出皇宫，溥仪继续得到年金，宗庙“永远”得到供奉，清王室可以保有其私家财产。

溥仪及其从人并不安于在醇亲王府居住。1925年溥仪零零星星地将宫中珍宝运往天津，寄存外国银行以资安全。他还在天津英国租界购得一所住宅。11月29日，以张作霖、吴佩孚为一方和以冯玉祥为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导致冯放松对醇亲王府的看管，溥仪由庄士敦帮助，趁机逃往使馆区，躲入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处。溥仪拒绝其父要他回去的请求。芳泽经段祺瑞同意，第二天把溥仪的后妃也带到公使馆。接着又有恢复帝制的谣传，但据庄士敦说，年轻的皇帝丝毫没有参加恢复帝制活动的意向。溥仪在日本使馆一直住到1925年2月23日，那天，他乔装成学生去天津，住进日租界。这个第二次“出逃”是由郑孝胥策动的。

庄士敦说，与一般认为日本人企图诱使溥仪前往满洲或日本的想法相反，日方通过庄士敦本人告知溥仪，他如在日本或关东军租借地区出现，将使东京政府十分为难。溥仪在天津一个前清将领拥有的张园免费住了五年，进行了许多政治活动。他于1925年访问了张作霖，不久接见了张宗昌和由日本人及张作霖资助的白俄冒险家谢米诺夫。在其后年代里，溥仪给谢米诺夫可观的财政援助。他与张作霖、张宗昌的接触，可能带来政治上的利益，但因北伐军1928年的第二阶段进军而结束。6月，国民革命军进占北京后不久，张作霖即被日本人炸死。其后张宗昌曾要求溥仪出钱重建军队，遭到溥仪拒绝。

1928年7月，尽管“优待清室条例”规定对清皇陵进行保护，但仍发生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墓被盗的事件，两人遗骸被抛到地上肢解。国民革命

军没有用大力气预防和惩办应对这次亵渎事件的负责人。溥仪以后描述他对亵渎事件的反应，说他的“心里燃起了无比的仇恨怒火”，并发誓要进行报复。那时，他父亲醇亲王不敢住在北京，也迁到天津。

溥仪在天津时的三个主要顾问是郑孝胥、陈宝琛、罗振玉，他们之间互不相和，郑和罗又争风吃醋。罗振玉与天津的日本驻屯军有密切联系，1928年6、7月间事件发生后，郑孝胥也相信日本的政策有利于溥仪的前途。8月，他去日本，与民族主义的黑龙会的代表人物及日军参谋本部的人物商议有关复辟事宜。他回来时深感满意。1928年底，罗振玉迁到日本占领的大连。

1929年7月，溥仪迁往日本租界境内的静园，他在那里时一个重大的家庭危机发生了。一天，文绣出外到华界购物不回，溥仪感到自己皇帝的尊严受辱，拒绝离婚，直至1931年初文绣最后提起诉讼，他才同意离婚。文绣后来当了小学教员，死于1950年。

1931年7月，溥杰从日本旅行回来，他和日本子爵水野胜邦告诉溥仪：日方对张学良在满洲的统治不满，溥仪重新掌权的可能性增加了。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后，日本开始武力侵占满洲，这对溥仪有特殊的意义。他派代表去满洲会见内田康哉及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9月30日，溥仪和罗振玉在天津会见关东军参谋本部代表上角利一。11月初，关东军特务头目土肥原访溥仪，告以日军在满洲的行动目的只在反对张学良而对满洲并无领土野心，并愿意帮助满洲人民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日本将与以溥仪为首的这个独立国家签订互助条约。在回答溥仪的问题时，土肥原向他保证新国家将采取帝制，溥仪同意担任预定的角色。当蒋介石派代表见溥仪，说明优待清室条件可以恢复，如果他答应不住在日本或满洲，但溥仪并不改变主意。

1931年11月10日，天津发生由土肥原组织的骚乱，为实行戒严提供借口，溥仪由郑孝胥陪同，乘机秘密离开天津，乘日本轮船到南满。他们一行住在旅顺肃亲王善善之子的家里。在以后会见英国编辑、作家胡德海时，溥仪谴责国民政府违反逊位协定的每项条款，并宣称到满洲来全系个人意愿。但是恢复帝制的计划远不如土肥原曾经许诺的那样，向他提出的建议是当一个满蒙共和国的首脑。罗振玉坚持实行原先许诺的帝制，而郑孝胥却更倾向于接受共和制。

1932年2月18日，成立了以张景惠为首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布满洲独立，并将进一步成立共和国。溥仪后来指出，虽然郑孝胥赞同日本人成立共和国的主张，但他当时却拒绝这个安排，直至坂垣上校威胁说关东军将把拒绝这个计划看成是抱“敌对态度的证据”，并且答应在一年内建立帝制，郑孝胥才表示同意。在溥仪表示接受这个安排后，坂垣当夜举行宴会对这未来的满洲执政表示庆贺。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正式成立，3月5日，溥仪接受了满洲望族代表团的反复请求同意担任国家元首。3月7日，溥仪前往新京（长春），3月9日，就任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南京国民政府声称溥仪“甘当傀儡”应以重大叛国罪惩处。9月15日，郑孝胥和关东军租借地区总督、关东军司令官、日本驻满洲国大使武藤信义，共同签订承认满洲国议定书和互助条约。但不久表明，建立满洲国政府不过是为了让日本在这一地区的事务中有决定权。

1932年5月，溥仪会见李顿国际调查团，它是国际联盟设立调查与成立满洲国有关的情况的。溥仪宣称：满洲国是由满洲民众支持成立的一个独立国家。

满洲国有两个统治时期：溥仪任执政时的大同时期和1934年3月溥仪称帝后的康德时期。3月1日，满洲国改为立宪君主制的“满洲帝国”，二十八岁的溥仪登位。但他并非是个有权的统治者，不过是一个傀儡。他的正式作用与其说是行政的毋宁说是礼仪的。他的个人生活也同样不顺利，皇后婉容嗜吸鸦片，除偶而礼仪场合出席礼仪外，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1934年溥仪登位时，日本亲王秩父宫雍仁曾来参加。为酬答起见，1935年溥仪决定去日本作国事访问。他乘日本战列舰“比睿”号于4月6日到横滨，受到秩父宫雍仁亲王的迎接。他的这次访问被日本一个编年史家称作“是陛下前来向日本国自满洲国创立以来对该国一贯巨大的帮助表示个人的谢意”。溥仪本人在会见裕仁天皇时亦作了同样的表示。他是日本天皇接见的第一个外国统治者。

1935年5月2日，溥仪回新京后不久，关东军司令南次郎提出要撤换郑孝

晋，因为郑孝胥曾主张从日本人那里取得满洲国的一些自主权力。溥仪答应了这个要求，南次郎通知他关东军已经选定张景惠任此职。5月21日，郑孝胥辞职，张景惠继任内阁总理。

1937年4月8日，溥杰和嵯峨亲王的女儿、天皇的表妹浩子在东京结婚。在一个月之内，根据关东军的建议，制定了帝位继承法，规定皇帝死后由其子继承，如无子，则由其孙继承。如无子孙，则由其二弟继承（这是违反儒家有关继承权的规定的）。接下来就由二弟之子继承。溥仪认为，这一继承法的目的在于将他废除，所以溥仪自回新京后，不吃浩子送来的任何食物，不与溥杰随便说话，对他的日本副官吉冈安直亦开始厌恶。1937年他又娶满族姑娘谭玉龄为二房，但未生子嗣，谭于1942年死去。

根据日方的已定方针，满洲国于1939年参加反共协定，1940年5月，溥仪去日本作八天访问。溥仪事实上已无所作为，既不许提出他自己的大人选以供讨论，甚至不能过问政府事务，对“联盟”政策更不能置一词。日方的事务更不是这名傀儡“皇帝”所能关照或加以讨论的，然而日本的命运却决定溥仪的命运。

1941年12月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增加了满洲国在日本整个体制中的重要性，但是溥仪关于1942到44年的记叙只讲了一些日常琐事。1945年8月9日，他得到通知苏联已向日本宣战。8月11日晚，溥仪由其家属陪同离新京去通化，该地已被当作“临时首都”。当他得知日本投降时，发布了退位诏书。

1945年8月16日，吉冈通知溥仪翌日去日本。溥仪挑选了几个人乘小型飞机先到朝鲜再换乘大型飞机，其中有溥杰，两个妹妹和妹夫，三个侄儿，私人医生和随仆用人大李。溥仪、溥杰的妻子都留下。1946年6月，婉容在图门悲惨地死去，一起被监禁的浩子则活了下来写她的回忆录。

由于当时朝鲜天气恶劣，溥仪所乘的小飞机被迫在沈阳降落。8月18日，溥仪一行正在机场等候时，一架苏联飞机降落。突然袭击的苏军解除了日本卫兵的武装，溥仪一行被捕。次日，他们全被用飞机押送到苏联境内的赤塔。在去赤塔途中，溥仪所做的最初几件事之一是通知苏联军官：他非常讨厌他的长期的副官并希望把他调开。他的要求被批准。他从赤塔被解往伯力，并被监

禁了五年。他的沉闷单调的生活于1946年8月解除了，当时他曾在东京审判战犯时出席作证。他出庭八次，声称他在满洲国所作的一切都是被迫的。他把自己做满洲国皇帝以及与日本合作归罪于坂垣和其他日本顾问、副官及其同僚。

1950年8月1日，溥仪等“战犯”由苏联政府移交给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被监禁在沈阳附近的抚顺。两个月后，又押送到哈尔滨，关在一个满洲国时期建立用以监禁反叛分子的监狱里。溥仪在那里停留两年，经受了令人精疲力尽的中国共产党的所谓“学习”。他被告知他须改造并写出交代及自我改造的材料。溥仪按时写出了他的自传的前半部分，声称他是于1924年被庄士敦所“迫”逃往日本使馆，又为日本“劫”往满洲做皇帝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完全相信一个人第一次的坦白交代，并要溥仪继续努力改造。

不久，1956年7月，在沈阳审判满洲国中担任要职的日本人时，溥仪出庭作证，审讯开始前，作为他们的“交代”的一部分，中国犯人和溥仪揭发了日本人“压迫”的详情。审讯期间，溥仪详细地说明了几年前就已为人所知的事：他在满洲国是没有权力的，一切都是由日本总务厅长官和关东军司令部做主的。

据溥仪后来自述，他的“改造”开始于1955年1月1日，此后他就作为一个好的毛主义者而讲真实话了。1956年起，他自己的命运和满族的命运都按毛主义的教诲来安排了。他从沈阳出庭作证之后，开始接见外国来访者和接受邮件。1956年8月，路透社记者齐普到抚顺采访，说溥仪“一副可怜相，穿着黑色上衣，口袋上织有名字，裤子也是黑色的”。

1959年9月24日，毛泽东下令大赦溥仪等“战犯”和“反革命分子”，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释放溥仪，他已在苏联服刑五年并在“他的”满洲国服刑九年。

1959年12月9日，溥仪回到他离别已有三十五年之久的北京。他的父亲醇亲王已于1951年在北京死去，他的叔父载涛仍活着，在新政权下担任几个职务，包括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溥杰于1960年11月被释放后回北京，又与浩子会见，住在醇亲王所有的一所宽敞房子里。

据1960年4月的报道，溥仪在一个植物园机修车间劳动。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发表这个报道时，引述了溥仪的话：“曾经做过皇帝的溥仪已经死去，现在的溥仪是由共产党给我以新生命的溥仪”。溥仪于1962年5月1日与杭州一名姓李的护士结婚。1963年3月他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职。1967年10月17日因癌症死去，年六十一岁。

1964年在北京出版了他的经过编辑和扩充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由杰纳翻译的《从皇帝到老百姓：爱新觉罗·溥仪自传》两卷集的英译本，1964—65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萨镇冰 字：鼎铭

萨镇冰（1859—1951.4.10），清末海军统制，后在北京民国政府服务，历任吴淞商船学校校长，淞沪警察督办，兵工厂督办，海军总长，福建省长。

萨镇冰原籍福州，出身于小康之家，家学渊源，幼年受旧式教育，考中秀才，后决定从事海军。当时福州是海军的训练中心，有利于实现他的这个选择。1877年毕业于福州水师学堂，成绩优良，受到海军大臣沈葆楨的注意，派他和严复以官费去英国学习海军。萨进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顺利地完成了航海要求和学校课程。

1879年回国后，在清朝水师服役，曾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官，黎元洪是他的学生。1894—1895年中日战争时任巡洋舰舰长。他在几处服役后，1903—1906年间任广东水师提督。1906年奉命研究改组海军，不久完成任务，又回到实际指挥岗位。1908年末升任海军上将。

1909年，萨镇冰随同载洵亲王去日本、欧美考察海军，在英国时英皇爱德华七世曾授予勋爵。1910年回国，任清海军统制。1911年武昌起义时，率水师前去镇压。萨率领的水师起先对清朝的指挥官冯国璋等很有帮助，但是舰队上汉族官员的力量很快压倒了满族官员并宣布支持革命。黎元洪待萨以师生之礼，派人通知起义的海军指挥官保护萨。萨镇冰离开驻九江的舰队，去英国领事馆避难，后又逃到上海。鉴于他对清廷的忠诚，他被任命为海军大臣。

1912年，民国元年，萨任吴淞商船学校校长，训练商船人员。翌年，任淞

沪水陆警察总办。他在创立上海华界现代警察方面的成就深受袁世凯的赞赏，8月，袁任命他为兵工厂总办。在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后，萨仍效忠北京政府。他挫败了陈其美于1915年12月在上海煽动海军起义的活动。12月5日，陈其美部下指挥的肇和舰按预定计划起义，因原定支持起义的一艘兵舰在萨的干预下未予支持，起义受挫，亲袁势力由此取胜。不过他们的优势是短命的。1916年6月，袁世凯死，萨镇冰退出政界。1917年6、7月在护法运动期间曾一度任海军总长。

1918年萨回到政界，任福建清乡督办。1919年初出使欧洲考察海军，12月，在新云鹏内阁任海军总长。1920年7月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倒台后，萨一度任代理内阁总理，然后回故乡。1922—1927年任福建省长。

1933年11月20日，陈铭枢由十九路军支援举行福建起义，萨镇冰曾与其事，参加11月21日临时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在福州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起义者谴责蒋介石并主张抗日，萨镇冰任新政权的政府委员及其所辖四省中的一省省主席。1934年1月，起义者认识到他们无力抵御国民党军队的压力，蔡廷锴为不使福州被毁，决定撤出福州，萨镇冰监督起义者的撤出和国民党军队的接管工作。

萨镇冰一直静静地住在福建，直至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战争年代他在东南亚，1945年回福建。1949年共产党接管大陆后，萨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任全国委员。1951年4月10日，他死在福州，年九十二岁。

商 震 字：启予

商震（1884—），阎锡山部下，1928—29年、1929—31年、1936年先后任河北、山西、河南省主席。1944—45年率领军事代表团去美国。

商震的家庭情况和早年生活不详，他出生在河北保定，祖籍浙江绍兴。早年受军事教育后，在奉天任师参谋官，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12年民国成立后，在山东任第二混成旅旅长，同年年底，调任陆军部顾问。1913年6月到9月间二次革命时，因有反袁嫌疑被捕，不久释放，在河南澠池任职。

1914年，在冯玉祥姑丈陆建章手下任团长，1914至1915年在陕北剿匪。

1916年，商震带领他的一团军队到山西投奔阎锡山，不久他从山西第一混成旅长升为山西暂编第一师师长，太原兵工厂督办，晋南镇守使。1926年9月，阎锡山任命商震为绥远特区都统。阎锡山决定支持北伐时，商震任国民革命军北路军第一军军长。1927年，阎锡山的部队改编为第三集团军，商震任该集团军北路前敌总指挥。1928年在北伐最后阶段，商震任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其所率的第一军首先进据保定和北京。

1928年6月底，商震因参加北伐有功，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河北剿匪司令、平津警备副司令（司令阎锡山）。不久，又成为北平政治分会委员。1928年10月阎锡山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时，商已握有指挥平津警备部队的全权。1929年10月，任山西省主席，同年底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当时，他已认定，为了发展个人前途必须与阎锡山脱离关系，因此未参加1930年的阎冯北方联盟。

1930年，商震任第四军军长，1931年任第三十二军军长。1931年8月，徐永昌继他任山西省主席，他改任第三集团军北路剿匪司令。1933年初，任华北第二军团司令，在长城冷口击败日军。1934年6月初，任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官长。1935年回华北任塘沽警备司令、天津市长。何梅协定签订后，任河北省主席，升任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1月，调任河南省主席，年底调任在华北的第二十军团司令。

1939年，商震任第九战区副司令，1940年任第六战区司令，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1941年兼任外事部主任。1944年，他担任军事代表团团长去美国，任务是去获取战争物资的供应。挑选商为团长是鉴于他的军事知识，熟谙英语，和打马球的技能。1946年商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处中国首席代表。1946年10月，何应钦接替他的这些职务。商回国任蒋介石的副官长。

1947年4月，商震去日本任盟国管制委员会中国代表兼驻日使团团长。1949年共产党占领大陆，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商震退出政界生活，在日本过着舒适的退休生活。

邵力子 字：仲辉

邵力子（1882—1967.12.29），教师、新闻记者，国民党元老。1933—36年任陕西省主席，1940—41年任驻苏大使。1949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多种职务。

邵力子出生在浙江绍兴，是一名官僚的儿子。幼年时，由塾师授以古典籍。其父大约死于1897年，之后邵力子住在外祖家。1903年中举人，后在震旦学院、复旦大学就读，他一面读书一面在低年级授课。1907年毕业后去日本学新闻学。大约在1908年加入同盟会，何时回国不详，人们只知道他于1910年在陕西的学校里教书。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邵去上海任《民立报》、《民心》报记者，参与当时的新文学运动。1915年，他和叶楚傖创办《民国日报》，任主笔十年，同时又在育智师范学校和复旦大学教书。他加入国民党，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陈独秀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在1920年会见了共产国际的代表伏伊廷斯基，并于是年夏天参加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但在共产党成立前已与该小组脱离关系。1923年，他和叶楚傖、柳亚子成立“新南社”，意图创立中国的新文学。

1925年夏，邵力子去国民政府所在地广州，任黄埔军校秘书长。8月，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去张家口出席国民党会议。1926年1月，任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11月去莫斯科，以国民党“友好代表”身份出席共产国际第七届扩大会议，以后又进了中山大学。1927年宁汉分裂后，他回到中国。1928年2月，蒋介石重新上台掌管统一的国民党后，邵力子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蒋介石总司令部秘书长，他与陈布雷、周佛海为蒋介石起草政治文稿。

1931年2月，邵力子和江苏宜兴的傅学文结婚（邵力子的第一个妻子王氏于1919年在上海去世，生有子女各一人）。傅系邵力子在上海大学的学生，后来一起在中山大学学习。同年，邵力子放弃蒋介石秘书长之职，任中国公学、复旦实验学校校长。12月，任甘肃省主席。当时，甘肃省前任主席马鸿宾于8月

在兰州为叛军拘捕，甘肃形势困难，邵力子起初不同意，最后终于接受并于1932年4月就任。1933年4月，由朱绍良继任，他改任陕西省主席。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邵力子也被叛军拘禁。西安事变结束以后，制订了新的全国性战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邵力子在政治上发挥新的作用。1937年辞去陕西省主席之职，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直至1938年。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任国际反侵略同盟中国分会副主席，又任国民外交协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副主席，军事委员会战区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政治学校政务委员。他的妻子傅学文在重庆也很活跃，主持全国赈济委员会妇女援助会。1940—42年，邵力子任驻苏大使，1943年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和宪法促进委员会秘书长。

他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时，在1945—46年与共产党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于1945年8、9月到重庆时，邵力子和张群、王世杰与周恩来、王若飞进行具体谈判。1946年1月他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正如他在中日战争初期曾经促进中苏合作，他现在要为谋取国共之间的了解而努力。

1946年内战重开时，邵力子任国民大会筹备会主席、宪法起草委员。1946年底召开国民大会时，邵力子为国民党代表。1947年任国府委员，社会经济研究会委员，1948年任国民政府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辞去总统职，邵力子任五人和谈代表团团长，共产党拒不接受与这个代表团谈判，邵乃参加由颜惠庆率领的非官方代表团于2月间去石家庄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4月，他又作为国民政府正式代表团成员去北平。和谈失败，邵和他已到北平的夫人留居北平。他成为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主席团成员、全国委员会常委。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邵任政务院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全国文艺联合会委员、外交学会委员。1952年任政务院劳动就业委员会委员，1953年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理事。

1954年，邵力子作为浙江代表和政协常委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年再次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并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邵力子还因大力主

张节制生育而知名。

1955年邵力子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大会。是年，他成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和参加国际议会联盟的人民议会同盟的成员。1956年3月去斯德哥尔摩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回国后，任政协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同时任推广普通话为主要任务的中央工作机构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7年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解放台湾委员会主席。1959年作为浙江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和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六十年代，他因高龄太大减少了活动。他于1967年12月29日死去，年八十六岁。

邵 飘 萍 原名：振青

邵飘萍（1889—1926.4.26），新闻记者，北京《京报》主编，1926年以所谓图谋叛乱被处死。

邵飘萍出生在浙江金华，其家庭情况及早年生活不详。只知道他在1907年进入杭州的浙江高等学校，同学中有后来成为国民党要人的陈布雷、邵元冲。1911年民国革命那一年毕业后，任杭州《汉民日报》主编。1913年二次革命时，因撰写支持孙逸仙的社论被袁世凯的支持者所拘禁。数月后获释出狱，逃往日本，那时还有不少国民党人也在日本避难。邵飘萍在东京结识了新闻界著名人物湖南人章士钊，当时章士钊正主编月刊《甲寅杂志》。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邵飘萍去北京任上海《申报》、《时事新报》记者。1917年1月，章士钊在北京把《甲寅杂志》复刊改为《甲寅日刊》，邵飘萍成为该刊的积极撰稿人，在章离京时，代任主编。

邵飘萍感觉敏锐，文笔有力，很快成为北京新闻界知名的人物。1920年创办《京报》。该报以批评皖系军阀而闻名，后因受官方压力，邵逃往日本。1921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新闻系教授。1923年出版一本有关现代新闻学的教材《新闻学总论》。二十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动荡的政治局面下声名日盛，他通过公开发行的《京报》的社论，充分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对时政发挥了支持和影响作用。

1925年，邵飘萍在《京报》上支持冯玉祥，企图把他争取过来。他又准备请北京大学的一些激进派教授主编文学付刊。当时国共合作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因此谣传邵飘萍与苏俄驻北京使馆的宣传部门有联系。不管其真伪如何，谣言本身已使邵飘萍处于危险境地。1926年春，张作霖击败冯玉祥进占北京，邵飘萍避入使馆区六国饭店。4月24日，经过一个中间人保证他的安全后，他离开使馆区，但当即被军警逮捕，指控他接受苏联驻北京使馆的津贴，犯有谋叛罪。虽经友人营救，仍于1926年4月26日在天桥处决。有一些报纸暗示他可能是罪有应得，另一些报纸却把他作为遭军阀杀害的烈士来赞扬。之后，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当了《京报》发行人，保证了该报的继续出版。

邵元冲 字：翼如

邵元冲（1888—1936.12.14），孙逸仙、蒋介石的亲密助手，1928年后，在南京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和副官，1936年西安事变时，中流弹身死。

邵元冲出身于浙江的书香门第，八岁丧父后即由其师长舒更惕（译音）抚养。1906年进杭州浙江高等学校，1909年毕业。他在校时参加了同盟会。1909年通过考试就任江苏清江地方法院法官，数月后即离职去日本，会见了孙逸仙。1911年回国去武昌参加民国革命。不久成为新闻界人物，1912年任民国新闻社主编。国民党成立后，孙中山任命他为该党驻上海办事处编辑主任，负责市内联络工作。

1913年夏二次革命时，邵元冲任国民党江西湖口总司令部秘书长。9月，二次革命失败，逃往日本，任《国民杂志》编辑。他协助孙逸仙于1914年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1915年，邵元冲和陈其美一起回上海，在长江一带发展孙逸仙的势力并准备反袁起义，12月，邵元冲和蒋介石参予陈其美策动的在上海劫夺肇和舰一举，但未成功。

1917年，孙逸仙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任邵元冲为总司令部总务长，后又升任代秘书长。1918年中，南方政府落入桂系手中，孙逸仙去上海，邵元冲趁孙逸仙政治生涯中的这个间隙时期，于1919—1924年间出国。他去美国，先

后进了威斯康星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后又在美国旧金山、西雅图和加拿大维多利亚、多伦多创办华文报纸。1923年夏去欧洲考察在英、法、德各国的国民党组织的党务。当时，孙逸仙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并派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去莫斯科考察军队组织。邵元冲于1923年11月奉孙逸仙之命去莫斯科参加代表团工作，11月底回德国。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邵元冲在党内地位迅速上升。是月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邵元冲仍在欧洲，但已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又选为正式委员。夏天，当他回广州时，他进入中央政治委员会，又任党的海外部副部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又升任政治部主任。9月，邵元冲在上海和张默君结婚，戴季陶是介绍人，于右任是主婚人。

1924年底，孙逸仙离广州去北京与北方军事当局商讨实现全国统一问题，邵元冲陪同前往任机要秘书，掌管通信、会晤和各种旅行安排。在北京，他还在政治分会任职，并主编《民国日报》。他一直同病中的孙逸仙密切接触并亲历了孙于1925年8月逝世前订立遗嘱的情况。在1925年11月的西山会议上，邵元冲与张继、谢持、邹鲁等人一起反对汪精卫及苏俄在广州的顾问鲍罗廷。邵对国民党内支持联共政策的人表示不信任。1926年邵任国民党青年部长。

北伐开始后，邵元冲是浙江政界的重要人物，1927年任政治会议浙江分会委员、杭州市长。1928年回到华南，任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秘书长，主编《建国周报》。年底，邵元冲到南京，任立法委员，兼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主任，积极参与制订经济法和劳工法。在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兼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副主任（1930年后为主任），主编《建国杂志》。1931年初，胡汉民和蒋介石破裂，邵元冲任立法院副院长，直至1935年12月。1931年后他还在国府委员会及其外交委员会中任职。1935年春，他利用任职之机和他的妻子游历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年底出版了旅游记《西北览胜》一书。1935年12月，邵元冲任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

邵元冲在三十年代持久的政治斗争中，坚决站在他的同乡蒋介石这一边，受到蒋的信用，担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公众关系助手，其地位与后来的陈布雷相

似。当时邵元冲继续大量著述用正统观点阐述孙逸仙的政治理论，尤其重视孙的心理建设理论。他还从事写诗和书法。

1936年底，邵元冲陪同蒋介石去西安和东北军将领进行商谈，当时他们强烈要求成立抗日统一战线。12月10日，他向全国发表一个广播讲话，呼吁中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解救民族危机。四天后，他在西安事变中流弹身死。自那天起张学良和杨虎城逮捕了蒋介石，并将其拘禁了十一天。邵遗有妻子和子女各一人。

沈钧儒 字：衡山

沈钧儒（1874—1963.6.11），法律学家，历任清代、民国、中央人民政府官员，民盟的重要人物，1956年起任民盟主席。

沈钧儒出生在浙江嘉兴，其家庭情况及早年生活不详。1903年中举人，1904年成进士，任刑部七品京官，以后去日本，进东京政法大学，结识许多同盟会会员。清末立宪运动高涨时，他回到浙江。1909年任浙江咨议局副局长，筹备省自治，兼任杭州高级师范校长。

1911年革命和民国政府成立后，沈任浙江教育厅长，北京众议院秘书长，他当时是国民党员。1913年二次革命后，10月，沈钧儒和其他一些人脱离国民党，与进步党的一些人物组成了民党党。此举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大体一致，说明沈钧儒认为中国需要的是重新建设，而非革命，而袁世凯则代表了一种稳定势力。但当袁世凯压制国会，准备称帝时，沈钧儒加以反对，去上海当律师。1917年孙逸仙在广州成立军政府，沈钧儒担任它的法律总顾问。后又回北京在国会任职，但他在二十年代时的活动很少为人所知。

北伐时国民革命军进据浙江，1927年沈钧儒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1930年起，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不久因其在法律界的声望，被选为上海律师公会主席。此时，他不再担任政府官吏，但仍从事政治活动。1932年12月他参与创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12月，成立全国救国联合会上海分会。1936年1月，与邹韬奋等二百多名作家、新闻工作者与律师组成文化界救国联合

会。5月底，组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通常称为救国会），发表题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宣言，据说是由沈钧儒执笔的。7月，沈钧儒和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联合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要求停止国共内战、和红军进行谈判、释放政治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8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公开信，说明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合作，这个响应使国民政府某些官员认为全国救国联合会是和共产党串通的。

1936年11月23日，因支持上海日人工厂内工人的罢工，沈钧儒以“串通共产党以谋推翻政府”的罪名被捕。同时被捕的有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他们都是救国联合会活跃的领导人，被人称为“七君子”。他们先后在上海工部局、苏州高等法院拘留所被监禁了二百五十天。沈钧儒在上海监狱时每天早晨写字不辍。在苏州时因他有许多亲戚和过去的学生，忙于接待来访的人。1937年4月审问时，因沈钧儒年龄最大，被当作七个人的首领对待。1937年7月31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统一战线成立，沈钧儒等七人交保释放。

日军侵占上海和华东后，沈钧儒随同国民政府迁往汉口。1937年12月组织全国抗日救国后援会，出版《全民周刊》直至武汉沦陷。他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任国民参政员，1939年2月，被任命参加最高国防委员会。1941年，沈钧儒及其在救亡运动中的同事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民主同盟后，沈钧儒以其年高德劭，成为仅次于张澜的民盟首领。1946年1月，他代表民盟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国民政府以民盟是共产党外围组织为由下令予以解散，沈钧儒等民盟领导人逃往香港。1948年1月，民盟发表声明支持中国共产党。

沈钧儒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9月，他以民盟代表资格出席全国政协，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沈钧儒任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同时继续负责民盟的财经和青年工作，同年底又任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1951年他作为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副团长去莫斯科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然后率中国代表团去东柏林参加6月6日开幕的中德友好月活动。9月，

再一次去东柏林参加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会议，当选为副主席。1953年被任命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54年作为上海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大会以后政府改组时，沈钧儒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职由董必武接替。1954年底，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重新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此时他还担任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1955年2月，张澜去世，在举行追悼会期间，沈钧儒当选为民盟代主席。1956年2月又正式当选为主席。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许多“民主”人士因在百花齐放运动中坦率批评了党和政府而受到惩戒。6月17日，沈钧儒就民盟及章伯钧、罗隆基的“错误”观点发表声明，其中说到：“近几年来关于民盟的工作，虽然由于本人身体不好很少顾及，但仍负有责任。自1957年3月民盟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期间以及会后，章、罗两个副主席处理民盟的大部分工作。我原以为这是很好的安排，殊不知他们另有目的，我最近从报上读到章、罗的错误观点非常愤怒”。他表明即将召开民盟常委扩大会议以澄清民盟的政治立场。1958年11月，他向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时指出，民盟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大多数盟员尚未肃清资产阶级立场，因此，民盟必须在全部工作中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959年，沈钧儒作为人民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度当选为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他于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去世，遗有子四人，女一人。

沈 鸿 烈 字：成章

沈鸿烈（1882—），海军将领，二十年代东北海防司令，1931—37年任青岛市长，1938—41年任山东省主席，1942—44年任农业部长，1946—47年任浙江省主席。

沈鸿烈湖北天门人，父沈知章（音）系有名学者。沈鸿烈幼年时读书勤奋，学有成就。十八岁成秀才，并成为有资格支薪的教师。以后在府学堂执教，得以接触到一些日本的近代出版物。他决心从军，1904年加入自强军，1905年取得官费去日本留学，次年进日本海军学校。他在日本时据说加入了同

盟会，1911年夏毕业后即行回国。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在自强军时的上司黎元洪要他当海军指挥官，他未接受，而去长江中下游水师中鼓动革命。他参加了攻占南京之役。

1912年民国成立后，沈鸿烈任参谋部一个部门负责人，掌管海军事务。1914年受命考察沿海各口岸及要塞情况。1916年3月，作为海军副官参加去欧洲考察战事的代表团，他被派往英国海军。1918年秋经美国回国，任总部参谋，军事学校海军教官。沈鸿烈参与东北事务开始于1920年，当时他参加了由王洪年率领的代表团调查边界事件。他率领四艘炮艇上溯松花江，以此加强了是年建立的吉林黑龙江防局的实力。王崇文是江防局司令，沈为参谋长。炮艇的巡逻制止了俄国人对该区域商船航行的非法干涉。沈的工作受到张作霖的注意，当时张是自封的东三省巡阅使。

1922年，北京海军部把江防事宜交给张作霖，沈鸿烈由张作霖指挥。张作霖于是筹建东北海军。1923年7月，正式成立了东北海防舰队，以沈鸿烈为中将领级司令。1924年10月张作霖在直奉战争中被打败，把东北海防舰队中最强的驻在青岛的渤海舰队交给其同伙张宗昌。这个变动，在渤海舰队中引起相当骚动。1927年夏，沈鸿烈到青岛，当时他已是东北海防舰队后备部队司令，得悉渤海舰队准备袭击青岛，乃前往访问张宗昌，通知了这个消息，同时撤换了渤海舰队中最大的两艘军舰上的军官。渤海舰队重归东北海防舰队，并建立了联合指挥机构，以张作霖为总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兼前沿司令。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在东北掌权，据说沈鸿烈曾劝张学良效忠国民政府。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发表声明表示服从国民政府，沈鸿烈遂进袭并收容了张宗昌的拒不服从的部队。沈继续指挥东北海防舰队，并于1929年中苏因中东路问题断交后击退苏军。

1931年9月，日军进攻沈阳，沈鸿烈自认在东北已无能为力，乃去青岛海军基地。11月，国民政府任命他兼青岛市长。1933年6月，塘沽协定签订后，沈鸿烈辞去舰队司令，以便专心致力于市政。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沈鸿烈奉命指挥青岛地区的海陆军。他秘密地把军舰上的大炮转移到山头，准备袭击九家日本纱厂。日军得悉这个威胁其财产的举止后即于9月1日撤退侨民

和军事人员。12月18日，沈鸿烈奉国民政府之命，击毁了青岛地区所有的日方工厂。

1938年春，沈鸿烈继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那时山东大部分地区已落入日军之手，省政府乃设于曹县，在四十个县慢慢地建立起了控制权并且组织了游击战争。1941年底，沈鸿烈任国民政府农业部长，1942年1月他在重庆就任。同年12月兼任全国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1944年8月他卸去这些职务，改任负责考核中央党政机关工作成绩的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又经熊式辉之请，负责掌管中央设计局东北委员会。由于他熟悉东北情况，他曾陪同宋子文去苏联谈判，于1945年8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战争结束后，沈鸿烈任浙江省主席，1946年4月在杭州就职至1948年7月。此后任考试院铨叙部长。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顾问的闲职。

沈鸿烈就其一生经历写了一些关于青岛市政、战时农业发展、浙江省政的文章，但他写的多，出版的少。1953年他的《东北边防与航权》一书在台北出版。

沈宗瀚

沈宗瀚（1895.12.15—），农业学家，以建立、发展全国农业研究所和在乡村建设联合委员会的工作而知名，1964年成为后一个组织的主席。

沈宗瀚出生浙江余姚，兄弟六人排行第四，幼年从其父及叔读书。其父系生员出身，以教书为生。十三岁进高小，1912年毕业后，决定学农以增强国家力量和改善农民生活。他在杭州农科职业学校就读两年后，去北京进北京国立农业专门学校。他受虔信基督教的长兄影响很深，1919年自学校毕业后几个月，在北京进了圣公会。

1919—22年间，沈宗瀚常在棉田工作并在农业业余学校教书。他遇到不少有关问题，决定出国留学。1923年9月，他带了借贷来的八百美元去美国，进了乔治亚大学学习棉业，1924年6月，获硕士学位。后来获得清华学堂的奖学金和纽约国际教育会研究生基金，进了康乃尔大学，在勒夫教授指导下专心研

究植物栽培，1928年获得博士学位。

沈宗瀚回国后任金陵大学教授，从事小麦遗传的研究。他是一位很得人望的教师，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农业专家。他还负责纽约国际教育会资助的金陵康乃尔合作改良品种计划，从事小麦、稻子、高粱的育种工作。他还每年去十所在华北、华中、华东有代表性的进行农业试验工作的教会学校调查研究，其成果之一是培养了2905号小麦新种，可增产百分之四十，一种新的稻谷、高粱品种，能增产百分之二十。在他每年去中国不同地区考察期间，他也考查了有关农业的其他问题。1931年，他和几名农学家向政府建议在实业部下设立农业研究所，此举取得成功。1934年沈宗瀚进研究所任技正，并保留了他在南京的职务。

沈宗瀚于此时研究了1920—33年间关于棉、麦、大米进口的情况。他认为沿海工业城市人口集中，内地交通不便，粮食市价昂贵，是造成粮食进口的主要原因。他与一些专家设法改进粮食生产、销售和加工，以求自给。他们的建议促使全国棉花改进所和全国米麦改进所的建立，沈负责小麦改进工作。1937年设立了这三种作物的检查服务所，沈任小麦部分的负责人。该所在小麦销售中心设站检查小麦湿度及其异体情况，为统一小麦品种作准备。经过这些改进，1933—36年，该三项农产品进口大为减少。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中断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沈宗瀚辞去金陵大学的职务，专心致力于农业研究所工作以解决战时的粮棉问题。

1937年12月，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请沈宗瀚拟订贵州省农产计划。他调查了贵阳附近的一些省农业站，建议取消分散的各个小农业站而建立省农业研究所，以节省开支和协调农业计划。他还建议集中抓一些战时所需的项目：扩种小麦、油菜、烟草、棉花以取代鸦片，修筑塘坝以改进水利，改进稻、麦、棉花品种，控制猪瘟和牛瘟，建立农村信贷系统。沈的建议被接受，1938年贵州省建立了农业研究所，国立农业研究所派出二十名专家在贵阳设站，两个单位密切合作，使贵州农产品有显著增加。

1938年2月在政府改组期间，所有全国性农业研究机构均被撤销，农业研究工作集中在农业研究所，谢家声为主任，沈宗瀚为副主任，有专家一百五十

人，行政人员二十人，该研究所带给省研究所技术和财政帮助。沈常去省研究所视察，就如何改进农业的研究和推广工作提出建议。

沈宗瀚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1943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举行的战后粮食农业会议。回国后与重庆美国大使馆农业参赞道森商讨美国农业部和中国农林部进行技术合作的问题，1946年，经沈和别人的努力，成立了中美联合农业代表团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提出发展农业的综合方案，以及为实施方案所必需的为公众服务的项目和形式。该团以赫基逊博士为团长，沈宗瀚为副团长，并有美国专家十人，中国专家十三人，用几个月的时间考察了大陆上十四个省份以及新近收复的台湾省。1947年5月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关系局发表的该代表团的报告，为1948年美国国会讨论对华经济援助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也为发展两国的合作作出了贡献。

国务卿马歇尔建议，由晏阳初博士起草备忘录提出成立联合委员会实施农村建设计划，并将以美国援华经费的百分之十用于此一计划。根据1948年援华法第四〇七项，中美双方于8月4日换文决定成立乡村建设联合委员会，并于10月1日开始工作。美方有代表两人：卜凯、摩雅，中方有沈宗瀚、晏阳初、蒋梦麟。蒋梦麟任主席，直至1964年去世。

该委员会的目标在于增加农业产量，促进农村福利和公平分配，加强公私机构为农业服务的工作。由于中国的农业危机，首先要着手于能够尽快给大多数民众带来利益的项目。因此委员会的基本方案是：一，防洪、水利、推广新品种、控制兽疫和虫害以增加农业生产；二，在福建、四川、台湾进行土地改革；三，在四川普及教育。联合委员会的不少专家来自全国农业研究所，沈从1947年起为该所所长。

1949年，中国大陆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联合委员会迁往台湾，继续给政府和私人有关开发农业的机构以技术和财政援助。沈宗瀚主要考虑的是协助台湾国民政府协调农业计划，以促进台湾经济的发展。他在经济平衡局（后为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委员会）工作，该局自1953至1968年连续颁布四个发展农业、工业、商业、运输、财政、教育的四年计划。各级政府 and 私人机构参加执行各种农业计划，沈宗瀚协调了它们的计划和促进了相互间的合作。

1964年，蒋梦麟死去，沈宗瀚继任联合委员会主席。美国对台经济援助于1965年6月结束，联合委员会则在中美开发基金支持下成为一个半官方的机构继续工作。

沈宗瀚一生中写了一百八十篇有关许多方面农业问题论文，其中包括小麦遗传、品种改良、农业政策和计划、土地改革和农民组织等问题。他的两部英文著作《中国的农业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的农业发展》，先后在1951年、1964年由康乃尔大学出版。他用中文写过两本自传性的书，都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

沈从文

沈从文（1903—），文学教授、编辑、小说作家，其作品描写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尊严。

沈从文出生在湘西凤凰，家庭出身旧军人，在义和团时遭到破产。沈从文幼年时不好读书，惯于逃学。他在军校就读两年后，到沅陵一个团部任职，时年十五岁。此后三年里，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观察军队生活、土匪情况、苗族情况，并且自学古今文学和政治。他离开军队后，彷徨了一阵子，从事各种不同行业，1922年去北京继续上学。

沈从文在北京当旁听生，寄居在一些青年作家的宿舍里，他们都急于出版自己写的小说和文章，沈从文尤为热心，因为他是以此谋生的。从1922年到1927年，他写了好几篇小说，大都是他在湖南的经历。他的写作技巧熟练又独具风格，因此渐渐有名了。由于他是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中仅有的非激进派，而开始接近胡适控制的文学圈子。沈从文还遇到了玲、胡也频，三人结成深交，住在一起，直至1931年胡死去为止。

1927年末，三人离北京去上海，经营出版事业。但他们都对此毫无经验，1929年终于破产，背了一身债。沈从文当了一名中国文学教授，二十年间先后在上海、武汉、青岛、昆明、北平教书。1933—37年还主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沈从文是一个多产作家，到1935年止，他的作品已有三十五本之多。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沈从文经湘西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直至战争结束。他在课余编订旧时作品并将战争初起时写的某些札记编写成文。1945年从昆明回北平，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沈从文的平静生活受到干扰，又受到左派学生尖锐的思想攻击。在被迫经受“思想改造”时，他的精神受到刺激几乎想自杀，后来，他调到民族音乐学院和故宫工作。1955年，他似已恢复健康，于1956年2月当了政协的特邀代表，并参加了1959、1964年的政协会议。同时他重新执教。1957年，有一本关于他在故宫的工作及收录了他的几篇小说的书在北京出版。自1949年以后，他不再写小说，并且一度从事“劳动改造”。他的结局却是平稳的，这与他的老朋友丁玲形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鲜明对比。丁玲谴责沈不关心政治和有资产阶级倾向。丁在1952年获得斯大林奖金，仅仅几年以后被指控犯有各种思想错误而消声匿迹。

沈从文以具有独立见解和多产而知名。他虽然不懂外文，但他的文学很富有“欧化”风格而使新起的白话文学更为生动和丰富多彩。他的小说的主题大都是写一般平民的勇气和尊严，写作技巧多取法于中国古典小说。他也阅读翻译的西方小说并从中吸取有用之处。

沈从文早期的小说，发表在北京《晨报》文学副刊上，有的发表在《现代评论》、《新月》，他的不少文学评论则发表在《文艺月刊》上。他的早期的成功来自对边界争斗和苗族生活的引人入胜的小说，这使他赢得了“中国的仲马”的美名。1926年出版《鸭子》，1927年出版《蜜柑》。1928年出版了有关士兵和农民的小说《入伍后》、《老实人》。同年还出版了讽刺小说《好管闲事的人》、《阿丽思中国游记》，后者是对路易·卡罗尔那本幻想小说的续作。他还采用《十日谈》的形式写了《月下小景》。1929年出版了《十四夜间》和《神巫之爱》。1930年出版《沈从文甲集》和《旅店及其他》，后者收集了描写城市生活的六个作品。1931年出版了新的文集和两本短篇小说集：《石子船》、《旧梦》。1932年出版《虎雏》、《泥涂》、《都市一妇人》、《一个女演员的生活》。1933年出版《一个母亲》、《记胡也频》。1934年出版《沫沫集》、《游目集》、《如苏集》。《如苏集》包括了他描写城市生活的几个最佳作品和最著名的写苗族生活的作品。同年又出版了

《记丁玲》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边城》。

1935年，沈从文开始审订他的数量巨大的三十五册著作，同年又出版了《浮世记》、《八骏图》，后者因包括了对娼妓生活的某些露骨描写而遭到批评。1936年出版《新与旧》及三本选集。1937年和萧乾合编出版《废邮存稿》。战争期间，他的这一工作有所放松。1940年他出版《记丁玲续篇》、《主妇集》，后者包括五个短篇小说。1943年他出版了战时所写的最佳作品记事性的《湘西》两卷和小说《长河》，两书都是根据他1937年在湘西的访问所写的。《长河》的情景是围绕着永恒和变化这个主题而展开的，被公认为他的最佳长篇小说。同期还出版了《春灯集》和《黑凤集》，这是他的最佳短篇小说选集。1946年写成《从文自传》，1947年提前发表其中四章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内容是关于互相争斗的苗族部落的故事，这四章发表时的标题的“赤魔”、“雪晴”、“乔秀与东生”和“传奇不奇”。

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沈从文停止了小说创作，1957年出版了他在故宫对中国丝织图案历史的研究而著作的《中国丝绸图案》和《沈从文小说选集》。1958年出版《唐宋铜镜》。他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1961年的《光明日报》上，强调在阐明古书中含混不清的内容时，必须将文字记载同实物对照起来加以检验。

沈雁冰 笔名：茅盾

沈雁冰（1896—），以茅盾之名著，民国以来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1949年后停止创作，1946—1965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

茅盾出生在浙江桐乡县，他有一个弟弟沈泽民。他父亲是一名爱好西方数学的绅士，希望茅盾从事科技工作，因为他认为旧教育对解救中国免于为列强瓜分是无用的。茅盾九岁丧父后专心学习中国文学，在湖州、嘉兴、杭州等地中学就读。

茅盾于十七岁时到北京，进了北京大学预备班，1916年上学三年后，因经济困难，被迫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一名校对，不久升任编辑和翻译。1917—

20年间，他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写了不少创作和翻译文章。

1920年11月，茅盾和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许地山以及另外七个作家，组织“文学研究会”，说服商务印书馆由他们主编《小说月报》，茅盾任新主编。《小说月报》本来是一个登载中国传统文章的月刊，革新后的月刊，于1921年1月出版，成了一份影响很大的刊物。

虽然文学研究会以主张现实主义和“为人生的艺术”而知名，但是它的发起人的最初目的是要树立一种严肃的写作态度，反对当时在传统的作者中间盛行的把文学当作娱乐的风气。作为主编，茅盾在《小说月报》上每月写一篇文章，介绍国外文学动态，评论近代中国文学，也写文章介绍国外作家如托尔斯泰、契诃甫、贝尔逊、裴多菲、显克微支、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拜伦、济兹、萧伯纳等人。他懂中文和英文，所以大多数介绍都得自第二手资料。他欣赏左拉的自然主义，经常运用泰恩的文学理论，认为风格、环境、时机是文学表现方法中的三个决定性因素。他肯定西方文学中的精神活力和高度技巧而很少采用中国文学传统，他在1934年出版的《话匣子》一书中有两篇关于中国文学传统的文章，他认为近代小说作家很难从《水浒传》和《红楼梦》中得到借鉴，因为据他看来这些作品的叙述技巧是太粗糙了。他在1922年的文章《自然主义和中国现代小说》中批评说，近代章回小说颓废，而白话文学流于伤感。

1923年，茅盾辞去《小说月报》的编辑职务，但他继续为它写评论和文章。有人说他辞职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对他的编辑工作不满，也有人说他是自愿离去以便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事实是他在1923—24年间在由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等共产党领导人新办的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中心、上海大学教小说课，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他参加了任何政治活动。1925年五卅运动中，茅盾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愤怒的爱国者而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与其他许多作家一起抗议列强在中国的行径。虽然他参加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圈子，他并不认为需要修改他的文学信念适应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据信他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1926年茅盾离上海去广州参加北伐、在汪精卫手下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秘书。不久回上海任国民通讯社主编，1926年底，随同北伐军胜利

进入武汉，任《民国日报》编辑。1927年4月，蒋介石开始清党后，国民党左派追随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7月，茅盾以治病为由离开武汉到牯岭。8月，与几年前结婚的妻子孔德祉秘密回上海。

1927年9月到1928年6月，茅盾写了三篇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连续在《小说月报》上登载，1930年作为三部曲命名为《蚀》出版。由于当时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他就采用了共产党通用的术语矛盾作为笔名，这个新的名字由于三部小说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而在全中国享有盛誉。《蚀》描写了参加北伐的青年的最初的热情、不现实的理想主义和最终的灰心失望。《幻灭》描写了女主角在革命中间由于无政府主义和轻浮而退却，以后怀着浪漫主义的狂热退出革命追求个人幸福。《动摇》描写了一个本意良好的青年的无所作为，他力图在湖北一个新解放的小镇在革命与反革命的煽惑中间寻找中间道路而不可得。《追求》描写一群曾参加过北伐的上海知识分子的空虚和激烈的虚无主义。

三部曲的巨大成就，引起共产党批评家责难作家有所谓小资产阶级的颓废情绪和无根据的悲观主义。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两篇文章中说，小说确实反映了他本人生活中的一段危机时期，但他认为自己有权反映他所见到的真实情况。他驳斥那种说他颓废的指责，争辩说革命作家应该以小资产阶级为其基本读者，因为无产者当时大多是文盲，没有阅读能力，但是他同意幻灭感和虚无主义确实是不应赞同的心理状态。

1928年夏到1930年春，茅盾住在东京，除写了几篇为他的三部曲辩护的文章和对日本不表好感的有关日本生活的随笔外，又以《蚀》的风格写了五个短篇小说，以《野蔷薇》为名于1929年出版。这些故事描写青年妇女在新与旧的斗争中的动摇和愤激。其间还写了第二部长篇小说《虹》，该书于1930年出版，描写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间的中国青年的演进。其风格开始时仍依照《蚀》，但其后半部则显然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体的影响。《虹》研究了一个热烈的理想主义者梅及其对有意义生活的追求。全书开头的三分之一描写了主人公对封建传统（表现在她所蔑视的丈夫身上）的斗争，是现实主义的心理描写杰作。

1930年春茅盾回国后，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此时，他已克服了早期的沮丧情绪，热烈支持无产阶级文学，文风也从雕饰改为朴质了。三十年代初期写的一些以历史故事面目出现的政治寓言（如陈胜及水浒传人物）很有文学色彩，但两部中篇小说《三人行》、《路》，却值不得重视。1930年他因病很少从事活动，此时，他开始注意上海的股票市场和工商界的亲友。他也得悉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之后他把自己的观察研究所得写成了小说《子夜》，初版于1933年印行。英文译名为“黎明，1930年中国的故事”。该书立即被共产党的批评家认为是茅盾的杰作。主人公吴荪甫是一个对民族资本充满信心的强有力的实业家，在世界经济萧条时决心巩固他的丝织业王国，但是他在家乡的投资却为共产党组织的抢劫活动所破坏，他的主要丝厂也一再遭到共产党领导的罢工的袭击。为弥补损失，他从事股票投机，结果却敢于外资支持的一个强大对手。小说对资本家、工人、资产阶级少爷、流落城市的封建地主等等复杂的上海社会生活作了深刻描绘。尽管由于缺乏个人经验，书中的无产阶级因素表现得不充分。虽然场面广阔，《子夜》被人们看作是《蚀》很不相同的没有那末多激情的作品。《蚀》随着现实生活而搏动，而《子夜》则作了左拉式的研究，是对共产党关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企图必然失败的理论的一个自然主义说明。书中的许多资本家和封建地主几乎都是为了说明这个命题而勾划的。

1932年，中日军队在上海发生冲突，茅盾回到老家住了一阵。过去茅盾在作品中主要描绘城市生活，很少触及他幼年时经历过的农村及小城镇的生活，现在他决定写农民和高贩了。其结果是产生了被共产党称为是三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杰出成就的作品。1932年写成的《林家铺子》和《春蚕》，以其深刻的同情心和对旧事物注定灭亡的描摹而著称。同年写成的《小巫》虽因坦率地写了性行为而未受共产党批评家的赞许，却是关于一个备受凌辱的小老婆的悲惨故事。这些小说都有宣传的目的，茅盾在这时期写的文章，在1934年以《故乡杂记》为名合集出版，对因中日淞沪之战而受害、处境困窘的农民的情况提供了更为坦率真实的报道。

1934—36年间，茅盾没有写出什么重要作品。1936年出版短篇小说《多角

关系》，1935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泡沫》，193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烟云集》，这些大都是以上海的商人及其妻子、秘书作为对象的讽刺作品。《大鼻子的故事》是个例外，它写一个以捡垃圾和偷窃为生的上海乞儿，故事是仿照鲁迅的《阿Q正传》诙谐的、奇闻轶事的风格写成的。也明显地借鉴于张天翼，他擅长写城市小孩的滑稽故事。

1936年春，周扬解散了左翼作家联盟，为了支持统一战线运动，成立了作家协会，茅盾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号召采取现实主义手法，以抗日作为写作主题，并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7月，茅盾和鲁迅、胡风及其他六十四人组成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出一个与“国防文学”相抗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他当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文艺政策的指导者们，正在把文学屈从于中国共产党的心血来潮的想法。经过一个长期、激烈的人们称之为口号之争以后，这两个组织在1936年10月圆满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并发表了联合宣言。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茅盾由香港去长沙、武汉，与友人一起创办《文艺阵地》。1938年2月他与编辑部一起迁往广州，不久又去香港，为日报《立报》主编文学版。该报连载了他的有关上海在1937年夏被围情况的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虽然其中仍然描写了工商业家、银行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托派、封建残余等等，但作品并不见得成功。1938年底他去乌鲁木齐任新疆大学文学院院长，很可能同时是为了促进那个边疆地区的中苏关系而去的。据共产党方面所说，他是应好友、新闻记者杜重远之请去到那里的。

1940年5月，茅盾由乌鲁木齐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讲演。10月他离开共产党首都去重庆。1941年春，新四军皖南事变后，他去香港，在《大众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连载小说《腐蚀》，目的在于揭发国民党制造了新四军事件。小说还谴责国民党雇用特务在国民党的大后方诱捕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腐蚀》虽没有《蚀》、《虹》那样的生命力，但共产党批评家认为这是仅次于《子夜》的伟大小说。

1941年底，茅盾全家迁往桂林，1942年出版《劫后拾遗》，描写香港沦陷前后的生活情况。1943年出版了《霜叶红似二月花》三部曲的第一部。按

照作者后来所写的后记，全书是要说明青年共产党人从五四运动到1927年清党这一时期的进步，但是第一卷却很少说到共产主义。它研究了民国初年浙江一个小镇里，在当时的经济情况下几个受传统束缚而主张改良主义的青年。由于暂时撇开了进行宣传的考虑，茅盾通过描写两对青年的婚姻困难和主人公的受挫的理想主义，再次表现了惊人的心理描写技巧。

1942年，茅盾去重庆，在郭沫若手下，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1942—44年除掉几个短篇小说。他没有写多少东西，后编为《委屈》于1945年出版。这几个短篇虽未引起多大注意，但是它们是仿照契诃夫的风格，以诙谐和富于同情的笔调，描写内地那些没落的中产阶级。1945年春夏，茅盾写了一部剧本《清明前后》，后来证明这是他的最后的重要文学作品。它描写战争后期重庆那些发国难财的官吏和工商业者对普通市民所造成的苦难。

太平洋战争结束，茅盾就回到上海。1946年12月到1947年4月，他与夫人孔德祉去苏联游历，写了一本旅游记《苏联见闻录》。他回上海后不久即去香港，1948年创办了亲共产党的《小说月刊》。1949年共产党占领北平后，茅盾、郭沫若和其他一些在香港的共产党作家和左翼作家，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郭沫若成为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主席，茅盾为副主席，后又任文学工作者协会（后为作家协会）主席，不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是主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和《译文》在1949—1953年期间最早的编辑之一，以后他与叶君健合作编辑英文杂志《中国文学》。

1949年后，茅盾停止了创作。不仅如此，他从1946—1948年间就没有写过什么重要作品。小说《锻炼》曾在香港《文汇报》连载，后来也中断了。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茅盾才四十九岁，正是作家创作力旺盛时期，他在桂林、重庆时写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清明前后》、《委屈》，被人认为显然胜过他在1934—41年间的作品。他在那个时期在严格的审查制度威胁下写作，不得不约束自己不去进行公开的政治宣传。另一方面，有个批评家认为他在艺术上的自我抑制以及富有同情心的现实主义，与其说是由外部政治压力所造成，毋宁说是出于他个人的抉择，特别是应该考虑到他创作上的沉寂是同共产主义新纪元的

到来相一致的。茅盾显然是倾向共产党的，但他是深深服膺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的，他的创作的支持力量主要来自他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生活。他特别是以下列几点著名的：对城市生活的卓越把握，对声色和金钱的专注，掺杂着忧伤和悲观情绪的理想浪漫主义，以及他按照公认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描写典型人物和情景时所表现出来的极端肤浅。在实行百花齐放的时候，茅盾作为文化部长，攻击了共产党艺术作品的概念化，他的这些直言言论在反右运动时也受到批判。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文学艺术工作者会议上作过不少报告和讲演，最长的一篇是1960年7月在第三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题为《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他多次出国参加共产党国家和亚非国家的文艺会议。作为一个有成就的老作家，他要求青年作家努力写作，学习文艺的基本知识。他还鼓励和称赞了许多新的小说作家。1958年出版了《茅盾文集》，收集了他的全部长篇小说和短篇作品。

1964年12月，茅盾被指控在一部电影中宣传极端思想而被免去文化部长之职，这部电影是夏衍依据他的小说《林家铺子》改编的，这部电影据说因为同情一个资产阶级商店老板而削弱了阶级斗争。

沈 怡 字：君怡

沈怡(1901—)，留学德国的水利工程师，1937—40年任资源委员会秘书长，1941—44年任甘肃农业开发公司总经理，1946—47年任南京市长，1949—60年任联合国亚洲远东防洪水利局长，1960—67年在台湾任交通部长，1968年为驻巴西大使。

沈怡，原籍浙江嘉兴，幼年在浙江上学，后到上海进同济大学，1920年毕业于土木工程系。他在德国德累斯顿科技大学由恩格斯教授指导研究水利工程，1925年以研究防洪的毕业论文《中国的河流》得博士学位。同年去美国，调查了不少河流及其防洪计划。

沈怡于1927年回国后，任上海市政府工务局长。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因

为国民政府正在中国的这部份地区树立自己的威望，雄心勃勃地打算以江湾为中心，建立起一个新的大都市。这个以大上海为名的计划，企图把中国这个最大城市的活动中心从外国租界搬到新的中国管辖的地界。但是从1928年起国内政治军事动乱频仍，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终于放弃了。

这个城市建设计划虽未实现，但沈怡任工务局长十年以上，还是为国民政府在公用事业方面做了不寻常的工作，在上海南市兴建了不少公共设施。虽然他在上海的工作用不到他在水利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他还是继续注意世界各国防洪工作的发展情况，他极为欣赏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并仿照着制定了成立长江河工局的计划。

1937年夏中日战争爆发，中国从上海和长江下游地区撤退，沈怡到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任资源委员会秘书长、工业处处长。

1941年前，沈怡没有机会施展自己在工程学方面的才能。是年中国银行把天津一带的几个企业搬迁到西北。中国银行的农业专家张心一被任命为甘肃建设厅长，企图通过新成立的甘肃农业开发公司，利用中国银行资金发展甘肃农业。公司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水利建设，沈怡被任命为公司的总经理，他接受此职并去兰州就任。

甘肃省原先就有兴修水利计划，但只有在成立了甘肃农业开发公司并由沈怡主管其事，这项工作才迅速开展。公司接管并改进了一个大坝，新建了第二个。在沈怡的指导下，设计和建造了新的水坝，改进了灌溉网，这些主要工程的设计能力是要灌溉二十六万亩农田，加上疏浚河流支流和兴建小水库，全省灌溉面积可达一百万亩。

1945年战争结束后，沈怡被调离甘肃，此时他已为全省的灌溉系统打下了基础，其后许多别的水库也相继完成投入使用。国民政府任命沈怡为交通部次长，处理战后复员及经济建设的复杂问题。1946年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任沈怡为南京市市长，他任此职直至1948年，其间，还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公务处处长。

1949年，沈怡任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防洪水利局长，设总办事处于泰国曼谷。他任职十一年，其出色成就是他领导的局对湄公河下游盆地的潜力

作了系统的研究。这个研究开始于1951年，促使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发展亚洲这个广大地区的计划和建立湄公河流域四个国家独特的合作体系。这个计划很为经济发展专家所称赞。沈怡的工作尤其受到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推崇。

1960年，沈怡回台湾，在国民政府任交通部长七年，其间经常作为官方代表出国参加国际会议。1967年11月他辞去交通部长职，任蒋介石总统的顾问。1968年2月出任驻巴西大使。

沈怡有三个姐妹，都嫁给了著名人物：长姐嫁给蒋介石的朋友和顾问黄郛，另一个嫁给一度担任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并且是翁文灏主要副手的钱昌照，还有一个嫁给社会学家陶孟和，陶以后在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直至1959年去世。

沈尹默

沈尹默（1887—），历史学教授，文人，后以书法家著名。

沈尹默原籍浙江吴兴，幼受中国古籍教育，后进嘉兴师范学校，又和兄沈士远、沈兼士一起去日本留学。因经济困难，沈士远回国教书维持两个弟弟留学费用，1912年沈尹默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

1914年到1928年间，沈尹默在北京大学任历史教授。在蔡元培任校长时，北京大学是当时反对中国文学和哲学中的传统思想运动的中心，沈尹默是这个运动的热诚支持者。他经常为《新青年》撰稿。1919年，他和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复同任该杂志编辑。

1928年，沈尹默离开北京大学，任河北省教育厅长。他不久发现行政工作对他的独立不羁的习性不适合，遂于1930年辞职，去新建的北平大学任校长。两年后去上海，企图和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内合作。因为他过去与国民政府有联系，所以未能在这个激进组织的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沈尹默早年就习练书法，当他还是一个青年时，就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出色才能。从日本回国后，他的书法已很有名。在以后几十年中，他认真地培植自己的这方面才能，他以篆、隶为基础，发展到对楷、行、草书都很精通，他每日

清晨早饭前必习写五百个字。他擅长各种书法，使他在现代书法界中独占一位。三十年代初，他决心以书法为业。他的书法秀丽多姿，但有的批评家认为他缺少独创性因此不能进入历代名家之列。此外，他又吟诗以作消遣。

中日战争时，沈尹默任监察院委员，这不过是一个闲职，但这个职务很适合他，因为他有时间从事书法。战争结束后，他定居上海。1948年他和生活多年的妻子离异，并同一个小于他二十岁的妇女结婚。1949年共产党接管大陆后，提名他为上海市副市长，他不愿接受，但同意当一名顾问。此后他过着宁静的生活，习练书法和展出自己的作品。

沈尹默写了大量有关书法理论和实践的文章。1962年他用小楷撰写《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作为简体字书法的示范。1963年他编写《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辑要释义》。

盛宣怀

盛宣怀（1844.11.4—1916.4.27），实业家，发展了以官督商办为名的公司组织的观念。

盛宣怀，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县，父亲盛康（1814—1902），是1844年进士，做过几任小官，1861年任武昌盐法道。盛宣怀幼读经书以应科举，1866年成秀才，1867、1873、1876年三次应举人试未中。但他最后一次落第时，在另一方面已很有发展。

盛宣怀像清末的一批名人一样，以进入李鸿章幕府开始自己的公务生活。1870—71年在淮军做小官，1894—95年中日战争前已升至为李鸿章处理经济事务的副手。其最初的一个重要任命，是在新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担任管理职务。盛宣怀始终是该局的大股东和主管人，直至1916年去世。1873—1875年，盛宣怀任招商局督办，一度离去，1883年又回任；自1885年至1902年，他作为最大的股东和主要负责人，使招商局一直在他控制之中。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中，盛宣怀曾为李鸿章处理对外交涉事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谈判收回未经许可修筑的淞沪铁路。这是中国的第一条铁路，由怡和

洋行投资于1876年建成。1879年，盛宣怀正式担任官职，任天津河间兵备道。1880年，他筹建一个联合股票公司（置于李鸿章的正式监督之下），负责建立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这个公司即电报总局，与轮船公司有密切的财务往来，也由盛经营，直至1902年电报总局收归国有。

1886年7月至1892年6月，盛宣怀任芝罘海关道。1892年6月，他担任了他在李鸿章手下最高的行政职务，当了天津海关道，这是李鸿章控制直隶（河北）管辖权的关键性财政岗位。除控制天津海关和担任官督商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的督办外，1893年10月，盛宣怀着手恢复为火灾夷平的李鸿章的上海织布局。这个企业由私人资本投资，其中大部分来自盛及其合作者，并成为官督商办企业，以盛宣怀为督办，取名华盛纺织公司，是国内第一个经营成功的纺织厂，并从而提高了盛宣怀作为实业家的地位。自1877年起，盛宣怀已控制了湖北大冶的铁矿，以后就此创办了汉冶萍煤铁公司。

1894—95年中国对日作战，北洋的水师和陆军都遭失败，李鸿章于是下台，盛宣怀经办的工商企业逐渐转归湖广总督张之洞保护。在他和张之洞十多年的合作期间，他本人在北京的声势大为增强，他的经济王国也有很大扩展。他的工业财富的第一次增加发生在1896年。当时张之洞将1889年起官办而连年亏损的汉阳铁工厂接管过来。盛宣怀是主要股东和负责人，他把汉阳铁工厂及其附属各矿改为官督商办直至1908年。该企业虽获有向政府的铁路和兵工厂供应钢铁的垄断特许，但由于得不到足够的国内资本，公司被迫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等日方机构贷款，以便扩大生产，改进设备。事态发展到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中，日方提出要求接管汉阳铁工厂。1908年汉阳铁工厂官督商办期限终止，与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均为盛所发展——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公司，盛仍主持汉阳铁工厂。

1896年10月，经张之洞推荐，盛宣怀督办铁路总公司。该公司负责计划和建设铁路网，作为“自强”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努力因中国在中日战争中战败而得到促进。盛任此职到1905年止，当时已向西欧贷款三亿元以备建筑铁路三千英里之用。1906年铁路总公司撤消时，京汉铁路已建成，沪宁路正在兴建，又加上不是由盛宣怀控制的东北的铁路。这些构成了民国前的全部铁路系统。盛

宣怀身为铁路督办，得以与西方实业界和外交界广泛接触，并有机会侧身于北京的大官僚之中。

1896、1897年间，盛宣怀被皇帝授以宫廷闲差。1900年他被授予正三品太常寺少卿、太理寺少卿。1901年，慈禧由逃亡的驻地西安下旨授盛商税务大臣，办理由辛丑和约规定的事务。12月，又因他在义和团起义期间提倡“东南互保”保证了华南的中立有功，授以太子少保，因此西方书报中就经常称他为盛官保。1902年2月，他被授予正二品、工部左侍郎。

盛宣怀经营多种实业和担任官职的同时，还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英国人称为“中国帝国银行”）；又用轮船和电报公司的经费创办两所西式教育中心：天津北洋大学（1895）和上海南洋大学（1896），这两个学校以后都成为优良的技术学校，培养了如陈立夫、王宠惠这样一些政界人物和许多工程技术人材；还着手改进上海和别的地方的商务局。

1902年9月盛宣怀的权力达于顶峰，当时他签订了（以后流产）马凯条约。这个条约旨在增加进口税和取消中间税（厘金），为中西商业关系树立新的榜样。也就在这时，10月24日他八十岁老父死去，引起了一系列事故，使他丧失了官职和不少官督商办的工矿企业。导致盛宣怀衰落的主要推动者是袁世凯，袁承袭了李鸿章在华北的军政势力，又想进一步囊括其经济势力；对电报事业实行国有，由袁的亲信主管轮船招商局。幸有张之洞的有力支持，才使盛得以保留铁路督办之职直至1905年。虽然遭受了这些损失，盛宣怀仍能控制原非李鸿章所办的企业，如汉阳铁工厂、矿山和银行等。

1909年，袁世凯免职，盛宣怀卷入了夺回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他凭借个人的财力并与反袁人士相结合，终于在1907年收回了轮船招商局。1908年盛被授予以邮传部侍郎。但是直到1910年年底，他才回到北京就任显赫的官职并在事实上控制了邮传部，1911年1月他被授予邮传部尚书之职。

盛宣怀被授予邮传部大臣后，再一次掌管了中国现代化交通工具。他准备在1911年将原由各省绅商投资修筑而未竣工的铁路收归国有，以建立一个全国铁路网。他在1911年所作的记事录里，特别谴责袁汉、川汉两路工程迟缓和路

政腐败，以致貽误清廷的改良运动和防务。他主张铁路收回国有，同时又向四国银团大量借款，激起各省的仇外和排满情绪。而且当时提出的对筑路股款的补偿办法更增强了人们的极度不满。1911年夏四川等地纷纷起事，接着10月10日武昌起义，清朝遂告覆亡。

盛宣怀在清朝最后一段时间免职，被迫逃往日本，1912年10月又回到上海公共租界寓所。他在上海赋闲直至1916年去世，但仍保持着对招商局、汉冶萍煤铁公司及其他一些纺织厂的控制权。

盛宣怀的经历及其创办企业的历史，是十九世纪末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的一个有用的索引。同时，盛宣怀的官督商办的方式又预示了近几年“官僚资本主义”的出现，官僚资本主义阻挠中国按民主模式实行现代化。尽管盛宣怀所办企业具有创业性质，而且为数不多，但他这种官督商办企业涉及范围很广，种类很多，重工业的煤铁矿和一个钢厂，轻工业的纺织厂，交通业的轮船、铁路、电报，财政金融业的一家近代银行，种种都包括进去了。就一个人来说，在所有这些领域进行创业活动，而且又是在晚清的中国这样不顺利的境况之中，这些已经是不容否认的实际成就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能一方面经营管理这些企业，一方面又要积极投入官场生涯。然而他所办的这些企业并不标志着中国经济的根本改革的开始。相反，它们的组成是同中国传统机构及其办事方法的妥协。它们的发展机会受制于外国的经济压力，官方的漠不关心甚至于贪婪掠夺，资金和人员的短缺。也受制于一种强调私人 and 家族关系超过合理的经济活动的价值标准。这些企业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其主人能为他们弄到手的专利垄断权。这些垄断权能够保证利润和外快，保护投资者的资本，但与扩大生产和长期发展却是不相容的。总之，盛宣怀所创办的近代企业，除开始时有所进展外，终于转变成为保护官僚资本的工具了。

盛世才 字：晋庸

盛世才（1895—），东北军人，1933年在新疆掌权并在苏联帮助下执政达九年之久，1943年转而效忠中国国民党，但后者却于1944年将其解职。

盛世才出生于辽宁开原县。他父亲拥有少量土地，是当地士绅。盛世才在本

地学校受旧式教育后去沈阳，进了省立农林专科学校，1912年去上海吴淞进中国公学，学政治经济学，1915年毕业，他的老师劝他去日本深造。1917年，他得到亲友资助去日本，进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19年回国以辽宁学生代表资格参加了五四运动。他看到中国政局混乱，决定放弃政治经济学而学军事。

盛世才在广东韶关讲武堂学习，以后又去东北军事学堂受训，在郭松龄军中逐渐升为少校。1924年，郭松龄派他去日本进士官学校学习。1925年11月，郭松龄、冯玉祥联合反张作霖，盛世才回东北任营长。12月，郭松龄失败被处死，盛世才又去日本继续上士官学校，但因张作霖之请将他除名。冯玉祥使他复了学，蒋介石资助他完成在士官学校的训练。

1927年，盛世才毕业于士官学校之后，回国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在何应钦的参谋总部任职，当一名上校。以后在蒋介石的前线司令部任参谋，直至北伐结束。1928年夏在南京任参谋部作战科长，因与上司不和于1929年辞职。以后参加图存学会，研究国家统一和边防问题。

1929年新疆省政府秘书长鲁效祖因公去南京，他受1928年在新疆掌权的金树仁之托聘请军事人才到新疆协助建设新疆军队。图存学会领导人彭昭贤把盛世才介绍给鲁效祖，再由鲁向金推荐。盛世才于是经西伯利亚到新疆，于1929年底或1930年初到达乌鲁木齐。

盛在新疆的第一个职务是在金树仁的边防督办公署任旅长级的参谋处长。他准备训练军官，但因1931年哈密发生叛乱，金树仁的部队前去应战，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931年6月，马仲英应哈密土耳其族(维吾尔)之请，派兵由甘肃进入新疆，秋天马军战败撤回甘西，哈密问题仍未能解决，盛世才作为两支后援部队之一的司令员进入哈密地区，但未遇叛军。1932年7月，他又率大军进攻哈密山地，但仍未能发现和击败穆斯林叛军。1932年8月，马世明部内讧，东干回族和哈萨克人联合进攻鄯善、吐鲁番。盛世才率部由哈密转向吐鲁番，经两天血战收复吐鲁番，但不能平息南疆的革命。马世明任喀什叛军司令，和加尼牙子、尧乐博士联合哈萨克人及东干人抗击汉人。1932年冬，叛军向乌鲁木齐进军，击败金树仁派来阻击的军队，直接威胁乌鲁木齐。1933年2月底，他们进攻乌鲁木齐未获成功。当时苏炳文、李杜率领的东北军数千人进入

乌鲁木齐地区，协助解脱叛军的包围，马世明乃转而攻下附近的三道坝，切断乌鲁木齐的粮食供应。盛世才率军由吐鲁番来，经东北军协助收复三道坝，然后进入乌鲁木齐，任少将、第一师师长，金树仁部参谋长。

由于穆斯林的骚乱遍布全省，乌鲁木齐常被包围，城内恐慌，市政失效，官吏腐化，因此盛世才的返回乌鲁木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盛世才的军队核心是安东诺夫所部的白俄军。新疆的白俄对金树仁逐渐不满，东北军也倾向盛世才，因为他也是东北人。1933年4月12日金树仁被迫逃走，乃以原教育厅长刘文龙为临时省政府主席。4月14日，盛世才任临时边防督办，常驻乌鲁木齐。但新疆的土耳其族（维吾尔）和马仲英常威胁盛世才的地位。5月中旬，马仲英再次向乌鲁木齐进军，盛世才率军五千人与之对峙，同时又向南京国民政府控告马的行动。双方在古城接战，盛世才攻占吐鲁番，并在喀什战胜和加尼牙子。伊犁镇守使张培元宣布与叛军合作，盛世才准备与他谈判。当时国民政府任命黄慕松为新疆宣抚使，他于1933年6月10日到达乌鲁木齐下令双方停战。双方置之不理，盛世才把马仲英部队东逐至古城。

盛世才回乌鲁木齐后，指责黄慕松阴谋将他推翻，遂将黄软禁。不久他获得了自认为足够的罪证，以与黄同谋为名，将陶明越、李笑天、陈中等三名国民政府官员处死。彭昭贤奉军事委员会之命由南京前来新疆调查，行政院下令黄慕松立即回南京报告事件经过，黄慕松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委任盛世才、刘文龙在新疆的职务后，黄慕松乃被释回回南京。十天后，8月1日国民政府委任盛、刘的职务，9月7日由罗文干监誓就职。此外，罗文干又居中调停盛世才和马仲英之间的纠纷。他在给盛世才、刘文龙、马仲英、张培元等人划分职权达成和解后，经苏联回南京。罗文干离去后，盛世才又声称发觉反对他的新阴谋，逼令刘文龙辞职，由朱瑞璋继任（朱于1934年死去后由另一名傀儡李榕接替）。1933年12月盛下令处决东北军中的二十名军官，说他们阴谋反对他。

1933年底，马仲英再次进攻乌鲁木齐，张培元由伊犁派出三千人的军队协助。盛世才乃与莫斯科谈判，声称马仲英的胜利有损苏联在新疆的利益，要求苏方提供前曾应允金树仁的军火。1月24日，苏联军队出击马仲英军，迫使其向南撤走，张培元的部队则在玛纳斯附近遭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张本人自

杀。这两次行动的结果，使北疆归于盛世才的控制之下，但他还需要和在喀什喀尔宣布成立的以和加尼牙子为总统、萨毕脱摩拉为总理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争斗。和、毕两人不和，正在撤退中的马仲英趁机进袭和摧毁喀什喀尔的政治组织，和加尼牙子决定投向盛世才。1934年7月，马仲英忽然将部队交给马虎山而去苏联。这样，南疆也在他出缺的情况下落入盛世才之手。

盛世才发表“八大宣言”为政纲，又订定“六大政策”，其中有反帝、亲苏两项。他的军队称为反帝军，他的政党称为反帝会。1935年5月16日，盛世才和莫斯科签订协定，得到大量贷款和兴建公共卫生，开采矿产、石油、建筑道路所需的技术援助；1937年5月再一次得到军事援助，当时马虎山领导的叛乱很有成功的希望。

盛世才因军政需要而与苏联形成的联系，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更为加强。莫斯科派出一团兵力驻守在哈密，给了盛一笔新的贷款，增派专家，增加贸易。1938年，盛世才访问莫斯科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他回新疆后，仍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在新疆活动，但接受了一些从延安派来的共产党员充当省政府官员，其中有毛泽民。1940年11月24日签订锡矿协定，同意苏联在今后五十年内在新疆有广泛的经济权利。至此盛世才的亲苏政策达到高峰。

盛世才倘若继续以“对苏友谊”为其外交指导方针，那末苏联的影响将渗透各方面。1941年4月，国民政府任命盛为新疆省主席。1942年德国在苏联境内挺进，苏联的抵抗形将溃败时，一个隆重的重庆代表团于7月间到达乌鲁木齐，不久表明，盛世才同意转而效忠国民政府。1942年8月29日，国民政府代表团，其中有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到新疆祝贺盛的归顺。10月5日，盛世才决定要求苏联在三个月内从新疆撤走，1943年初苏联人履行了这个要求。1943年1月，盛世才加入国民党，随即在乌鲁木齐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盛世才为主任委员并任西北干训团主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军校分校主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新疆外事特派员。同年，盛世才处决了毛泽民及其他共产党员和“亲苏”官员，所遗职务即由国民党党员接任。

国民政府显然企图完成黄慕松、罗文干所未能完成的工作，企图除掉盛世才、

将新疆置于国民党的直接控制之下。国民党对盛世才的权力的干预以及苏联对德战争的一系列胜利，使盛世才感到他做了错误的选择。1944年2月开始，他不再在乌鲁木齐官方集会上露面。4月，他以他们图谋反对他这个老调子为理由开始逮捕国民党官员。8月，据说盛世才又与莫斯科接触，要求斯大林将新疆并入苏联，并给以援助，但未有成效。8月底，盛世才被任命为农林部长，国民党派专机前来迎接。9月，盛世才永远离开乌鲁木齐，前去就任这个闲职。1945年7月，他因遭到对他过去的行径的谴责而被解职。人们责备他在统治新疆时逮捕、监禁、杀戮了数千人。公众舆论促使国民政府把他调到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顾问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岗位。1949年，他随同国民政府迁往台湾。1954年的国民代表大会正式审查他过去的劣迹，但审查是秘密进行的。他和他的妻子邱毓芳仍过着悠闲的生活，她生有一子三女。

盛世才和美国学者爱伦·斯·怀汀合作著有《新疆：抵押品还是中枢？》一书，于1958年出版。在这本书中，盛世才为他在新疆的施政进行辩解，这和他过去的部分著作《六大政策教程》、《政府目前主要任务》中的论点显然是尖锐对立的。

施肇基 字：植之

西名：绍基·阿尔弗烈德·施

施肇基（1877.4.10—1958.1.3），外交家，1914年出任驻英国公使，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他除任英、美公使外，多次任国际会议的中国全权代表，1941年后在美国定居。

施肇基出生在江苏震泽镇忠孝里，其父施则敬系举人出身，做过经营蚕丝出口的商人。施肇基五岁时即习读中国典籍，1886年进妙香同文馆，一年后患风湿病，1887年进圣约翰书院（后为圣约翰大学），上学三年，最后一年主编学生刊物《圣约翰之声》，1890年转入国文学院就读二年。

1893年，施任中国驻华盛顿使团的学生翻译，他陪同新任命的公使杨儒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时充任此职。是年8月抵华盛顿后，同时进了中央高等

学堂。他续任使团随员直至1897年夏辞职进了康乃尔大学。1899年，辍学陪同杨儒去俄国，当时杨为驻俄使节，施在圣彼得堡任译员，以后又陪同杨儒出席第一次海牙会议。他于1901年获康乃尔大学学士学位，1902年获硕士学位，成为由康乃尔大学教育出来的第一名中国学生。他还被选入美国学生联谊会。

施肇基于1902年夏回国，去汉口探访其兄施省之，施省之当时任招商局协理。当时端方正在物色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才，施肇基就由其兄推荐在武昌的总督衙门任英文秘书、西北高等学堂总监、湖北留美学生监督。他率同一批学生去美国留学。当时，康乃尔大学经济学教授金根氏应邀来中国调查币制，施肇基由驻美使馆介绍充任译员，陪同金氏于1903年回国。在金根氏访问各省时，施认识了唐绍仪、徐世昌等大官吏。

1902年秋，施肇基第二次率湖北学生去美国，学生中有端方的儿子及顾维钧等人。自1902年后，在张之洞出缺期间端方署理两湖总督。1904年，张之洞回任，端方任湖南巡抚。施肇基回国后，他向武昌张之洞衙门作了报告。他被任命为总督府秘书长王凤超的英文秘书，与张之洞幕府的秘书毕光祖（译音）友善。毕是举人出身，对施肇基进入官场影响很大。施在处理免付厘金的进口商品事务中很有成绩，因此先后有七次任命，最主要的是铜元局督办。

1905年7月，一个五人代表团出洋考察西方政治，徐世昌请施肇基陪同前往。张之洞得悉此事后将施免职，施于是接受出国使命。出洋考察团因北京车站炸弹案延期出国。五个大臣中的三人，包括徐世昌不再出国，留下端方、戴鸿慈率领代表团，端方认可了施的任命，代表团终于12月出国。行前，施肇基于11月27日与唐积成（译音）之女，唐绍仪的侄女唐玉华（译音）（阿丽思·唐）结婚。出洋考察团先后在欧美数月，1906年中回国。9月，施肇基参加政府举办的法学考试，并取得向往已久的进士衔。

唐绍仪任新建的邮传部右侍郎，经管铁路事务，1906年任命施肇基为京汉路监督，邮传部参事。由于拒绝给浏河口矿业公司优先权，股东们施加压力将施免去邮传部职务，理由是他不受公众信任并且是以唐绍仪的裙带关系当了官的。有人以为施也会辞去京汉路督办之职，但他并未这样做。1907年4月，唐绍仪任奉天巡抚，施肇基在周震麟手下任北宁路助理督办，1908年任吉林西北

道，哈尔滨海关道，吉林林业局监督，他在哈尔滨处理的一件大事是调查伊藤博文于1909年被刺事件。1910年他辞去吉林的职务，任外务部右丞，1911年8月转任左丞，不久作为公使出使美国、墨西哥、古巴、秘鲁。在他出国就任公使前，武昌起义爆发，民国革命使施肇基在北京无所事事。

1912年春，民国政府总理唐绍仪任施肇基为交通总长，代理财政总长，6月，唐绍仪辞职，施亦去职。后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但未获国会批准。1913年11月施任总统府大礼官，1914年6月任驻英公使，12月到伦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任中国代表出席巴黎和会，但其作用不如顾维钧、王正廷。

1920年9月，施肇基任驻美公使，1921年2月就任。是年秋，任首席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提出包括有关中国的定义以及领土、主权完整和有权出席与中国利益有关的国际会议的“十点意见”。虽然中国代表团（其成员中也有顾维钧和王正廷）未能达到全部目的，但在谈判中仍取得实际利益，即于1922年2月签订的九国公约，解决了山东问题。

1924年1月，施任外交总长，但因国会不予批准而于2月辞职，于是又出任驻美公使，与美国国务院换文，商定以庚子赔款作为派遣留美学生之用，以后他担任处理这个基金的中国教育基金董事会理事。1924年夏和1925年，他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禁烟会议。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关税会议对履行华盛顿会议协定表现迟缓时，施被任命为特别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他对这次会议的贡献是在美国所作的几次讲演。1926年他在美国时，只有一次离开美国去土耳其作短暂访问。

北伐战争期间，施肇基已与国民党有联系，但他采取了很有分寸的态度，声称他的正式代表资格是“由北京政府给予的”。1928年5月，国民政府含蓄地向他的地位提出挑战，派出伍朝枢为赴美特使。国民党进据北京前夕，北京政府形将瓦解之时，施肇基主张外国政府对中采取“不介入”政策。7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确认施肇基为驻美公使。11月，任伍朝枢为驻美公使，施肇基调为驻英公使。施就任前曾回国，1929年5月赶往伦敦，代表中国出席国际邮政会议。施肇基在英国三年。1930年12月他任中英贸易委员会主任。1931年7月他任中国出席国联大会的首席代表。9月日本侵略东北后，施肇基代表

中国参加国联理事会。当国民党赞助巴黎华侨集会指责国联对中国事件处理不当，并抨击施肇基表现软弱时，施遂提出辞职，但未获批准。1932年1月，颜惠庆代替他任国联理事会理事；4月，施肇基以身体不好为由辞去驻英公使之职。因颜惠庆是在驻美公使任上去国联任职的，遂由施于10月任代理驻美公使，后颜惠庆任驻苏公使，施接任驻美公使。1935年6月中美双方将使节共同升级，施遂成为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他任此职到1937年5月，其后由王正廷接任。

1937年，施肇基退出外交工作岗位在上海居住，直至7月中日战争爆发。他担任国际赈灾委员会宣传处主任，还创办防痨协会并在上海设立附属医院。1938年7月，他被重庆国民参政会任命为参政员，但并未去自由中国从事此项活动。1940年他仍在上海，1941年6月去美国。是年7月12日罗斯福总统任命施肇基为由五名委员组成的美国南非联邦国际和平委员会的“非本国籍委员”。12月，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后，施任中国国防物资委员会副主席，驻华盛顿为中国争取战时物资。战争将结束时，施肇基任中国代表团顾问，于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1948—1950年任国际建设开发银行顾问。1954年10月，施肇基中风瘫痪了几个月，以后逐渐得到部分康复。1958年1月3日他死在华盛顿，遗有妻子、两个儿子、四个女儿和孙儿女十二人。

施肇基一生得过政府的几次嘉奖，1921年9月获得一等文虎章，1922年获得一级大绶宝光嘉禾章和二级功勋章。哥伦比亚大学、多伦多大学、格林尼大学、色拉库斯大学、拉法埃特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都曾授予他名誉学位。1954年他在患病前，向傅安民(译音)口述他1914年前的经历以备死后出版，他的早年回忆录于1962年用英文出版。

史量才 原名：家修

史量才(1879—1934.11.13)，《申报》老板、发行人。他在上海经营多种企业，又是社会上的闻人。1934年被暗杀。

史量才原籍南京，生在上海附近泗泾镇，他父亲史春帆在太平天国时移居于此。青年时他读古书应科举考试。由于义和团事件，他决心多学一些实际知

识。1901—1903年进杭州蚕桑学校，毕业后，在上海各校教书。1904年，他在上海高昌庙协助创办了一所女子蚕桑学校，不久迁到苏州，该校毕业生多人在富饶的太湖区域发展蚕桑业。史量才还积极促成江苏教育总会，同时担任了上海《时报》首任主编。他关心农业建设，在南京创建中国农业协会并担任秘书长之职。可能因此之故，1910年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南洋博览会）时，史量才被推荐领导一批专家评议农展品。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史量才已是社会知名人士，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推荐为省议会议员，负责清理上海关税，以供江苏革命政府迫切的财政需要。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任命史量才为松江盐务局总监。

1912年，史量才又成为《申报》股东兼总经理，1915年后，由他独家经营。《申报》系1872年英商美查创办。初创时，不为人重视，后因详细报道日本侵占台湾的经过而增加了发行量。1884年中法战争发生后，《申报》向读者作了现场报道。以后每逢国内外发生大事，《申报》的声誉都有增加。美查离中国，《申报》交给英侨经营。1909年，他们以七万五千元把报纸出盘给席裕福。1912年，史量才等数人，以十二万元转手购得。当时《申报》发行量为七千份，在史的经管下，1917年增加为二万份，1918年三万份，1921年五万份。1928年它声称有十四万个订户，成为国内最大的一份报纸。

二十年代国内政局不稳，新闻事业又属初创，当时的《申报》及其主要对手《新闻报》之类，避免卷入政治，大都专登非政治性消息。史量才主持《申报》后，逐渐改变报道重点，增加了政治内容的版面。史量才注意跟上形势改进《申报》。1929年他建立一个计划部门设计合理化生产过程，又聘请黄炎培、戈公振为副经理。同年他和一些朋友还控制了《新闻报》，不久他兴致勃勃地办了些附属事业，如《申报年鉴》、《申报月刊》，还创办流动图书馆和附属学校。1932年，《申报》创刊六十周年，他聘请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绘图家曾世英编印《申报》中国地图，这是私人出版的一本最好的分省全图。

1931年沈阳事变后，《申报》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严加抨击。早在1932年，史量才已成为上海著名民众领袖。当日本不宣而战，挑起淞沪战争时，史

量才开始组织上海民众维持和平与秩序。此后，史量才任上海临时参议会第一任议长。史量才在经济和实业方面对上海的影响很大，因为除新闻事业外，他又参与创设和扩充了中国南洋银行、民生纱厂、五洲药房和中华书局。他又是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温溪造纸厂副经理，招商局理事。

1934年底，史量才因胃溃疡去杭州休养，11月13日回上海，路过浙江海宁翁家埠时被刺客用枪暗杀。凶手一直没有查明，但一般人都认为系国民党负责当局所指使，因为《申报》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的严厉抨击惹怒了他们。史量才死后，遗有妻子和儿子史味赓。

石美玉 西名：石玛丽

石美玉（1873.5.1—1954.12.30），以石玛丽著名，受美国训练的医生和卫理公会医学传教士，是九江骨科医院知名的院长。

石美玉的父母是华中早期的虔诚基督教徒，他父亲是江西九江卫理公会传教士，母亲是当地卫理公会办的女校校长，石美玉是在虔诚的基督教气氛和对中国某些传统习俗极不相容的态度中成长的。例如，她父母没有给她缠足，是华中周知的第一批“大脚”姑娘中的一个，她母亲还教他读中国古书和基督教书籍。她父亲对美国的传教医生贝斯纳印象很深，无视习俗而决定让自己的女儿受训从事传教事业。贝斯纳认为在学医以前需要在文科方面打好基础，因而让石美玉进了九江女子教会学校卢利森·费许学校，她在来自美国密执安的卫理公会教士何威指导下学了十年。

1892年石美玉读完中学后，与何威小姐去美国学医，同去的还有康成，她们是中国女医生的先驱人物。石美玉在美国取名石玛丽，康成取名康爱达，两人通过了数学、修辞学、历史、物理、拉丁文的入学考试，于1892年秋天进了密执安大学医学院，1896年6月毕业。她们是最早获得美国大学医学学位的中国妇女。

1896年夏，石美玉在芝加哥医院实习后，卫理公会妇女外国传道会打算派她到中国，于是她与康成一起作为农阿华分会派遣的代表回国。两名青年医生

到九江行医，起先当地居民表示怀疑，但很快转变为信任。石美玉后来说起在九江的头十个月内，她和康一共替二千三百个病人看病，出诊三百次，她们只有一间房的医院总是挤满了人。

两年内，石美玉得到在美国结识的芝加哥医生唐福斯的帮助，解决了医疗设备不足的问题。他出钱建立了九江唐福斯骨科医院以纪念他的夫人，医院有病床九十六张，十五间诊室。1900年夏，医院快要开业时，因发生义和团运动而被迫停止，石美玉的父亲亦遇害。石、康两人逃难到日本。她们于1901年回国，唐福斯医院于12月7日开业，石美玉任院长。

两年后，康成应一个急迫的邀请去南昌创办医院，留下石美玉一人照料正在迅速扩充的九江医院。但是当唐福斯派了一名有经验的得到好评的美国护士前来分担工作时，石美玉委婉而坚决地谢绝了这个帮助，以此表明中国妇女能够成为能干的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医务人员。

1907年石美玉去美国芝加哥韦斯雷医院，在唐福斯医生的照应下接受手术治疗，并在各地一些朋友家中休养了七个月；同时为唐福斯医院募捐。她在募捐中的成就使这家医院在以后几年中有很大发展，她作为内外科医生的声望在华中地区迅速传开，对医院的需要也因之不断增大。据记载，在繁忙的时候，每月要看三千病人，而且需动“大手术”的病人也不断增加。唐福斯医生曾在手术室观察过石美玉的手术，认为“没有一个芝加哥的外科医生能比她做得更好”。

石美玉除了管理医院和看病，她在九江的二十多年里，还培养了五百多名中国护士。由于西医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很新颖的，她不得不将医书翻译成中文供护士学习。尽管在唐福斯纪念医院的责任日益繁重，她还在九江办了一个伤残诊疗所，并且还从亲属中和贫苦家庭中各收养了两名义子。

1918—1919年，石美玉用洛克菲勒基金去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做研究工作，一直到1920年6月。1920年5月12日她在德慕亚妇女外国传道分会演讲，她说美国的酒商以酒精饮料输入她的祖国是在“危害中国”。她又为留美学生讲话，希望美国的基督教徒家庭能接待中国学生，以便接受美国最好的东西。她说：“我怀疑他们是否已被人弃置不顾而在大城市游荡，并与一些给当今美国

造成很多麻烦的外籍人混杂在一起。”她又为她的妹妹不能同享她所享有的在美国教会的特殊权利而表示失望。她的妹妹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毕业生，当石美玉在美国时，她负责医院工作。

石美玉的妹妹有能力从事在九江的工作，而石美玉本人的兴趣从未局限在医学方面，于是她开始另谋发展。她对基督教教义的执着的理解，导致她从美国回国以后决定断绝同卫理公会的关系并定居在上海。她与美国传教士休斯合作，成立了伯特利医院和伯特利传道会。1920—37年间，伯特利护士训练计划闻名全国，从全国各地招生，训练了好几百名护士去发展西医。伯特利机构还办了小学和初级中学、教义班和孤儿院，石美玉还为高级护士举办主日读经班，为新学生举办木曜日读经班。她希望青年妇女在离开伯特利以前能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日后能成为护士兼传道士。休斯小姐和石美玉在上海家里收养了三十六名儿童。在此期间，石美玉作为传教士的名声已大于医生。她是授有圣职的华中地区第一名中国妇女，任中国妇女节制联谊会第一任主席，又是全国基督教联谊会会员。

1937年日本进攻中国，石美玉把伯特利传道会迁到香港，她为争取对它的支持而不倦地工作。她在美国伯特利传道总会所在地加利福尼亚的巴沙德纳居住很久。日本投降后即回上海，晚年又回巴沙德纳，1954年12月30日死在那里，终年八十二岁。

石 瑛 字：蕻青

石瑛（1879—1943.12.4），工程师、行政人员，致力于中国近代化，西山会议派成员，1932—35年任南京市市长时执法无私并厉行节约措施。

石瑛出生于湖北阳新，他的曾祖和祖父是学者，因家道中落，父亲被迫经商。幼时熟读古书，1903年中举人后，决定进武昌的新式学堂。他与同学居正、田桐友好，他们后来成为反满革命党人。

1904年秋，石瑛获湖北官费出国留学，进法国海军学堂。有一次，他和同学向国华发现在讲有关新战术新武器课时，把他们排除在外。他们愤而劫走了

一些图表文件到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家照相馆复制，摄影师发觉其来源告知了学校当局。石、向携件回法国时，即在巴黎被跟踪，因有中国使馆交涉，未作回课处理，但被驱逐出法国。石瑛遂去英国，其住处与吴稚晖毗邻。石用三个月时间初步掌握了英语，进伦敦大学作旁听生，后转为正式学生，主修铁路工程。

1911年10月底，民国革命开始后，孙逸仙由美国去英国，与英政府及私家银行商谈，商谈时的助手有石瑛、吴稚晖、李书城等人。11月，孙逸仙和李书城经法国回国，石瑛、吴稚晖经柏林、罗马回国。石瑛于1912年到南京，任禁烟运动主任，1912年4月辞职，任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同年底加入国民党，当选为国会议员。

1913年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非法，石瑛逃往英国。他在英国九年，依靠朋友的资助进伯明翰大学学矿冶，1923年回国缺乏盘费，只能在轮船甲板上占有一席之地，在蓬舱里睡眠以避风雨。石瑛身材魁梧，衣着破旧，为人坦率，性格倔强，友人们称他为“石头”。

石瑛回国后想在广东创办机器厂未成，后应蔡元培之邀去北京大学教书。1924年，湖北督军萧耀南聘请国民党党员去帮助他建设湖北，石瑛应聘任武昌大学校长不到一年。1925年回北京大学，他用很多时间发展北京地区的国民党党员。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孙逸仙逝世后，他和其他国民党保守派在北京举行了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主张清党，弹劾汪精卫。

1926年夏北伐开始，石瑛到广州，在石井兵工厂当工程师，他彻底改组了兵工厂，使该厂出品成倍增加而消耗则减少一半，对国民革命军北伐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湖北省主席张知本任石瑛为建设厅长，张难先为财政厅厅长，严重为民政厅长。这一批人为湖北省政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他们没有官僚习气，没有矫揉造作，因此被称为“湖北三杰”。1929年冬石瑛辞去建设厅长之职，任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不久，当时的浙江省主席张难先请他去当浙江建设厅长，他就任后，认为首先需要建设杭州江山铁路和杭州发电厂，但省库匮乏，他向上海银行贷款兴建，为节省费用，他又免去几名徒领高薪而不干事的外国

水利专家。

石瑛擅长处理行政事务，国民政府乃任他为南京市市长。他在新岗位上，不满足仅仅做些整理市容的工作，他调整了税收及别的事务，并规定新规章，适用于各个阶级，包括那些自以为超越于法律之上的政治领导人。为养成节约风气 and 推行国货，他本人常穿中国国产衣服并要求市政府官吏和公立学校员工也这样做。他深信年轻人应该养成节约习惯，于是在公立学校门口设立警察劝阻有钱的官吏不用小汽车接送子弟。他增设私立学校，提高教师薪金，物色合格校长。他还向传统的小工业业主发行他们购买得起的政府公债，并以此款服务于市民。石瑛在南京市市长任内，中日关系进入决定性阶段。他采取了坚决反日姿态，甚至拒绝在公开场合会见日本总领事。1935年8月，日本一私人团体到南京访问，汪精卫下令全体高级官吏到机场欢迎，石瑛认为此举系国家耻辱，愤而辞职。7月24日，他被任命为考试院甄核司长，使他有可能会整顿中国混乱的文官系统。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湖北因地位重要，省政府改组，任命石瑛为建设厅长，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职务。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他的这项工作既有建设的任务，又有破坏的任务，尤其是公路方面。他还协助制订撤退工厂和建立合作企业的计划。1938年秋，石瑛积劳成疾，因病辞职。翌年，他当逃为在战时省会恩施开会的湖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他在恩施也创办了一个合作经营的棉麻纺织厂，将产品廉价销售给政府或士兵，收入则用来资助教育事业。石瑛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1943年7月死在重庆，遗有妻徐氏，子宪中（译音）。国民党的非官方的历史学家冯自由，称石瑛是“民国以来最清廉忠诚的官吏”。

舒庆春 笔名：老舍

舒庆春（1899.2.3—1966.10），以老舍之名知名，长篇和短篇小说家，擅用北京方言写幽默喜剧作品，中日战争期间及以后他也写了宣传性剧本。他的《骆驼祥子》未经本人同意改名为《黄包车夫》又加删改译成英文出版而为美国人所周知。

老舍出生在北京，是满族后裔。他幼年时，父亲即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期间死去。他读了小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后，决心从事教育，十七岁时当上一个市立小学校长，又由该校派他去江苏、浙江等省考查学校教育。回北京后，被提升为北郊地区“劝学员”。他不喜欢这工作，不久辞职，改任顾孟余创办的北京教育会秘书，同时又在高等学校教中国文学，以谋取自己生活和赡养母亲所需的费用，又供自己进燕京大学读书的学费，并积蓄了一些钱备出国之用。

1924年，老舍去英国，在伦敦东方非洲研究院找到一个教北京官话的工作。此后五年间，他在该校一名汉学家爱格顿家中，协助他把《金瓶梅》译成英文，该译本以《金莲》为名于1939年出版。老舍为进修英语而读了狄更斯的小说，这又激起了他写小说的兴趣，1926年初他写了《老张的哲学》，描写两个诚实少年和一个惯于恶作剧的教师，其性格描写得力于狄更斯的手法。这一作品表现了老舍的幽默才能和卫护受损害者的性格，老舍本人后来对这作品并未重视。但当时牛津大学学生、文学研究会的创办人之一许地山读了以后把它介绍给《小说月报》，该刊自1926年7月起加以连载。

老舍在英国期间，还写了两部小说，一部是《赵子曰》，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部严肃的讽刺小说，在风格和构思方面都比前一作品有显著改进，在1927年3月至11月的《小说月报》上连载。小说以北京的一个大学生赵子曰为中心，老舍痛责中国新的学生界的腐化无能，他们贪财爱色，愚昧欺诈，这与老舍心目中足以担当救国责任的英雄人物是背道而驰的。老舍在伦敦写的第三部小说是《二马》，连载在1929年5月到12月的《小说月报》上，1931年4月以单行本出版。小说的两个中心人物是广东籍父子俩，他们在伦敦古玩店，老舍描绘了这对父子与中英人士的交往，企图从中揭示出不同观点和经历的中国人和英国人对中国的革命变化的不同态度和反应。他特别着重描写小马对个人幸福和国家责任之间的心理矛盾。

1929年，老舍离开英国，在欧洲大陆住了三个月，然后去新加坡，在那里的中学里教了六个月北京官话，同时又开始写小说，名为《小波的生日》，取材于他在街道上见到的儿童生活，连载于1931年1月到4月的《小说月报》上，1934年以单行本出版。

1930年老舍回国时，他已是相当有名望的喜剧作家了。不久他发现单靠写作不足维持生活，遂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教书，他在齐鲁一直工作到1934年，其间写了一些随笔。其中的第一部小说是《大明湖》，该书从未出版，原因是1932年1月日本进攻上海，商务印书馆挨炸，原稿被毁。1932—1933年在《现代》杂志上连载的《猫城记》，对中国不能在现代世界中取得合法地位作了讽刺性描写。1933年发表的《离婚》，继续揭露中国人性格中和社会上的地域观念弱点，他认为这是中国在世界各国中处于低微地位的原因。故事情节围绕主人公老李展开，他把乡下老婆带进城市，希望把她改造成成为一个老练的女人，末了又不得不把她带回乡下以约束她的奢华行径。

老舍在这期间写了一些短篇小说，一共出了三个集子，1934年出版《赶集》，1935年出版《樱海集》，1936年出版《蛤藻集》，这几个集子中包括了老舍几篇最佳作品，如《黑白李》，描写兄弟两人，哥哥为弟弟作了一辈子牺牲，终于代替弟弟被处死刑。

1934年，老舍决定不再教书，专心写作，很快写成了《牛天赐传》，人们认为此书是用来教育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渺小的英雄人物的。这一作品的文学价值不大，但对老舍思想的变化却有重要意义。《离婚》含蓄地说明承认个性是使中国摆脱腐败和麻木不仁的途径。但《牛天赐传》则对此表示怀疑，而强调了社会环境的重大意义，说明孤立的个人与之斗争是无用的。这种心境的变化，在老舍以后的作品中充分反映了出来。

老舍因为单靠写作不足以维持生活，又重新教书，进了青岛大学。不久他写成了他的最了不起的杰作《骆驼祥子》，最初在1936—37年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上连载。这是描写北京一个健壮善良的黄包车夫的不幸和悲惨结局的动人故事。老舍清楚地表明在一个与人类道德相对立的社会中，个人的努力只能落得悲惨的结局。该书的单行本因1937年7月日本进攻而拖延到1939年才出版。1937年，老舍出版了《老牛破车》，这是一本有关他自己创作小说的经过和谈论文学语言、风格的文集。

中日战争开始后，老舍到了汉口，1938年8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席，他任此职直至战争结束。他和姚蓬子合编《抗战文艺》，在当时

的所有作家中，老舍是唯一与共产党又与反共分子双方都相处得很好的作家，他被一致选出担任这个重要的宣传工作。战争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重庆，积极组织 and 鼓励作家以文艺为战争服务。他本人也继续写作，与戏剧家合作写了一些剧本。他写了《长河》，后又与青年剧作家宋之的合作写了《国家至上》，这是一部描写回汉民族共同热心国事的热烈的爱国主义作品。他为时尚之所好，写了一首大鼓词《箭北篇》。1939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火车集》。翌年，香港作家书社未经本人同意，出版了老舍1936—37年在《论语》上连载的《文博士》，这部作品辛辣地剖析了一个获得美国哲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他最后同一个富家女儿结婚，却又怀疑自己原先为什么要到美国去留学。

中日战争开始后不久，老舍在武汉写的发表于《宇宙风》的一封信中，希望青年作家保重身体为国效劳，他抱怨自己睡眠不够，必须把每小时都用于抗日斗争而不能休息和思索。不久老舍的健康受损，战争结束前他多次住院。

1943年，老舍出版了剧本《归去来兮》。翌年，发表小说《火葬》，这是叙述某一城市中的汉奸和爱国人士的故事。他在这篇粗糙的宣传性作品的序言中说，如果不是经济拮据，在正常情况下他是决不会发表这样的作品的。1944年出版小说选集《贫血集》；1945年出版《东海巴山集》，选用了《火车集》、《贫血集》中的作品。同时，老舍开始写三部曲《四世同堂》，取材于日本占领北京八年期间的一个故事，前两部《惶惑》、《偷生》发表于1946年，第三部《饥荒》发表于1950年，《四世同堂》象《火葬》一样因为是一部宣传作品而受到损害。

1945年，由爱温·金（罗伯特·斯·单德的别名）把《骆驼祥子》译成英文，用《黄包车夫》的书名出版，由每日书社推选成为美国的畅销书。1946年老舍和剧作家曹禺由美国国务院文化合作机构邀请去美国。老舍在美国逗留期间，作了几次有关中国文学的讲演，协助翻译了他的几篇小说。《黄包车夫》的翻译出版未经老舍同意，他对原书的悲惨结局被篡改为喜剧很感不快。《离婚》也发生了问题，有一本署名为“老的宿舍”（老舍这个名字的意译）而未经他同意的英译本出版了。老舍经过法律诉讼，才使他所同意的、由海伦·郭翻译的该书英文本《老李对爱的追求》得以出版。老舍在美国住了三年，写了他最

后的一部小说《鼓词歌手》，由海伦·郭译成英文于1952年出版，但从未用中文发表过。

老舍回国后，在北京受到全国文艺界联合会的正式欢迎。他立刻投身剧本创作，参加政府的文学组织和各种委员会。继《方珍珠》之后，他于1951年初写成了《龙须沟》，该剧描写北京一个贫民窟地区由旧到新的改造，获得了评论界和公众的热烈赞赏。1951年，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不久他担任了北京市文联主席，1953年任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56年任推广普通话中央工作委员会委员。老舍在五十年代中积极参加了各种文化和政治运动，例如百花齐放的运动。1958年3月，他和别的文艺家一起，一共五十人联名发表宣言，要求文艺创作来一个“大跃进”。

老舍继续积极写作，除上述剧作外，他于1951年发表《别迷信》，1953年发表《龙须沟》，1954年发表颇有影响的《和工人同志们谈写作》，1955年出版了有关朝鲜战争的小说集《无名高地有了名》，1956年发表讽刺剧《西望长安》，1956年改编著名传统剧《十五贯》。1957年发表的三幕剧《茶馆》，是一个有优秀语言技巧以及北京不同阶层方言的剧本。他想借此概述他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此外尚有1958年出版的历史和评论文集《福星集》，1956年出版的剧本《全家福》，1961年出版的儿童剧《宝船》，1964年出版的《出口成章》，这是一本有关文学语言的论文集。

1966年10月，老舍据传由于红卫兵的折磨而死去。

舒新城 原名：维周

舒新城（1893.7.5—1960），编辑，出版家，以著名的百科全书《辞海》的主编闻名，该辞典由中华书局于1936年出版。

舒新城生于湖南溆浦，出身于世代佃农之家，他父亲曾上学几年，学习读书、写字和记账。母亲徐氏勤俭治家，舒新城出生后，她就外出工作，希望他能受到教育而不再被迫从事田间劳动。1898年，舒新城的父母积蓄了一些钱送他上当地小学，学一些中国古文献籍。1898年，舒新城和比他大三岁的姑娘订

婚，次年她住到舒家。但因和舒相处不和睦，于1903年解除了婚约，她回娘家去了。1903年，舒新城在族学中读书，课余还为他父亲新开的杂货铺帮忙并学习管账。1904年，族学迁到湘西山区，舒新城更可以摆脱家庭的约束而自由自在了。

1905年，舒新城离开族学随张准昌（音）读书，这位老师不要学生做八股文，反而把经文和当时时政联系起来讲解，还介绍他们阅读谈论时政的《新民丛报》等出版物。在这位老师的教导下，舒新城学业进步很快，而且很可能也是由于他的影响，舒新城有志于把教育作为自己的事业和研究对象。1907年，舒新城进入免费的罗梁（音）学堂，1908年该校成为府办高小。舒新城的学识比大部分同学丰富，因此他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读政论文章和小说，还打拳，练字，刻图章，画画。1911年4月，他因带领学生罢课要求学校在军训课上发给真枪进行操练而被学校开除。

1911年冬，舒新城遵照父母之命结婚，因舒母苛求于儿媳，夫妇生活不愉快。1912年，舒新城把妻子送回家，自己去了常德，在那里的师资训练班读了几个月书。他去长沙过了一个冬天，1913年6月曾去武昌，后来进了湖北高等师范学校，他卖去了被褥衣物和他自己的书法作品交了第一年学费。1917年毕业后，他去长沙和妻子重叙。

舒新城一度在长沙一个中学教书，很多时间他都在本地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度过。1916年他协同创办《湖南日报》并在那里工作。1918年成为长老会教徒，在福湘女校教书，同时还任长沙青年会社会福利部主任，又在省立第一中学教音乐。1919年辞去这二职，专在福湘女校教书，任教学主任。1919年11月，学校开除了一名学生，其理由仅仅是她收到表兄的一封信。舒新城在《学灯》上发表文章对学校当局加以责备，因此与学校中美国传教士发生冲突而辞职，与此同时，他也脱离了长老会。

舒新城离开福湘女校后，与友人创办了《湖南教育月刊》，因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而只能秘密出版。月刊的撰稿人中有毛泽东，该月刊仅出版了五期即停刊。舒新城为了避免政治迫害，1920年6月离开长沙去上海，参加《时事新报》工作。同年夏天，谭延闿推翻了张敬尧，舒新城回长沙，在第一省立师

范学校教书。1921年6月,《中国时报》主编、中国公学教务长张东荪请舒新城主持该校中学部。舒应聘去吴淞,不久学校因发生纠纷而罢课。经长时间谈判纠纷解决后,舒新城决心将他最欣赏的教育理论道尔顿计划付诸实现。这种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是马萨诸塞州道尔顿学校体系中的派克赫斯于1919年介绍入中国的,它强调根据学生个人的不同需要进行教学,并将传统的课程划分成个别完整的单元。1922年底,吴淞的一些同人不断反对道尔顿计划,舒新城愤然辞职。除掉这个不愉快的结局外,在吴淞逗留的十八个月,对舒新城今后的发展影响很大,因为他结识了张伯苓、叶圣陶、朱自清等知名的知识界人士。此外,又结识了上海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

1923年,舒新城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南京省立中学教书。1923年夏,他去江苏、安徽、浙江的三十五所学校讲学宣传道尔顿计划。年底,出版《道尔顿制研究集》,因此,舒新城于1924年10月,被聘为成都高级师范学校教育心理学教授。该校一些反动同事,因有一名女学生刘芳经常去探访舒新城而对舒大肆诽谤。虽有学生支持他,但终因压力很大,舒在1925年6月逃回南京。当时河南师范学校和北京师范大学都请他去,但舒新城决定不再教书而投身于出版事业。

早在1924年,陆费逵请舒新城去中华书局主编中学教科书,舒未应允,但表示愿意编写一些成人读物《国民读本》。1925年,他再次退回陆的聘请。此后三年他根据过去有关教育问题的研究和演讲,写作、出版了一些书,其中有1925年出版的《中国教育指南》、《教育丛稿》,1927年出版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近代中国留学史》,1928年出版的《教育通论》、《中国新教育概况》、《中国教育辞典》、《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他完成了这些著作之后,应中华书局之聘任编辑部主任,主编《辞海》。

中国的第一部百科辞典,是陆尔奎主编于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辞源》出版的成功,使其他书局也作了相同的出版计划。1915年,中华书局就开始编辑百科辞典,但在舒接手之前进展很慢。开始时,舒在书局的其他工作妨碍了他投入《辞海》编辑工作。1930年后,他才专心致力于此,和五十个编辑人员一起,编辑一本比《辞源》规模更大、选订更精的参考书,1936年

以二卷本出版。收有一万三千个单词，十万个词汇，其中包括戏剧、小说，俚语和更多的传统事物，还包括许多新的中国、日本词汇，在装订方面也有许多可贵的创新。1947年该书以单卷本出版。

舒新城在主编《辞海》的时候，继续进行著述，1930年写了《现代教育方法》，编辑了简要解释不同学科和学术术语的《中华百科辞典》。1931年写了《致青年书——讨论几件关于读书的事》、《中国教育建设方针》，1936年出版回忆录《狂飚录》，和一本游记《蜀游心影》。

中日战争时，舒新城留在上海，1939年一度去香港。1945年出版了两本书，一本也是回忆录《教育和我》，一本是游记《漫游日记》，又出版了过去十年的书信《十年书》。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他留在国内。1954年作为湖南省代表出席全国人大，1959年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人大。舒新城于晚年收集自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教育史资料，以《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为名于1961年出版。1960年舒新城去世，遗有妻刘芳，他们是他的第一个妻子去世四年后于1931年结婚的。

宋氏家族

宋氏家族，常被看作是民国时代的第一家族，在短短一代中，就由默默无闻的地位崛起，而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居于显赫地位。宋子文在国民政府的财经结构中实施了许多重大改革，又是中外政治和财政金融界的重要联系人物。宋氏姊妹霭龄、庆龄、美龄，是孔祥熙、孙逸仙、蒋介石的妻子。

宋氏家族的起源，如同后来的显赫一样是很值得注意的。宋嘉树青年时在美国住了八年，为建立中国同美国人的关系打下了基础。当时他已变得如此欧化，以致他才回上海，为了能在长江下游作为卫理公会的牧师进行传教，不得不重新学习当地风俗习惯和语言。他在苏州地区昆山一带传教时，又遇见了在波士顿就已认识的牛惠生的兄弟牛上周（译音）。牛上周和浙江余姚倪家的三个女儿之一结了婚，倪家是最早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徐光启的后代。牛上周把妻妹倪桂珍（1869—1931，7，23，）介绍给宋嘉树。倪桂珍先就读于家庭教

师，后进培文女子高等学堂读书。她爱弹钢琴，足见其受西方影响之深。宋嘉树在美国受到的基督教训练所获得的社会地位，有助于他向倪桂珍求婚，并得到她家庭的同意。1887年，宋嘉树倪桂珍的婚礼由南方卫理公会教士里德主持，1890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宋蔼龄出世，1892年，次女宋庆龄出世。

宋嘉树因家庭负担加重，又与上司杨·艾伦博士发生冲突，所以自1892年后不再从事传教工作而转向经商，但是他在上海卫理公会的活动中仍然是活跃的。他所经营的一个企业是美华书馆，出版中文圣经及其他宗教书籍。此后十年间，他们又生了另一个女儿宋美龄和三个儿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

1905年，宋嘉树一度去美国，为长女进入乔治亚州麦康市卫理公会的威斯莱女子大学进行奔走。三年后，宋庆龄、宋美龄也到了乔治亚州，宋庆龄进了威斯莱大学，宋美龄因年龄太小，就读于家庭教师，直到年岁稍长，才去北方进了威尔斯大学1917级。同时，宋子文进了哈佛大学，于1915年毕业；宋子良于1921年毕业于凡顿贝特大学；宋子安于1928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宋嘉树的子女都在美国受高等教育。

民国成立后，宋氏家族与中国的政局就发生直接关系。1912年宋嘉树与1894年就认识的孙逸仙商榷，将1909年回上海的宋蔼龄介绍给孙逸仙当英文秘书。1913年，宋嘉树夫妇和宋蔼龄于二次革命后随同孙逸仙去日本，后来宋蔼龄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成为孙逸仙的英文秘书，他们于1914年结婚。

1918年5月，宋嘉树死去，他的妻子掌管上海的家产，她的英语虽不甚好，但仍有许多西方教会的朋友，并且热心于慈善事业和上海艾伦纪念教堂的活动。当时宋子文和宋美龄在上海，宋庆龄则随着孙逸仙的政治命运的起伏陪同孙来往于广州上海之间，宋蔼龄和孔祥熙以山西为基地，忙于经营兴旺的家业和铭贤学校的事务，该校于1919年变为美国奥伯林大学的附属中学。

二十年代初期，孔祥熙开始为国民党工作。1923年，宋子文到广州，参加民国政府工作，加强其脆弱的经济机构。1925年初，孙逸仙病重，宋家大多数人都到了北京。3月12日，孙逸仙逝世，宋美龄和协和医学院的注册主任艾娃·麦克米伦安排一周后在学院教堂中为孙举行基督教私人丧礼。孙逸仙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发生继承危机，导致派系的产生，最后使宋氏家族本身也发生分裂。

孙逸仙在世时，宋庆龄并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当国民党内部分裂，国共合作也摇摇欲坠时，宋庆龄作为中华民国缔造者的活着的象征人物而被投入政治。1926年从广州出发的北伐，使蒋介石崛起成为军事首领，于是情况就更为复杂了。当年底，宋庆龄和宋子文都在武汉参加了国共的联合政府。1927年纷繁的事故，更增加了宋氏家庭内部的纠纷，尤其当蒋介石向1924年在广州孙逸仙寓所认识的宋美龄提出求婚时，问题就更为尖锐了。蒋介石是已经结过婚的人，而且并非基督教徒，看来很难与有基督徒的家世、在上海很引人注目的一名威尔斯大学的校友相匹配。宋蔼龄赞成这桩婚事。宋庆龄极力反对，认为新的国民党的政策违背孙逸仙的主张，她于1927年8月去莫斯科。蒋介石最后得到宋美龄的母亲的最关紧要的赞同，于1927年12月在上海同宋美龄结婚。

1928—36年间，是国民党统一全国、近代化和实行改革的时期。1928年，宋子文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争取到了长江下游的主要银行家的财政支持，他也致力于为中国争取关税自主，取缔妨碍经济的内地税。孔祥熙出任工商部长，他的靠山是宋蔼龄。但是关键人物是宋美龄，她那作为民众活动家和社交界妇女的才能迅速地从上海扩展到全国。只有宋庆龄仍然坚定地反对国民党的新领导，她留在苏联直到1929年，然后回国在南京参加她丈夫的国葬。

蒋介石为了与宋美龄结婚答应加入基督教，于1930年10月23日由江长川主持在上海艾伦纪念教堂受洗入基督教，他和宋美龄两人宣誓共同信奉基督教教义并致力于中国的复兴。蒋介石的受洗是他岳母的一次胜利，她在三年前从蒋那里取得他信从基督教的许诺。蒋介石的岳母不如她的亡夫那末欧化，她之所以欣赏蒋介石还在于他们是浙江同乡。一些消息灵通的局外人士说，蒋介石是她的得意女婿。蒋介石受洗后不久，1931年7月，他岳母死在青岛别墅。

1932—1937年间，宋庆龄住在上海，她坚决反对蒋介石及以南京为基地的国民党，认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反动的，经济措施是表面文章，社会政策是压迫人的。尽管有这些指责（受到共产党的响应），国民政府当宋氏家族在南京做官期间确实在中国实行了改革。直至1933年秋天宋子文在国家财政的建立和指导上起了主要作用，然后他辞职不干，原因是反对军费狂增和滥发短期公债，

又反对蒋介石所加于敌手的没有经济价值的军事征伐。此后十年间，孔祥熙继其内弟担任此职。1934年，所谓新生活运动开始实行，提倡基督教教义和中国传统道德。由此反映出宋美龄在国民政府中的影响，她还引用了不少受过美国教育的、具有基督教背景和信仰的人士进政府工作。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使宋氏家族和国民党同样遭遇到危机。当宋子文、宋美龄参与有关释放蒋介石的谈判时，孔祥熙却由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临时主持南京政权。1937年后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爱国热情的高涨，使宋氏家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和解。1940年春，他们从香港飞往重庆，宋庆龄在一次草地宴会上被蒋介石作为上宾迎接。四十年代初期是宋氏家族在国民党区域内政治影响最大的时期，特别是宋子文，大约在1940年又成了显赫人物，他在与美国商谈借款后于1942年飞回重庆，任外交部长。宋美龄的至友郑毓秀的丈夫魏道明出任驻美大使。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宋子文是外交界与国际交往中的主要人物，在这些年里宋子文投资的不少政府企业由他的两个兄弟主持。

1942—43年间，是宋氏家族在国外，至少在北美给人印象最佳的时候。当时宋美龄大肆宣扬访问美国、加拿大的成功，争取了对国民党中国和蒋介石的支持。1943年2月、6月她先后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和加拿大议会作了讲演，形成她这次出国访问的高潮。1943年夏回国后，宋美龄继续作他丈夫的英文翻译以及处理战时外交事务的顾问。

战争结束时，宋子文任行政院长、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此后，宋氏家族的影响普遍下降，孔祥熙已经六十五岁，实际已退出公众生活。宋子文由于国民党统治地区经济恶化成为众矢之的，于1947年辞去原职，改任广东省主席。宋美龄的魅力也不灵了，1948年突然飞往华盛顿请求援助未能成功。宋庆龄继续住在上海成为福利会的推动力量，给与共产党有关的机构以基金，并成为一小群反对蒋介石、支持毛泽东的人士的中心。1948年，宋蔼龄生病，孔祥熙就和她转到美国去了。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宋庆龄担任好些官方职务。1949年后，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用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表明孙逸仙的革命运动和共产党的革命之间的继承性。1950年1月，宋美龄离开美国到了台湾，和她

丈夫在一起。孔祥熙夫妻两人仍在美国，虽然在1967年8月孔祥熙死去之前，他曾两次到过台湾。宋子文、宋子良亦住在美国，宋子安任广州银行董事会主席，经常来往于他住家的旧金山和银行所在地香港之间，他于1969年2月死去。

宋氏家族的命运反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华民国社会风向的变化。就中国的政界而论，宋家之所以能起而掌握权势，同这个家族的根蒂在广东、浙江两省不是没有关系的，这是国民党政治中的两个关键省份；而宋庆龄之与孙逸仙的婚姻，更加速宋家的兴起，没有这种关系，宋家的其他成员能否达到如此显赫的地位是很可疑的。反过来说，与宋家结婚的政界领导人，如若没有宋家的财政界人物特别是宋子文的合作，能否建立起稳固的政府来，也是很可疑的。宋家之所以显赫，与他们同美国在宗教上、教育上的个人联系也是有关系的。但是，宋家的显赫未能延续到第二代，宋家两个最著名的姐妹宋庆龄和宋美龄都无嗣，宋霭龄的儿女对中国的事情没有影响，宋子文的三个女儿虽与本国入结婚，但都居住国外，置身于中国事务的主流之外。

宋嘉树 原名：韩乔荪（音）别名：耀如

宋嘉树（1866—1918.5.3），受过美国教育的传教士，后成为上海有成就的商人和实业家，有影响的宋氏家族的家长。

宋嘉树生在广东海南文昌县，是韩洪业（译音）的第三个儿子，他父亲像广东不少贫苦人家一样，把孩子送到海外谋生。1875年，韩乔荪和他的一个兄弟去东印度群岛。三年后，过继给无子女的舅父，舅父把他带到美国，改原名韩乔荪为宋嘉树，在过继父亲设在波士顿的丝茶行当学徒，不久逃走。

多年来人们传说宋嘉树逃匿在波士顿港口的税收巡行船“柯尔佛克斯”号上，船长查理·琼斯收留他当了一名侍童，使他信了基督教，并准备送他去受高等教育。后来他受洗礼时取教名为查理·琼斯，表示对他的恩人的感激之情。这些情节由于反复传说，被人信以为真，未加否认。直到1949年时，一个曾在美国海岸警备队服役的记者恩赛·爱·士德洛得，写了一篇《西·耶·宋

和美国海岸警备队》，文中说，1879年初，宋登上的波士顿美国税收巡行船叫“阿尔伯特·加伦汀”号，船长艾立克·加布里尔逊把他列为侍童，从此他成了一名海岸警备队人员，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于1879年1月8日开列的花名册上。1880年5月加布里尔逊转到巡行船“舒勒·考尔法克斯”号，该船当时停泊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登市。宋请求免去在原船的职务去卡罗来纳州追随加布里尔逊，8月1日，列名为其属下。加布里尔逊是一名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向宋宣传基督教，而且每当船靠岸时就把他带到教堂去。1880年11月7日，这个男孩在威尔明登市第五街卫理公会教堂由汤姆斯·佩其·里考牧师给予洗礼，取名为查里·琼斯·宋（1886年回中国时始加上宋姓）。

宋嘉树希望能上学并作为传教士回中国，他得到一名事业兴旺的厂商儒理安·斯·加尔将军的帮助。加布里尔逊为他从海岸警备队退了职，安排他于1881年4月进了三一学院，成为一名特别预备生跟从校长克来文学习。三一学院后来改成德克大学，当时有两幢校舍、六名教授，不到二百名学生。1882年秋，宋嘉树进了田纳西州纳西维尔的凡德比大学神学院，暑假时，他制造和出售帆布床并协助田纳西和北卡罗来纳的传教士进行传道工作。1885年春毕业后，他希望留在美国学医，声称这门学问有助于他进行传教工作，加尔允予资助学医费用，但是凡德比大学的董事会主席麦克梯埃里主教表示反对，他认为宋嘉树可能会沉湎于美国的舒适生活不愿再到中国去过艰苦的传教士生活。宋被允许参加卫理公会主教派会议北卡罗来纳州年会，由于麦克梯埃里主教的特别申请，宋嘉树被年会授以圣职派去中国传教。

宋嘉树于1886年1月到上海后，开始学习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方言。因为上海话同他本乡的方言大不一样，而他本人已经彻底美国化，以致他一生从未恢复对中国食品的喜悦。以后他又把六个儿女都送到美国上学。1886年11月在华传教士大会举行首次会议时，宋嘉树被派去苏州地区昆山一带传教。第二年，他与倪桂珍（1869—1931.7.23）结婚，倪家是中国清朝初年的大官和第一批基督教徒之一的徐光启的后裔。1889年又调到上海乍浦区，那时他还任在一些学校中教英语，其学生中有胡适。

1892年，宋嘉树辞去教会职务，原因显然有二：与上司的冲突及经济问

题。据宋嘉树说，他的上司、《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亚伦·杨博士）与下属相处时缺少基督教的慈善精神，例如他不准宋嘉树去探望父母。林乐知又看不起宋的教育水准，认为他是“无国籍华人”。1892年宋嘉树已有一个孩子，第二个又将出生，他给在美国的朋友写信说，“他和他一家”每月靠十五美元是无法生活的。

宋嘉树虽然辞去教会职务，但仍是一个虔诚而活跃的基督徒，他办了一家“美华书馆”出版中文圣经，他又办了很成功的商业事务，但与宗教无关，例如他是上海福丰面粉厂的经理。但是他的宗教活动使他在上海作为一个卫理公会的世俗领袖赢得很大声望和影响。他在上海创办中国青年会，与美国的上海圣经公会有密切来往。他又在主日学校教书，并给卫理公会慷慨的财政支持。他的妻子在上海的教会工作中也很知名，他家里常有外国传教士出入。

宋嘉树除作为基督教的世俗领袖和商人以外，还被人认为是个革命者。大约在1894年，他与孙逸仙在上海相见，成了国内最早一批听到孙逸仙革命道理的人。他参加革命活动的详情不得而知，人们认为他是孙逸仙的热情支持者和他的知友。1912年民国成立后，他的长女宋霭龄成了孙逸仙的英文秘书。1913年，宋嘉树夫妇和宋霭龄随同孙逸仙去日本。宋霭龄与孔祥熙结婚后，次女宋庆龄成了孙逸仙的英文秘书，并于1914年10月25日同孙结婚。

宋嘉树非常爱美国，但自1896年后，他只去了美国一次。1905年他去杜汉姆住了几星期，会见了他的老朋友和恩人，并为他的长女安排入学事宜。1916年加尔将军回访来华，受到宋嘉树两位女婿孙逸仙和孔祥熙的隆重接待。

宋嘉树于1918年5月8日因胃癌死在上海，遗有妻及子女六人：霭龄、庆龄、子文、美龄、子良、子安。1942年11月1日，美国为表彰他对卫理公会及对中国的贡献，在北卡罗来纳威尔明登市第五街卫理公会教堂建立了宋嘉树纪念馆。

宋庆龄

宋庆龄（1892—），孙逸仙夫人，热心社会福利事业，1949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各种职务。

宋庆龄，宋嘉树的次女，生在上海，她同她姐姐宋霭龄一样在上流的麦克

士爱里女子学校上学。1908年，她与她妹妹宋美龄到美国进了乔治亚州麦康的卫理公会威斯来女子大学，那时宋霭龄已在该校高年级上学。1913年毕业后回国。

宋庆龄回国时，宋霭龄任孙逸仙的英文秘书。那时孙逸仙时运不济，袁世凯反对革命党，民党起而反袁，1913年中发生的二次革命一开始就失败了，8月，孙逸仙不得不逃往日本。宋霭龄决定在东京与孔祥熙结婚，不再跟从孙逸仙，英文秘书乃由宋庆龄继任。她和孙逸仙直接接触，不久就从敬仰而生爱慕，宋庆龄同意同比自己年长二十六岁、且已有前妻生的两个孩子的孙逸仙结婚，1914年10月25日在东京举行婚礼。

他们自结婚至1925年孙逸仙逝世，宋庆龄始终是他的伴侣、助手和亲信。作为孙夫人，她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和广州度过，陪同孙与各种政治和军事的敌人作斗争而来往于这两个城市之间。孙曾一度掌握了广州军政府作为反对北京政府的政治中心。接着就是被迫隐退居住于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的寓所，从事制定和完善自己的政治理论。在这十年里，宋庆龄充当了一名政治助手、私人秘书和贤淑的妻子。

作为南方政府的一名地位很高的妇女，1922年6月她也经受了艰苦的生活。1920年底，经陈炯明帮助，孙逸仙回广州主持革命政府。1921年5月孙在广州经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就任非常大总统，进而准备北伐。但是他的主要军事助手陈炯明反对北伐。两人的分歧终于导致陈的公开叛乱。1922年6月16日凌晨，叛军包围了总统府，孙逸仙事先没有准备，依靠少数卫兵，不足御敌。据宋庆龄回忆，孙一得到被围的报告就把她叫醒，她因不愿自己拖累他而不肯随他离开，坚持要他先行离去到“永丰”炮舰上避难。孙匆匆离去登上了一艘军舰。是时，陈炯明的叛军已到达位于小山上的总统府，宋庆龄一直留在那里直到16日中午，然后由三名卫兵护送，杂在人群中从后院逃出，所带物品则为叛军劫走。当时幸未被人认出。后来她隐藏在一间小屋中，其时她已因身心紧张而精疲力竭。最后她安全抵达沙面，并于6月18日到达黄埔。

1922年8月孙逸仙不得不离开军舰到了上海，着手对国民党进行大改组。1923年1月1日他以国民党名义发表宣言重申三民主义为党的基本纲领。1月

底，举行了与苏联代表越飞的历史性会见，发表了联合宣言。宋庆龄参加了所有这些活动，但那时作为一个幕后人物，她既未参与政治，也未发表任何足以表明政治意向的见解。

与此同时，忠于孙逸仙的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孙逸仙夫妇回广州，孙再次主持军政府，任大元帅之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稳步进行，并在1924年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接着成立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8月，在广州设立了中央银行，宋庆龄的弟弟宋子文任行长。

孙逸仙虽然再次准备从广州出发进行期待已久的北伐，但在1924年11月他接受北京军政首脑的邀请前去商谈国事。1924年11月13日在宋庆龄及其他一些随员，其中有汪精卫、陈友仁、李烈钧等人的陪同下离开广州，经香港、上海、日本去北京，12月4日到天津。那时，孙逸仙已有病，他去北京接受治疗，1925年3月12日逝世。自1924年11月中旬孙逸仙离开广州到他逝世，宋庆龄始终在孙逸仙身旁。孙科闻其父病重赶到北京，在孙临终前数日亦在孙逸仙身旁。

孙逸仙临终留下政治遗嘱，呼吁其信徒继续未完成的革命。他在家庭遗嘱中，将所遗财物书籍和上海寓所留给宋庆龄。

孙逸仙在世时，宋庆龄从未公开从事政治活动，但到1925年，作为中华民国缔造者的遗孀，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国民党领袖的尚存的代表人，情势迫使她不得不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同时孙逸仙领导过的党内出现派系的征兆也要求她这样做。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廖仲凯夫人何香凝也被选上，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则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此后历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包括1945年在重庆举行的亦即在大陆上最后一次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11月，北伐军占领了武汉，广州国民政府先遣孙科、陈友仁、宋子文、徐谦及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五人到武汉调查政府迁都武汉的问题。宋庆龄与五人同行，先到了为蒋介石所占的南昌，在南昌受到蒋介石的盛大欢迎，最后乘船于12月10日到武汉，宋庆龄则从南昌乘飞机早二天于8日到达武汉。

1926年12月13日，在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成立联合委员会作为政府完全迁往武汉前的临时政府。联合委员会由徐谦主持，宋庆龄为委员，这是她第一次以不同于党的身份正式参加政府工作。1927年3月，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宋庆龄任国民政府委员。

当时，武汉的领袖们和由南昌迁到南京的领袖们之间的分歧已暴露。随着在上海、长江下游一带开始实行清党后，1927年4月18日，南京成立了与武汉对峙的国民政府，名义上虽由胡汉民任主席，实际上由蒋介石控制。一时宁汉双方互相威胁并将以兵戎相见，后来武汉也实行反共，情势得到挽救。1927年7月13日，中国共产党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其党员则仍将留在国民党内。第二天，宋庆龄显然不满武汉的发展，发表声明，不再与新的政策有关，认为新的政策“违反了孙逸仙的思想和理想”。以后，她回到上海。8月底，她和陈友仁等人乘一艘俄国轮船去海参崴，又乘火车到莫斯科。从她离上海去莫斯科前发表的声明来看，宋庆龄自认为是国民党左派，她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保持孙逸仙的精神的国民党人，这表明她的政治观点是亲共产党的。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他们用了所谓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企图使这个行动合法化。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均列名委员名单。但在中国则普遍认为宋庆龄并未同意使用她的名字。

1927年，宋庆龄个人生活和政治上都遭到挫折。12月，她的妹妹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这桩婚事，宋庆龄坚决反对，宋蔼龄则竭力赞成。宋庆龄住在苏联将近两年，1929年5月，她经柏林回国，在南京参加孙逸仙的国葬仪式，仪式是在为孙建立的宏伟的纪念堂里举行的。她在回国前发表声明，说明参加国葬并不意味着观点的改变，只要国民党首领不改变其反对孙逸仙联共、联俄、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的立场，她即继续不与国民党发生任何直接或间接关系。

参加葬礼后，宋庆龄回到上海作短期居留。1930—1931年，她去欧洲旅行后回国。1932—1937年间都住在上海。1931年底，邓演达被国民政府逮捕，宋庆龄营救无效。她和蔡元培等人组织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并自认为是这个组织的主要人物，她又企图过问为国民政府所逮捕的共产党人陈赓、廖承志的案子。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1938年6月，组织保卫中

国同盟，进行战时医疗救济和儿童福利工作。通过同盟的活动，一些外来的医疗用品被输送到中国内地的共产党根据地。与此有关的是白求恩医生在陕西创立的国际和平医院。

宋家内部的紧张关系自1927年以来延续了好多年，战时的爱国思想又使她们取得某种程度的和解。1940年4月，宋庆龄和她的两个姐妹从香港飞回战时首都重庆，蒋介石在一次草地宴会上隆重招待宋庆龄，姐妹三人遍访重庆及近郊学校和医院，视察孤儿院和防空壕。

战争结束后，宋庆龄回上海。1945年底她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这是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延续。基金的受益者实际上限于同共产党有关的组织。她战后住在上海期间，吸引了一群人数不多但很活跃的在华的西方人士，他们都是反对蒋介石、国民党而日益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的。1948年，从国民党内分化出去的一部分人，在香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著名的反蒋人物如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等人为首，宋庆龄被邀请担任名誉主席。

1949年9月，宋庆龄被“特别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新政府中，宋庆龄成为三名非共产党员的副主席之一（另两人为李济深、张澜）。1954年北京政府改组，实施新宪法，朱德成为唯一的副主席，宋庆龄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为刘少奇。在1959年的机构改组中，刘少奇继毛泽东为国家元首，副主席两人，宋庆龄和董必武，他们都已七十岁以上了，董必武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老一辈领袖人物的代表。

1954年，宋庆龄作为上海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继续当选为第二（1958）、第三（196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49年起她是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1954年任会长。1950年后她任中国福利会会长，1951年起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会长，1957年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1950年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上当选为理事会委员，1951年获得斯大林和平奖金。

宋庆龄在担任各种职务期间，1950年后曾多次出国。1952年12月，她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维也纳国际和平大会。回国途中，于1953年1月在莫斯科曾由

斯大林接见。1955年12月到1956年2月，他率领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度、缅甸、巴基斯坦。1956年又率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1964年2月，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由周恩来总理陪同访问锡兰。

1949年后宋庆龄在北京的地位，来自她作为孙逸仙的遗孀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作用，以及中国共产党企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以孙逸仙为象征的早期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的热切愿望。她在各个重要场合受到极大的敬重，但其地位很明显的是象征性的。她住在上海孙逸仙留给她的寓所中，这所房子在共产党当局在全国掌权以后就迅即修筑一新。她偶尔通过广播向国内外听众发表声明和公开讲话，有时也为中国福利会出版的英文杂志《中国建设》写文章。1953年用英文出版了她的论文、演讲集《为新中国奋斗》。

所谓文化革命期间在中国所发生的混乱，也影响到了宋庆龄的生活。据报道，1966年9月，红卫兵责备她生活奢侈与普通工农成为对照，并抄了她在上海的寓所。可是从1967年起她又在北京出面，在国家元首刘少奇出缺的情况下，她接见来华外宾。

宋美龄

宋美龄（1897—），蒋介石的妻子，中国妇女首领。

宋美龄祖籍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在上海出生。全家六个子女中的第四人，女儿中最小的一个。父亲宋嘉树是受美国教育的卫理公会教士，又是一名有相当成就的工商业者。宋美龄从小就在基督教和非常美国化的氛围中长大。她先在家学英文，五岁时进了卫理公会办的中西女塾，这是一所专收上海上层社会家庭女儿的学校，但是入学不久因年纪太小不适宜住校而离校。

1908年，宋美龄和姐姐宋庆龄去美国，到了乔治亚州麦康，那里，她们的长姐宋霭龄是威斯来女子大学的初级生，宋美龄因年纪太小不能上大学，注册为一名特别生。1909年夏她和两个姐姐同去乔治亚州德麦雷，由宋霭龄同班同学的母亲摩斯太太照料进了彼得蒙大学预备班八年级，学期終了，又回麦康跟

从威斯来的教师伯克太太学了两年。

1912年秋，宋美龄被威斯来大学作为正式学生接受进校。第二年，转到马萨诸塞州威尔斯里大学，因为那时她的两个姐姐都离开了乔治亚州，而她的哥哥宋子文则已进了哈佛大学。她在美国南部住的九年，对她的发音有影响，在她讲的英语里带有柔和的乔治亚声调。她在威尔斯里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辅修哲学，同时选学法文、音乐、天文、历史、植物、圣经史。她在四年级时获得该校授予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的杜兰奖金。在这期间，暑假时宋美龄多次参加暑期学校，到美国其他地区旅行游览。

1917年，宋美龄毕业时，已全盘美国化了，据说她曾说过：“只有我的颜面是东方的”。但她还是回到上海，又重新学汉语和中文书籍。作为宋氏家族的一员，她从事教会工作，参加青年会活动，成为一个电影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并且成了上海工部局所任命的童工委委员会的第一个中国委员。

1914年，宋美龄的两个姐姐都结婚了：宋蔼龄嫁给孔祥熙，宋庆龄嫁给孙逸仙。在广州孙逸仙家里，宋美龄遇见了蒋介石，他比宋美龄年长十岁，已结过婚，又非基督教徒，看来不能与她匹配，但他坚持要同她结合。1927年9月底，蒋介石辞去军政职务去日本，那时宋美龄的守寡的母亲也在日本，蒋向她提出要同宋美龄结婚，答应信仰基督教，终于克服了她家庭的反对意见并于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结婚。他们先在宋家举行由余日章主持的基督教婚礼后，又在上海大饭店由蔡元培主持补行中国式婚礼。

结婚后，宋美龄任蒋介石的秘书和英语翻译，随同他来往征伐。蒋介石成为中国大权在握的首领，她也成为妇女首领。1930—32年曾任立法委员，在她影响下，蒋介石终于在1930年10月23日皈依基督教。宋还向他介绍西方文化和思想。蒋开始聘用西方顾问如原张学良的顾问澳洲人端纳，又录用受西方教育的黄仁霖、吴国桢等人。1934年，蒋介石发起以中国传统的旧道德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宋美龄主持妇女部并担任其他重要职责。她征募在中国农村的西方传教士来推行这个运动。她还关心军人及其子女的福利，1929年设立了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又设立励志社，为现役军人提供休闲娱乐活动。

1936年初，宋美龄任全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致力于建立有效的近代空军。1936年12月，她在西安事变时处事果断勇敢。当时她因病未随蒋介石去西安，但是当蒋介石被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她立即赶回南京，利用她的职权和影响，阻止了急躁的官员如何应钦等人打算采取的强烈军事行动。她向孔祥熙指出，过早的军事行动，会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并酿成内战。然后她飞往西安，于12月22日到达，三天后，蒋介石被释。1937年，宋美龄出版了《西安事变》一书。

在宋美龄指导下，1937年成立了新生活运动妇女顾问会。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开始训练青年妇女从事战时服务工作，计划收容难民和无家可归的儿童，并在乡村兴建小型合作工业。1938年3月，宋美龄因身体不好，辞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之职。

宋美龄通过向美国人说明中国作战的意义，也为中国的抗战作了重要贡献。她为美国杂志写文章，向美国人民作海外广播。1940年，《中国在和平与战争中》、《这是我们的中国》在美国出版，1941年《中国将再崛起》出版。1942—43年，她访问美国，使她在美国的声望达于顶峰。1942年11月27日到纽约，在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住了两个月，曾受罗斯福夫妇的邀请去白宫作客。1943年2月18日她作为第一个中国人、第二个妇女（第一个是荷兰的威廉敏娜女皇）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她又周游美国，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等城市募捐和演讲。报纸报道，她“侵入”了美国，说她以“魅力征服了这个国家”。一个评论家说她的仪表风度是“自由中国的化身”。这次访问的后果使她的名字一直到1967年都列为世界十大最受人仰慕的妇女之列。当然，也有些美国人对她有保留意见，罗斯福夫人就说，宋美龄“能够非常言之有理地谈论民主及其目的和理想，但她根本不想去实行它”。6月，她去加拿大三天，又在加拿大国会作了演讲，然后经由美国于7月4日回到重庆。

中美合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增加了，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翻译和蒋与美国官员交往的顾问，担负了重要的政治责任。1943年11月，她陪同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她的活动甚至获得了蒋介石的死敌史迪威将军的赞许，在他所写

的日记中说她是“一个聪明的有头脑的女人”，“对蒋介石有重大影响，并且大部分是沿着正确的路线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宋美龄的政治影响衰退了。1948年蒋介石为了取得美国援助以战胜共产党，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派宋美龄去美国求援。她于是年冬到华盛顿，虽然也受到杜鲁门总统及其他美国官员的礼遇，但对美国不介入中国内政的政策并未能作出丝毫改变。她留在美国一直到1950年1月，那时国民政府已迁往台湾，取得胜利的中国国民党已在北京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

宋美龄在台湾花很多时间指导妇女反侵略同盟的工作，曾先后四次非正式地到美国（1952.8—1953.3；1954.4—1954.10；1958.5—1959.6；1965.8—1966.10）治病和探亲访友，并以亲善使节和蒋介石个人特使的身份在那里活动。

这些年里，宋美龄获得不少嘉奖，其中有威斯莱女子大学、威尔斯里大学的名誉学位，又成为获得中国国民政府最高军政奖章的第一个和唯一的中国妇女。她还担任美国医疗援华局名誉主席，国际红十字会赞助人。

宋美龄的著作和演讲集《蒋夫人言论汇编》1965年在台湾出版。1941年出版的项美丽的《宋氏姐妹》里，载有她的生活和家庭轶闻。海伦·加桑琴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一书的修订版于1943年出版，这是一本虽然短小但比较准确的有关她的传记。

宋子文

宋子文（1894.12.4—），在哈佛受过训练的财政家，是建立中国近代财经制度的首要推动者。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外交部长，创办和发展中国财经开发公司等企业。

宋子文是宋嘉树的长子、第三个孩子，在上海出生。他在圣约翰大学预备班和大学班精研中国古书及近代科目，然后去美国进哈佛大学，1915年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去纽约国际银行工作，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听课。1917年回国，任汉冶萍煤铁公司秘书，该公司由汉阳钢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组成。不久他在上海商界、银行界积极活动。

1923年10月，已与宋子文的姐姐宋庆龄在1914年结婚的孙逸仙，请宋子文担任两广盐务稽核所长。盐税是孙逸仙政府的重要税源，孙当时要他考查广东混乱的财政情况，希望他能将它整理就绪。调查后1924年8月在广州创立了中央银行。该银行在宋子文经营下，很快使财经情况有所改善，1926年担负了北伐初期的财政支出。此外，他又与蒋介石、谭平山、孙科等人经管粮食管理委员会。1925年1月，他因系孙逸仙的亲戚被请去北京，作为孙逸仙立遗嘱时的见证人，3月参加了葬礼后回华南。

1925年9月，宋子文任新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那是他的前任廖仲恺被害之后一个月。1926年1月，宋子文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商业部长，不久，又任国民政府委员。1926年，宋子文开始经手国际外交事务，他被派去香港与英国当局谈判解决造成香港瘫痪数月之久的反英罢工。

1926年11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国民政府决定派一个五人代表团去武汉了解将政府迁往那里的可能性，代表中除宋子文外，还有陈友仁、徐谦、孙科、苏联顾问鲍罗廷，同行者有宋庆龄。他们经南昌去武汉，在南昌时与蒋介石在他的司令部进行了商谈。12月，国民党首领从广州到武汉，决定在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前，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合会议，代行

政府职权。1927年2月21日，宣布武汉为国民政府首都，这项决定又经3月10日至17日在汉口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通过。武汉政府由国民党左派掌权，受俄国和中国共产党强烈影响，以4月初由欧洲回国的汪精卫为首。宋子文在武汉担任多种要职，他是财政部长、二十八人的政府委员会的常委、十五人的军事委员会成员，又是国民党政治会议成员。

1927年4月，蒋介石以及支持他的保守派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对峙的政府。在此之前，武汉政府派出宋子文、陈友仁、孙科去上海观察情势，并请上海地区的首领到武汉去。陈、孙半途折回，宋继续前去上海。他企图使汪精卫和蒋介石双方的支持者进行和解，未获成功，当时南京政府已控制了长江，宋子文未能回武汉，乃决计留在上海。

1927年8月，蒋介石为维护国民党的团结而辞职，12月1日，他与宋子文的妹妹宋美龄结婚。1928年初，蒋介石又上台统率国民革命军，宋子文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蒋介石与宋子文家庭的关系帮助蒋掌握了权力，因为主要是通过宋家使国民政府得到了上海大银行家与商界人士的支持。宋子文在近代财经制度的创立方面也是一个关键人物。

宋子文在南京任职以后，发现国民政府每月收入不足三百万元，而开支则在一千一百万元以上。江浙两省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提供了政府收入的大部分，三个月内，宋子文就在此地区为政府每月增加收入至一千万元，同时，中央银行已在上海设立，宋子文任总裁。

1928年6月，宋子文邀请银行界、财经界、实业界的首要人物在上海举行全国经济会议。一个月后，全国财经会议在南京召开，以上海会议的决定为基础制订具体政策，也形成了恢复关税自主的计划。7月25日，宋子文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签订原则协定，给予中国完全的关税自主权。1928年11月至1930年5月间，与其他西方国家签订了类似协定。1930年2月，国民政府开始正式行使关税自主权。

宋子文在财经方面最重大的改革恐怕要算是废除厘金制度了。厘金早已为人所诟病，历来都是腐败政府的主要弊病，多次准备废除终又失败。1930年12月31日，宋子文宣布废除厘金并于1931年起即予执行。宋子文的财经政策及其为国

民政府争取到的支持，对蒋介石1929—30年多次内战中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宋的敌人曾多次企图谋杀他，这也反映了宋子文的地位及其贡献的重要。1931年中，立法院决定发行国内救济公债八千万元，宋子文强烈反对，但被置之不理，他于是辞职以示抗议。

1931年5月28日，因胡汉民被蒋介石逮捕，国民党的一些反对派在广州成立了反对派国民政府。内战威胁着人们，直至1931年9月，日本侵入沈阳，国难当前，国民党内对立各派又重新团结。1931年12月，国民政府改组时，新任行政院长孙科请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宋未接受。孙科得不到宋子文和上海财政界的支持，这是他的内阁很快就垮台的重要原因。

1932年1月28日，汪精卫继孙科任行政院长。当晚，驻沪日军和中国的十九路军发生冲突。宋子文间接地参与了这次冲突。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曾组织了装备优良的税警队巡查缉私，这一部分力量后来成为缅甸战场上知名的新一军。淞沪战争爆发后，税警队曾协同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十九路军总司令蔡廷锴后来还说到在冲突期间宋子文曾给以军费。

1932年2月，宋子文再任中央银行总裁，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他积极参与政府活动，对暂时建立起国民党内的政治平衡和蒋汪联盟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个联盟中，蒋掌管国民政府的军事，汪掌内政。1932—33年间，宋子文对中国财政制度实施了另一项重要改革：废除银两制而建立银元（元）作为中国法定标准货币。

1932年10月到1933年8月，汪精卫去欧期间，宋子文为代行政院长。1933年4月，他去伦敦出席世界经济会议，会后去日内瓦，成功地设置了对华实行技术援助的联络人员。以后又去美国，8月23日取得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然后回国。

1933年10月，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各职，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军费开支巨大以及国民政府发行公债而与蒋介石不一致。他虽继续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却以主要精力从事企业活动。1934年6月，成立中国财经开发公司，其目的系鼓励外国投资，活跃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中国工商业。中日战争之前及战争期间，兴建铁路是该公司的主要打

算，并为此而替国民政府向英、法及其他外国银行谈判借款。由于中日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一条铁路都没有完成。三十年代中期，该公司还与美国企业谈判，准备在中国开设人造丝、造纸、化肥、卡车、橡胶等等工厂。尽管他辞去了国民政府的职务，他仍然接近中国的权力中心。1935年4月1日，全国最大的最重要的私人银行中国银行进行改组，以便国民政府直接控制，宋子文继张嘉璈任董事长，直到1943年止。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作为蒋介石的亲戚和张学良的朋友，宋子文在谈判释放蒋介石中起了重要作用。据说后来他对未能遵守不惩处张学良的保证而大为愤怒。但是西安事变毕竟是揭开了宋子文重入政界的序幕。1937年6月他去广州、梧州，指导改革两广经济结构。7月，中日战争发生前，他飞往庐山向蒋介石汇报。以后宋子文随同国民政府迁到重庆，1938年3月担任由蒋介石为主席的全国航空委员会代主席。1940年中，宋子文任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去美国，1941年2月以出口金属换得五千万美元借款，1941年4月，又代表政府获得借款五千万美元。

1941年12月初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成了美、英的盟国，宋子文因曾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在华盛顿取得成功，于是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当时他仍在美国。1942年1月，宋子文以中国代表身份在华盛顿签订二十六国协定，规定各盟国不得单独与敌国媾和。这个协定使中国成了四大强国之一，其他三国是美、英、苏。1942年2月，宋子文谈判成功，从美国取得五亿美元借款，6月，签订中美租借协定。

1942年秋，宋子文回重庆就任外交部长（宋到任前蒋介石代理过外长）。1943年1月，美、英和中国签订条约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权，其他西方各国亦随之效法。虽然此事发生在日军占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时候，但些新条约的签订被重庆方面广泛地认为国民党的一个重要目的已经达到，治外法权的废除恰好发生在宋子文任外交部长期间，所以他格外受人称赞。1943年2月，宋子文再去华盛顿会见了罗斯福总统，3月，又会见了到华盛顿访问的英国外相安东尼·艾登。4月，一度去加拿大，7月飞往伦敦与英政府商谈战后计划。7月27日受英皇乔治六世的接见。8月，在魁北克参加了讨论缅甸战

场的会谈。

1943年10月宋子文回国后，常接待和会见美国来华的官方人士，其中有1944年6月访华的副总统华莱士。1944年9月赫尔利将军和美国战时生产局长纳尔逊爵士特殊使命来华，赫尔利希望调解已启端倪的国共冲突。宋子文是国民党首领中强烈反对建立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的一人。

1944年12月，孔祥熙命他去美国，宋子文任代行政院长。1945年3月，宣布宋子文将率中国代表团去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该会议于4月25日举行时，宋子文被选为四名主席之一。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代表中有一名中国共产党的董必武，他是宋子文于1927年在武汉时认识的。宋子文在美国时会见了杜鲁门总统，商谈远东及战后中美合作的问题。

1945年5月31日宋子文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他于6月20日回到重庆，五天后就职，并保留外交部长之职。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商谈订立中苏友好条约，条约以雅尔塔会议美国保证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影响为基础，宋子文于6月30日到莫斯科，到7月12日之前，他多次会见了斯大林。会谈中断，宋子文回重庆，7月20日在国民参政会中报告莫斯科谈判经过，他强烈反对把外蒙古出让给苏联。7月30日，辞去外交部长职由王世杰继任。8月5日，宋子文由王世杰陪同去莫斯科，新一轮谈判导致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有关协定，其中有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内容。这个条约虽遭到激烈反对，但最终由立法院批准。

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结束，日本溃败，苏联军队控制了满洲。1945年底，马歇尔将军抵华，着手在国共之间进行调解，宋子文常与马歇尔、蒋介石磋商。因国共双方猜疑很深，美国的调解不久失败，1946年夏，全面内战再次爆发。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经济迅速恶化，宋子文是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他为支撑摇摇欲坠的经济而被迫采取的紧急措施和限制办法很不得人心，未获成功。此外，对他个人的抨击也日见增加。1947年3月，他辞去行政院长职，但仍是国府委员。1947年9月，不顾监察院的反对，蒋介石任命他为广东省主席兼绥靖主任。1949年1月，蒋介石辞职，宋子文也辞去了广东的职务去美国，定居在纽约。他在中国共产党所开列的战犯名单中名列前茅。

宋子文在民国时代的中国政界，是一个不平常的人物。他那种西方人的办事方法，在国内不得人心。对他的作为，西方人远比国内人士更为了解和更加重视。由于他在哈佛受过教育，英语流利，善于与西方著名人士混在一起，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中不少人对之怀有疑虑。但是西方人士则认为他是中国在财政事务上头脑最灵敏的人。美国人尤其称赞他勤奋，工作效率高，又有胆量。宋子文由于宋氏家族关系在国内受到抨击，虽然他与蒋介石、孔祥熙的关系并不亲密，但总是同他们连在一起而成为抨击对象，特别为中国共产党痛斥他是寡廉鲜耻的“买办官僚资本家”，利用职权窃取私人财富。宋子文的财富到底有多少虽不得而知，但谣传他有大量私人财产，在他极盛时期，他被人称为中国的摩根。他在中国财经开发公司和中国银行名义下，创办了很多企业，如中国棉业公司、华南大米出口公司、广州银行（在香港注册的私人银行）、扬子江电力公司等等。

1927年，宋子文和张乐怡结婚，张又名劳拉·张，有子女三人：劳雷特，玛丽·琼，凯塞林，都在美国成长上学。宋子文一共有九个孙儿女。

苏雪林 原名：苏梅 笔名：绿漪

苏雪林（1897—），诗人、小说家、短篇小说作者，又以研究唐诗和比较神话学而闻名。

苏雪林的家庭出身和幼年情况不详，只知道她出生于安徽太平县，有兄弟三人，姐妹一人。她早年在家读古典书籍，学习作旧体诗，十五岁时进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毕业后，曾在安庆实验小学教书一个短时间，不久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苏雪林在安庆实验小学时遇见了作家芦隐，促进了她对写作的兴趣，1919年中到1921年中，这两个女子都在北京读书，当时正值文学革命的高潮时期，一些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受人宣扬，苏雪林想效法这些年青知识分子，于是申请并获得了去法国留学游历的奖金。此举在1921年对一个女子来说是如此之不寻常，以致直到她离去前夕才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她母亲。

1921年秋，苏雪林进了里昂海外大学读书四年，专修文学与美术。她在学生中是很出色的，但在生活上也遇到一些挫折。第一件事是有一个同学向她求婚，而她又已由父母之命与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订了婚，她认为应该尊重这个婚约；第二件事是她有一个弟弟死去；第三件事是她生了重病。她卧病期间，有几个天主教修女和一位天主教徒朋友白朗（译音）照料。白朗劝诱她信奉天主教教义。开始时苏雪林纯粹从美学观点对天主教发生兴趣，作为一个艺术家，她爱慕天主教堂的礼拜仪式和庄严的音乐，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并不接受天主教教义。1924年，她母亲生病将死，她立誓如母亲倘能救活她就皈依天主教，而她母亲竟然病愈，于是她立即加入了天主教。1925年她回国，顺从了原定的婚约。

苏雪林在法国四年，已具有教书和写作的相当能力。她回国后在苏州劳莱尔·海伍德师范学校和成华女子中学教中文，以后又在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安徽大学教中国文学。1931年任武汉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除战时去四川乐山外，一直在武汉任职至1949年。

作为一个中国文学的教师，苏雪林尤其对诗歌有兴趣，她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1927年出版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它剖析了这位唐代诗人诗歌中的不少隐晦之处，认为其中不少诗篇是他献给一些道姑和他无法接近的女子的情诗，因此要对道教神话作出艰苦研究才能对十分含蓄的语言作出解说。苏雪林于1929年又出版了文学评论集《蠹鱼的生活》，1934年出版了两本文学研究著作《唐诗概论》、《辽金元文学》。1941年，她在乐山期间，出版了《南明忠烈传》，研究十七世纪中叶反抗满族入侵时死难的明朝遗臣。1945年出版《青鸟集》。三年后，为《一千五百年近代中国小说和戏剧》一书用英文写了一篇《当代的中国小说和戏剧》，计有四十页，叙述了从五四运动起到1948年的小说和戏剧史，这篇文章表现了苏雪林对近代中国文学有正确的评判和透彻的了解。

苏雪林的诗和小说也受到称赞，她早期的诗集《乡村杂记》是她法国留学时在《晨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回国后，她在《语丝》、《新月月刊》上发表诗作、短篇小说和时论文章。1928年出版的《绿天》是一个描写家庭和婚

后愉快生活的小说集。她的最为成功的作品是1928年出版的《棘心》，这是一部以小说体裁出现的有关她在法国的艰苦生活的记述。1941年出版小说集《屠龙集》。1946年出版《鸠那罗的眼睛》，内有两个剧本，其中《鸠那罗的眼睛》一篇是取材于印度神话的剧本，另一篇《玫瑰与春》是描写圣洁和庸俗爱情的寓言小说。同时又出版了以传统的叙述方式编写的南明遗臣故事集《蝉蜕集》。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大陆时，苏雪林去香港，为天主教真理会编辑宗教书籍，1950年去巴黎研究比较神话学两年，1952年7月到台湾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中国文学教授，后来减少教学以便有时间进行研究。五十年代初，苏雪林着重研究汉代以前的神话，特别是《楚辞》中反映的楚国的情况。1957年出版的《昆仑之谜》认为《楚辞》中不少扑朔迷离的神话，包括昆仑圣山，只有征引古代近东和欧洲的神话才能得到解释，这个现象说明中西方之间早就有了交往。例如公元前四世纪四十年代亚历山大大帝从事的战争，苏雪林认为它促使人民东迁而丰富了楚国文化。1957年她出版有关希腊神话的《天马集》，1961年在台湾出版《苏雪林选集》。

苏曼殊 字：玄瑛

苏曼殊（1884.9.28—1918.5.2），诗人、翻译家、新闻记者、反满革命党人。他的自传体小说的情节，使国内一代读者为之倾倒。

苏曼殊是万隆茶庄的广东经纪人苏介生（译音）的儿子，出生在横滨，母亲是日本人河合，苏曼殊幼年时即能说中日两种语言。1894年由于中日战争，苏介生携其子及河合到中国，住在广东香山，他家世代居住于此。香山突然来了一个外国妻子和混血种的儿子，引起了人们的惊疑。特别是因为苏介生的发妻在其夫外出期间一直住在夫家。此后三年中，苏曼殊母子两人处境艰难，幸有一个女佣照顾他们而稍得缓解，她把苏的穿着日本和服的母亲称作“古装太太”。

1897年，苏曼殊母子被送回横滨，苏进了横滨新建立的汉文学堂，他的古

汉语成绩极差，又受到种族方面的冷遇，一些中国人教师不愿教这个“混血儿”。1899年，他转入英语组，其进步之快出人意料，结果是于1900年准其离校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附属高中。苏曼殊在东京上学的情况不详，只知道在1902年秋加入了早稻田大学青年会，这是支持孙逸仙的激进目标而不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政策的中国革命青年新建立的组织，苏曼殊不久以他长于英语又能画中国画而闻名。

苏曼殊由于参与早稻田大学青年会的活动，遂于1903年回国。当时上海《苏报》因反满被封，继起的有《国民日报》。该报是由英国人登记注册的。苏被推选担任该报翻译，1903年秋他赴上海，为报社工作一直到该报于1904年被封。在此期间，他与陈独秀合作翻译《悲惨世界》，还写了一些论文和社评。他尖锐地批评广东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作用，预言如果中国被人奴役，最大的过错要由广东籍商人承担，因为这些人长期与西方人接触，其中国人的民族性已泯灭，只知为自己谋利而根本不关心国家。他还写文章赞扬无政府主义及其倡导人如高特曼等人。

《国民日报》被封时，他自认很喜爱并且善于写作。他很快就 在香港《中华日报》找到了工作。他专心致志，晚上也睡在报馆，因此很快得到了他在上海时一样的声誉。与此同时，他仍然坚定地信奉孙逸仙，常与在香港的主要革命党人来往。

苏曼殊的成就却产生了奇怪的结果，使他发生了他一生中稀有的一次浪漫事件，而这次事件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说明的。当时，苏介生显然得悉了他儿子的成就，从香山到香港同曼殊商谈他同一个前已订有婚约的本土女子结婚的问题，苏曼殊事先已知道他的来意，与知友商量对付办法，有人劝他服从父命结婚。苏曼殊极不以为然，离开了《中华日报》，拒不与其父亲见面。他去四处回避了几天，忽然从香港失踪了。他父亲失望地回到香山，他的朋友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几个月后，苏曼殊剃掉头发穿着僧衣成了一个和尚回到香港，朋友们对此大为惶惑不解。据极其可靠的说法，他离开香港到了广东的某个寺庙，立誓出家。但是寺庙的戒规显然不合他的心意，于是他就尽快返回香港。不到几天，他脱掉袈裟，只是遇到做佛事时才穿上；照旧食肉饮酒。但是结婚一事

则已永远弃绝了。使人们记起他当过和尚的插曲的另一点，就是他取了法名曼殊，这是仿效曼殊菩萨而取的名。苏曼殊回香港时，正值他父亲病重，他一度回香山为其父作伴并料理父亲的后事。

1905年间，苏曼殊相当自由自在，很可能是由于得了一笔小家产，并且来往于京沪杭之间作记者也有足够收入。1906年他回日本探望母亲，1907年到东京，住了两年，翻译了拜伦的作品，于1908年以《拜伦诗选》之名出版。

苏曼殊在翻译上的成就，使他成为革命者愿意寻求的合作者。1909—11年间，他似乎多次受孙逸仙之托去东南亚活动。1909年他在爪哇暹班中华会馆教中文，留居该地两年，并就近去新加坡和曼谷，在海外华侨中宣传反满思想，并为革命事业筹款。他也有机会目睹西方殖民制度，结果是对荷兰人感到厌恶。这一点以及他对爪哇南国风光的印象，以后常在他的小说中再现。

中华民国成立后，苏曼殊离东南亚回国，在上海一家报纸当编辑，此后六年，也是他最后余年，从事报章工作，写诗文、小说和有关他自己的逸事。自传体小说的片段发表这些逸事，风靡了一代中国读者（他们信以为真），据评论者看来其中最好的部分，乃是连载于1912年5月至8月间《上海太平洋杂志》上的《断鸿零雁记》。麦克艾利伟在他写的一本出色的传记《苏曼殊：一名中日天才》中说：这一部传奇描写了“一个纯日本血统的人，幼年时出于对中国的敬慕而被带到中国，却发现自己的信任受到蔑视。他青年出家为僧，从未享受过天伦之乐，但他在孤寂中却能评判周围的社会，格外清楚地看到那些侮辱他和他的母亲的人是不配称为中国人的。唯有他本人才具有真正的中国人品质，并能向世人加以说明。而且只有他才更有资格做这件事，因为他能把外国文学的渊博知识注入这个工作，但是当所有该说的都已说了，所有该做的都已做了，欧洲或中国本身又能提供些什么堪与印度的智慧相比的东西呢？对于这样一个宝库，在他的同时代人中间，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打开宝库的钥匙。”为了起到旁观者的作用以便克服西方的物质主义与中国的传统道德，苏曼殊通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和经历，大声疾呼他的读者寻求办法来解决普遍存在的“缺乏和谐的危机”。苏曼殊似乎也同样的方法同他的混血种的身世取得了妥协，也同他不善于过正常家庭生活的状况取得了妥协。

苏曼殊是一个多产作家，又是一个具有浪漫色彩神秘色彩的人物，他把最后几年用来钻研玄学，这从他的书信集中可以说明。例如，他给马德里的赛诺·罗不兹的信说到准备出版他的英译本《沙恭达罗》，并暗示将出版他青年时编的梵文语法，这两本书的稿件从未被人发现。他在最后几年中嗜食糖果，这可能导致他于1917年患了严重的肠道疾病。1918年初，他生病时，蒋介石曾为他在上海安置住房，4月，病势加剧，转入法租界的一家医院，1918年5月2日去世。他埋葬在杭州西湖边，坟地是由汪精卫出资买下的。

苏曼殊死后，他的著作被收集起来并多次出版，他的一生和著述继续为批评家所重视。1927年柳无忌编《曼殊遗集》，次年，又与他父亲柳亚子编《苏曼殊年谱及其他》，此书系根据对苏曼殊作品的深入研读编写而成，并把所有逸事都作为真实的事实。1931年出版《曼殊笔记》、《曼殊诗文》、《曼殊手札》、《曼殊小说》。1930和1931年柳亚子编辑、柳无忌标点出版了《苏曼殊全集》，第二版分成五册于1932—1935年间出版，第三版于四十年代在香港出版，第四版于1961年在台湾出版。苏曼殊的作品，多年来以各种名称出版，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出版得更为频繁，足见中国读书界对这位浪漫色彩人物的兴趣历久不衰。

孙传芳 字：馨远

孙传芳（1884—1935.11.13），北洋军阀，二十年代中期控制了苏浙皖赣闽诸省。1927年他失败下台，1935年被刺丧命。

孙传芳原籍山东历城，他成年期间，正是编练新军成为中国一项重要事务的时候。他决心从军，在国内受基本军事教育后到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同期学员中有以后成为军事首领的赵恒惕、程潜、李根源、李烈钧、唐继尧、阎锡山等人。他在日本时加入同盟会，但并不积极。1909年毕业，在军中见习一年，回国后，在控制湖北的北洋军阀王占元手下任团长，从此与直系发生了关系。他在1911年革命期间与民国初年表现并不出色，因此升迁得很缓慢。1917年任旅长，1921年任第十八师师长。

孙传芳升任师长在他一生经历中是个转折点。1921年8月7日，王占元被

来自湖南的两师军队击败，放弃了对湖北的控制。8月9日，北京政府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不久，孙传芳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新设此职是由于预计当时四川军阀和湖南军阀会达成协议一起进攻武汉。吴佩孚及其支持者很快镇服了湘川联军。

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奉军张作霖在北京附近长辛店被打败，华北乃落入吴佩孚之手。以曹锟为首领的直系，逼迫徐世昌辞去北京总统职务。5月15日，孙传芳发表宣言呼吁南北政府统一，恢复1912年约法和1913年的国会，并要黎元洪上台当总统。5月28日又通电要求孙逸仙和徐世昌同时辞职，徐世昌显然成了他反对的主要目标。徐乃于6月2日辞职，九天后黎元洪就任。孙传芳5月28日的通电，也使广州陈炯明的部下据以要求孙逸仙辞职。

1922年10月，徐树铮由许崇智协助在福建成立临时军政府，但在11月就瓦解了，北京政府命孙传芳率军进入福建。1923年3月7日，北京政府应曹锟、吴佩孚之请，任命孙传芳为福建督理。经长期征战，孙传芳军于1924年3月攻克福州。9月，曹锟任命他为浙江军务督办、闽浙巡阅使。孙借此赶走了浙江督军卢永祥，反对曹锟的卢永祥乃于10月12日逃往日本。10月，冯玉祥在北京举行政变赶走曹锟，孙传芳和江苏督军齐燮元对冯宣战，11月，孙致电北京，拥护当时已成为北京执政的段祺瑞。与此同时，张作霖令张宗昌率奉军南下控制长江各省。北京政府解除齐燮元的职务，以卢永祥为苏皖巡阅使。1925年1月10日，张宗昌、卢永祥率军进入南京，齐燮元打算与孙传芳联盟，但孙保持中立，并受命为浙江督军。

奉军胜利，控制了上海首富之区，但为时不久。孙传芳认为进攻乃最好的防御，决定进攻奉军以救浙江之急。1925年10月，他突然进袭上海，打败奉军，并向徐州挺进，是时皖、鄂、赣各省军阀都对他表示支持。

孙传芳认为自己在直系中已是最强大的军事将领，因而自任东南五省（苏、浙、皖、赣、闽）联军总司令，但对吴佩孚仍表示谦顺。12月，他经南京到杭州，发表宣言声称所辖各省不再听命于北京。1926年春，他打算把上海各种权力集中于“大上海”计划之中，5月5日在向上海总商会所作的演讲中提出该计划，并任命丁文江为督办以实现该计划。

1926年，国内形势迅速变化，段祺瑞从执政岗位上下台，张作霖、吴佩孚为应付北伐的威胁而和好，孙传芳宣布东南五省中立，实行爱国、爱民、爱敌的所谓三爱主义。8月，北伐军进军，孙传芳为预防计，增兵江西，重申中立。但是，孙传芳的一些部下已秘密协商投向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在进军湖南、江西、福建途中势如破竹。11月初，孙传芳在江西遭到严重损失，九江、南昌落入国民革命军之手，他逃到天津同张作霖会商。

天津会议决定以张作霖为新建立的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司令。那时，国民革命军已攻占福建，孙传芳的许多部将转而投效北伐军。12月底，浙江省长陈仪也不再支持孙传芳。孙传芳得知浙江即将落入陈仪之手，决定在江苏设防阻击。1927年2月孙同张宗昌在南京建立联合司令部，并将部队改组为七省联军。3月，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上海，迫使孙传芳退到淮阴，以后又退到山东。

1927年7月，张作霖作最后努力以重振军力，编成七个军团，孙传芳为第一军团司令。8月，孙传芳重占徐州，越过长江进攻南京。此次战役，孙传芳军七万人，死二万，被俘三万，由于自己的骨干力量被消灭，孙传芳遂退出公众生活，去了大连。

孙传芳以后又迁到天津，吃素信佛，支助当地的佛教机构。此后几年中他只有一次引起公众注意，即在沈阳事变后被国民政府邀请去参加了1932年召开的洛阳会议。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的和平生活遭到破坏，当时他参加一次佛事，被一名年方二十多岁的女子开枪打死。她是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她父亲在张宗昌部下当过旅长，1925年被孙传芳手下的人处死。社会舆论同情施剑翘，使她只被判七年徒刑，1936年被赦放出。孙传芳的后人中有孙家骥，后来成为画家，跟随张大千，与他一起住在巴西。

孙科 字：哲生

孙科（1891.10.20—），孙逸仙的儿子，1932年6月至1948年11月任立法院院长，后又当了四个月的行政院长。之后他退职住在法国和美国，后去台湾。

孙科出生在广东香山县，该县以后为纪念他著名的父亲，改名为中山县。

1896年，他的妹妹出世。他六岁时，就和母亲去夏威夷父亲处。他在檀香山上小学、中学，1910年毕业于天主教的圣路易斯学院。1908—1910年间还在华文报《自由新闻》工作。1911年去美国进加利福尼亚大学，当1911年革命和孙逸仙回国的消息传到后，他离美回国以便参加民国政府工作。但他父亲另有打算，又把他送回美国读书，1916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后又去纽约，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后，立即回国参加广州军政府。

孙科在1917—18年间任广州非常国会及外交部秘书。1918年5月，桂系势力进入广东，孙逸仙离广州去上海，孙科留在广州，1919年任广州英文《广州时报》副主编，第二年他去香港。

陈炯明用武力夺回了孙逸仙在广州的权力，孙逸仙任陈为广东省长。陈炯明为了显示自己是个能干的行政官员并赞助广东的地方自治，委托孙科拟订广州市政条例于1921年2月15日公布，并任命孙科为广州市长。孙科从1921年到1925年，除1922年因陈炯明变乱而一度中断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当时的市政府面临的急迫任务是建筑道路，拓宽街道，修建下水道以及建立近代公用事业。由于政局不稳，以及有产者对这些事业的冷淡，使孙科倍感任务的困难。虽有种种阻难，他终于为改建旧广州城为华南最大的现代都市开辟了道路。

1923年10月，孙科被任命参加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任务是拟订党纲、党章和宣言，监督成立省党部和地方党部，筹备党代表大会。在1924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科作了有关党纲的说明，并参加了审查地方党部活动情况报告的委员会的工作。

1924年11月，孙逸仙离广州去华北，他病重的消息传到广州时，孙科即于1925年2月2日赶到北京。3月11日孙逸仙签署两种遗嘱时孙科在场。孙逸仙的丧仪完毕后，他回到广州。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孙科被选为十六名政府委员之一，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时，他被共产党认为是国民党右派。5月，孙科第三次出任广州市长兼广东省建设厅长，并代理广东省长，又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不久，任新成立的交通部长。

广州国民政府历经艰难挫折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于1926年7月开始北

伐，以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北伐第一阶段以攻克武汉而告结束，国民政府派出徐谦、宋子文、陈友仁，苏联顾问鲍罗庭、孙科去武汉调查将政府迁往该地的可能性。12月13日，他们到达武汉的三天后建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暂充党政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迁往武汉之议，为蒋介石及其保守派的支持者们所坚决反对。1927年3月10日至16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正式成立国民政府，孙科是武汉政府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是国府委员会五个常务委员之一，又是青年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7年4月，蒋介石等人在南京成立对峙的政府，并在其控制地区镇压共产党。自冯玉祥支持蒋介石从而改变中国的权力平衡以后，武汉政府亦在7月间开始清除共产党，为国民党的重新统一铺平了道路。在接着举行的宁汉会谈中，孙科和谭延闿代表武汉方面。8月，蒋介石宣布辞职，统一的国民政府于1927年9月20日在南京成立。孙科于1928年1月3日任建设部长前曾一度任财政部长。1月9日，蒋介石重新上台，孙科和伍朝樞、胡汉民去印度、埃及、土耳其及欧洲的法、德、意、英各国旅游。他们于1月出国，8月回国。

1928年10月，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时，孙科任国府委员、铁道部长、考试院副院长。1929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航机构中国航空公司。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四名元老因胡汉民被非法逮捕发表宣言斥责蒋介石，孙科于1931年5月离开南京。他在广州参加会议，于1931年5月28日成立反对派国民政府。会议参加人还有汪精卫、陈友仁、唐绍仪、陈济棠、李宗仁等。双方之间的内战因9月沈阳事变发生而得以避免。接着双方谈判，孙科为广州方面代表。胡汉民获释，国民党互相争吵的两派重新统一，蒋介石暂行辞职。

1931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孙科任行政院长，但因得不到上海的银行界及宋子文等要人支持，于1932年1月25日辞职。6月，他出任立法院长，一直到1948年11月。他在任内主持拟订现代立法。1933年1月到1936年5月立法院起草了“五五宪法”。尽管他身居政府要职，却是国民党领袖中反对蒋介石政策的一人。他们主张立即坚决抗日，争取苏联援助，和共产党和解。西安事变及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他奉命代表中国和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秘密谈

判。谈判于1937年3月开始，结果于8月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1月和1939年4月，孙科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去莫斯科，两次都从斯大林那里获得大笔借款，第二次并签订了中苏商务条约。

中日战争初期，孙科经常作世界形势的演讲，他的演讲集《前途》于1942年秋出版，英文本于1944年在美国出版，题为《中国向前看》。

战争结束后，1946年11月，国民政府由战时首都重庆迁回南京，国民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12月25日颁行宪法，从而结束了国民党二十年来的一党专政。1947年1月1日公布的宪法，是孙科在立法院任内的最高成就。选举之前，1947年4月组成了联合政府，孙科任新设立的副主席一职，他任此职到1948年4月，当时他竞选副总统败于李宗仁之手。5月17日，他当选立法院院长。中国共产党进展迅速即将接管大陆时，1948年11月，孙科被召任行政院长进行组阁。1949年2月，李宗仁任代总统后一个月，孙科把行政院搬到广州以表示反对李宗仁与共产党谈判，3月他辞去行政院长之职，由何应钦继任。

1949年后，孙科在法国住了一些时候，然后去了美国。1964年10月他到了台湾，1965年12月任总统府高级咨议，1966年5月他得到了考试院院长的实职。

孙科和苏芹（桂仁君）（音）结婚，有子女各两人。

孙兰峰 字：腕九

孙兰峰（1896—），华北将领，长期以来都是傅作义的部属，1954年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孙兰峰，山东滕县人，他的家庭情况和早期经历不详。十八岁从军，后进黄埔军校，二十年代末或三十年代初投身傅作义部队。1933年4月，日军侵入热河、察哈尔，他率领了一团兵力从绥远进驻万全，此后在作战中有功受奖。1936年11月任旅长，参加了傅作义指挥的把心怀不端的德王从百灵庙赶走的行动，孙协同攻占百灵庙，把德王的部队赶到察哈尔东部。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山西折口抗击日军，1938年春他在绥远南部的战绩受到蒋介石的表扬。1939年11月他参加袭击包头日军并因而升任师

长。1940年3月又获胜，当时中国军队很少取胜。不久，获四等宝鼎勋章。1945年8月，日军投降，他受任为收复热河、绥远、察哈尔的先头部队司令。8月15日在包头接受日军投降，8月底率军进大同，9月8日飞往北京，成为日军投降后进入古都的第一名国民党人。9月底，他受命在热河接受日军投降，10月12日他飞到长春，参加商讨收复东北事宜。

在战后的一切行动中，孙兰峰都与傅作义在一起，1949年1月傅作义在北平谈判同意投降中国共产党后，孙亦随同进入共产党的机构。1949年9月，孙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委员，绥远人民政府成立后任副主席。1954年3月至6月参加筹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6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孙立人

孙立人（1900—），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生，因在缅甸战役成名而升任为中国陆军总司令，1955年据说因反对台湾国民政府的案件中疏忽失职而被撤职。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他初受传统教育和近代教育后，进了清华学校，1922年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篮球队代表中国进行国际比赛。1923年从清华毕业后到美国进柏杜大学学土木工程，1924年得理学士学位，又进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于1927年毕业。他周游英、法、德、日各国考察军事，后回国进了国民革命军当一名下士。

孙立人最初的军职是中央政治学校训练班主任，1930年升为上校团长。三十年代初，宋子文自办盐务税警总团，孙立人在该部任团长。1937年，孙立人率该团在上海抗击日军，受伤十三处，由一个学生输血才救活了他，乃去香港疗养。

1938年，孙立人受命在长沙另组盐务税警团，该团在1942年成为新编第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师长。同年春，该师被调到伊洛瓦底江前线参加第一次缅甸战役。英军缅甸师在仁安羌陷入重围，孙立人调军救援，起初略有迟缓，继而迅

速进展，日军被迫分兵阻击。新三十八师打退日军，使英军得以突围。日军将史迪威中将指挥的英中联军赶出缅甸时，孙立人因巧妙地率军退往印度而提高了声誉。美国官方有关中印缅战场战史作者罗曼尼·森德来说：“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三十八师及其卓越的指挥官一出兵就建立了他们的声誉。在仁安羌的巧妙的战役中，英勇干练的孙立人率领他的训练良好、士气旺盛的部队完整无损地穿过了克钦邦，这真是罕有的成就”。

史迪威的计划是迅即打回去并从日本人手中收复缅甸，他计划训练三十个师作为中国基干部队，大部分在云南训练，一部分在印度东北部的兰姆伽训练，这个计划当即由华盛顿、重庆方面批准，以史迪威为总司令，罗卓英为副司令，罗卓英手下有孙立人、廖耀湘。兰姆伽的训练基地建立起来，编练新军的工作开始了，并于1943年完成。新一军下辖第三十八师和第三十师，军长孙立人，新六军下辖第十四师、第二十二师、第五十师，军长廖耀湘，两军都已作好行动准备。1943年12月，蒋介石授予史迪威指挥调度这些部队的全权。

第二次缅甸战事经过一些犹豫终于开始后，孙立人在1944年1月底即在佶枝光取得了第一次丛林战的胜利，他与第三印度师及米勒师合力，于1944年5、6月间把日军第十八师赶出孟拱河谷。8月，经过艰苦战斗，他们最后攻占了日本据守的上密支那要塞，从而结束了第二次缅甸战役的第一阶段。史迪威称这次战斗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

1944年夏，美国北部战区司令部从中美司令部接管了在缅中国部队的指挥权，计划在10月中旬从密支那分三路向南进攻。10月，史迪威离职，中国战区与中印缅战区分开，由沙尔顿中将指挥印缅战场。12月中，孙立人的新一军在三翼进攻中首先攻克八莫。1945年3月6、7日，第三十八师攻占腊戍。3月24日第三十八师、五十师在昔卜以东会师，控制了由昆明到昔卜的滇缅公路全段。按蒋介石的规定，中国军队的任务，就到此结束。第二次缅甸战役证实了史迪威的信念，他认为只要有适当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士兵是很有才能的。

1945年孙立人率军回国，艾森豪威尔将军邀孙立人去视察欧洲战场，孙立人应邀在三周中周游了五万英里，回国后，率新一军到广州，接受日本第二十

三军的投降。

1946年3月，苏军开始撤出东北，孙立人被派去沈阳。这时的新一军下辖三个师，从沈阳沿铁路北上，4月2日攻占昌图。苏军撤退后，共产党军队破坏了沈阳长春间的铁路枢纽四平街以北的交通，3月18日，共产党军队攻占四平街。4月5日，孙立人军到达前沿，但未采取行动，待共产党对辽西走廊国民党军后卫的威胁解除后，他于4月16日下令进攻，遇到顽强抵抗，迫使国民党军队以新五军、新六军进行增援，四平街终于5月20日被国民党攻占。

1946年8月，孙立人被任命为东北绥靖公署副主任，又以新一军军长兼长春警备司令。当时，他称在东北的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是“苍蝇打老虎”。但随后几个月中，共产党粉碎了国民党的一些据点，他对国民党这只“老虎”的信心也逐渐丧失了。1947年4月，新一军改由一名黄埔军校毕业的潘裕昆为军长，孙在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手下任副司令。新一军在新军长率领下遭到共产党的新的进攻，放弃了松花江北岸地区。7月，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领导进行改组，孙立人理应继任杜聿明的职务，但他却被解除了前线司令之职，改任国民党陆军副司令，南京军训司令。他担任这些职务至1949年9月，然后任台湾警备司令。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成立国民政府后，孙立人任陆军司令，1951年5月升为上将。他在台湾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争夺权势。蒋经国在军队设立的政治委员制度，是对孙的权威的潜在威胁。孙在争斗中的失败于1954年变得很清楚了，当时他被解职改任蒋介石的私人参谋长。1955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孙立人与其部属郭鼎华（音）的阴谋活动有关，他已因“承认失职”而辞职，其职务已被解除。郭于5月被捕，据说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特工人员。国民政府委任一个九人委员会进行审查，但未公布详情。按照已有的情报，据说这个阴谋活动包括一项要求蒋介石取消军队政治委员制度的计划。孙立人虽未被指控为是共产党特务，但被认为“洞悉其部属的活动而没有看清这是由共产党策动的”。据说他也曾被软禁。以后他闲居在台中。许多中国人认为孙是“常胜将军”，但他在台湾不过是一名政界将领，而不再是干练的指挥员了。

孙连仲 字：仿鲁

孙连仲（1893—），冯玉祥的部属，1930年后在国民政府任职，在中日战争期间闻名的卓越的前线司令官。1945年任河北省主席，十一战区司令，后任保定绥靖署主任，1948年任蒋介石的私人参谋长。

孙连仲，河北献县人，曾在保定中学上学，1913年投奔冯玉祥所率部队，不久升为冯军第十六混成旅营长，后转入炮兵团。经军事学校训练后又回冯玉祥部。北伐战争后期，冯玉祥军编为第二集团军，孙连仲在鹿钟麟所部北路军中任职。该部参加1928年4月在豫北击败奉军之战，并在北上直趋北京的最后一战中起了重要作用。此时，孙连仲已升为将军。

1928年9月，孙连仲任青海省主席，1929年继刘郁芬任甘肃省主席，负责甘肃、青海、宁夏的军务。他参与未获成功的阎冯反蒋活动后，与冯玉祥的其他一些部属一样投靠国民政府，任二十六路军总指挥、江西清乡督办，负责赣、鄂、湘、豫的“剿匪”活动。五年间，他成为反共战争的马前卒，尤其在1934—35年在追逐长征部队中特别起作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建立，内战停止，孙连仲的“剿匪”活动也停止了。他的劳绩，为国民党所承认，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开始后，孙连仲率二十六路军驻守北京南郊琉璃河，被逼退往山西，而山西已于1937年11月为日军所占。孙连仲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3至5月间，参加台儿庄之役，因其战绩而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他从华东撤退后，参加武汉保卫战，10月向北撤走。1939年参加从日本人手中收回唐河之战。

当时，孙连仲已是国民党军杰出的前线司令官之一，1939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后又任第六战区副司令。1945年7月改任第十一战区司令兼任他的老家河北省主席。战争结束，负责收复河北、山东、察哈尔并主持接受日本投降事宜。他得到驻秦皇岛、天津、北平、青岛地区的美军的援助，迅速完成了这一工作。由于国共内战加剧，蒋介石开始更动军事将官并改组军政机构。1947年

3月，第十一战区改为保定绥靖公署，孙连任主任兼河北保安司令。1947年秋，他在平津保三角地带之战中取得了国民党军队难得的一次胜利。1948年春任南京警备司令，秋天，任蒋介石的私人参谋长。1949年1月，蒋介石辞职，孙亦辞职。以后他去台湾，1949年12月，国民政府撤往台湾后，孙连任战略顾问委员。

孙宝琦 字：慕韩

孙宝琦（1867.4.26—1931.2.3），清政府外交官，出使法国、德国。在北京政府中担任过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

孙宝琦是太子少保孙诒经的长子，生在杭州，受旧式教育研习中国典籍而得二等荫生衔，与1884年成为庆亲王的奕劻的亲戚结婚。1886年，孙宝琦十九岁时任刑部右丞，1895年任候补直隶道台，1898年庆亲王主持的总理衙门将孙列为外交职务的备员，但因百日维新运动及义和团运动的干扰而并未得到任命。清廷逃往西安后，孙宝琦任军机处官报局局长。1902年1月，清廷回京，孙一度任驻维也纳、柏林、巴黎使馆秘书，6月，任驻法公使。

1905年，孙宝琦表现了一种道义感，赢得了孙逸仙支持者的好感。当时，孙逸仙在欧洲招纳兴中会会员，有两名巴黎的中国学生加入了兴中会。他们是官费留学生，怕此举会有不良后果。为了挽回这件事，他们到孙逸仙住处，恰值孙外出，就窃取了会员登记名册交给孙宝琦，希望他帮助他们解脱困境。孙宝琦却斥责他们进行偷窃，告以由于偷窃可能产生的后果，并令他们把名册送还给孙逸仙。

1906年夏，孙宝琦回国充任军机处大臣，负责改进政务，1907年任驻德公使，后因改任津浦路帮办而于1909年1月回国，6月，任山东巡抚。1910年国内筹建立宪政府的呼声增高，孙宝琦奏请清廷即刻实行内阁制。1911年11月，武昌起义一月后，孙宝琦响应同僚及济南绅商的要求，同意宣布山东独立。他被任命为都督并于11月15日就职。当时，袁世凯在北京掌了权，又于11月27日攻占汉阳，以此表明他已控制了局势。29日孙宝琦取消独立，清廷对他的失职未

加追究，于12月允其辞职。

1912年2月清室退位，孙宝琦去天津，与庆亲王合伙经商。1912年12月重回政界，任税务帮办，1913年5月为代理总办。9月11日，熊希龄任孙宝琦为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外交总长，他的第一件大事是与俄国谈判，于11月5日订约，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而中国则同意外蒙自治。1914年2月中旬，熊希龄辞职，孙任代总理。5月，徐世昌接任，孙回任外交总长，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孙辞职，由陆征祥继任。

1916年1月，孙宝琦任审计局长，自此之后，他主要从事财经事务。4月，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6月，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孙辞职，1917年夏任税务处督办，兼审计局长，1920年兼任经济调查局总裁。1921年10月，孙任防灾委员会主任和灾害救济局督办，1922年1月任扬子江委员会委员长，1922年春，任华盛顿会议后成立的外交问题研究会会长，救济局督办。

1922年，曹锟授命孙宝琦为总理，但他的总理权限一开始就受限制，因内阁成员全由曹锟的秘书王毓芝决定。但在其任内，5月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德国进行索取赔款谈判获得成功。孙宝琦因和阁员财政总长王克敏不和，于1924年7月辞职。10月，冯玉祥占领北京，段祺瑞重任执政，孙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2月，奉军和孙传芳争夺长江下游，孙宝琦不肯接受新建立的淞沪特别行政区督办之职，也不接受驻苏公使之职，而担任了汉冶萍钢铁公司及招商局董事长。1926年，孙任中法大学董事长，1927年12月去张作霖处任职，1928年北伐军进北京，孙宝琦去大连。

1929年，孙宝琦因长期患肠胃病去香港治疗。1930年春由上海回故乡杭州给祖先扫墓，同年秋，回上海后，病情逐渐加剧，1931年2月8日去世，遗有子六人，女十六人。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民国名人传记辞典
第十二辑 第九分册

作者=

页数=143

出版社=

出版日期=

SS号=10731089

DX号=000005585711

URL=[http://book1.duxiu.com/bookDetail.jsp?](http://book1.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5585711&d=1EC44F80FD54FA5A83A6092C53C571BE)

dxNumber=000005585711&d=1EC44F80FD54FA5A83A6092C
53C571BE